

# 历史是什么？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商务印书馆

11(3)/46

937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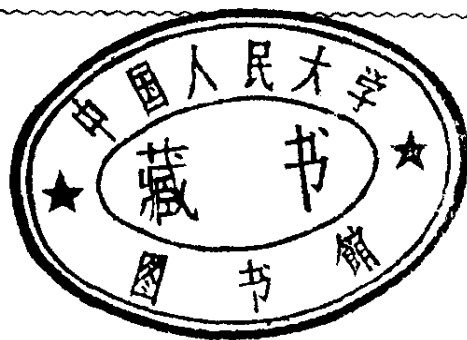
# 历史是什么？

1961年1月至3月间在剑桥大学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中的讲演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吴柱存译

6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anuary-March 1961**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63

根据纽约阿尔弗雷德 A. 诺夫出版社 1963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历史是什么？**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吴 柱 存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120 千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00 册

统一书号：11017·501 定价：0.65 元

## 序 言

荷兰历史学家盖尔说过一句很机智的话：“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根本问题，也是众说纷纭，看来同样要继续辩论下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卡尔(1892— )<sup>①</sup>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颇具独到的见解，富有启发性，但自然只是一家之言。

卡尔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历史当作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则在这过程之中随之前进”(146页)。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反映，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43页)。“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28页)由于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的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因此他又说，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谈话”(135页)。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新的解释与旧的解释不加区别，等量齐观。卡尔举例说，历史学家一度曾以宪法和政治为根据来解释过去。后来，当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开始

---

<sup>①</sup> 卡尔专长国际关系史和苏联史，一生著述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多卷本的《苏维埃俄国史》。

代替了宪法和政治的目标时，历史学家们便转而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过去。“既然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任务，比起具有政治和宪法目标的任务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代表更宽广的和更先进的阶段，那么，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历史便可以说代表着比单纯的政治解释更为先进的历史阶段。”(135页)这些看法，无疑含有正确的因素，是值得我們认真考虑的。

但是，卡尔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阐明上述主张的同时，又往往流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他想把“规律”的概念排除于科学之外，而代之以“假设”的概念。他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不再象十八、九世纪的同行们那样相信规律的存在了，“如今，无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怀着一种比较谨慎适中的愿望，想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向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前进”(64页)。他断言，无论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规律、拉萨尔关于工资的铁的规律，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有这些提法都“显得既有些陈旧，同时也有些傲慢”(60页)。对于马克思所说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他也认为“这不能算作一条规律”，“却是一种有益的假设”(62页)。卡尔的这种看法实质上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与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基本上一样了。但是，客观真理是存在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分析，已为实践所证明，它确实确实是真理，而不是什么“有益的假设”。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是多么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可能穷竭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谁要是在这里猎取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9页）。但是，这绝不是说，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彼此一样，无非都是些不完整的假设。我们在记住上述恩格斯的那段话的同时，不可忽略：唯物主义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页）盖尔和卡尔的观点，在指出历史评价永远在变化之中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相对主义，而不懂得或不承认“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同上书第133页）。

卡尔对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看法。他承认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反对把“伟大人物放在历史之外，认为这些人是依仗他们的伟大强使历史依从自己”（55—56页）的看法。他还指出，“认定个人天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的愿望，是历史意识的初级阶段的特点。”（45页）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卡尔则认为“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个数目的问题。”（50页）他说：“一切有效果的运动都只有很少几个领导人物，但是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并不是说这大批人对他们的取得胜利毫不重要。数目在历史里是举足轻重的。”（51页）但是，这不单纯是个数目的问题。要知道，量的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马克思曾以协作为例，说明“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

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62 页)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就产生了“新力量”。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至于伟大的革命运动,那是“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476 页)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对于历史有无价值的问题,卡尔是持肯定意见的。他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进行概括,并通过概括,“把从一连串事件中所获得的教训运用到另外一连串事件上去”(70 页),从而“为将来的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72 页)他不赞成那种认为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看法,说这是“为大量显著的事实所批驳的”(70 页)。

最后,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他明确宣告他对社会的未来,对历史的未来充满信心,在本书的结束语中说了下面这样一段颇有诗意的话:“刘易士·纳密尔爵士警告我,叫我远远避开计划和理想,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我们不是朝一个特定的目标进发,最重要的就是小心别让人把船弄得摇晃不定,波珀教授想依靠小小的点滴管理,在路上保留下那个原有的亲爱的 T 字形拐角,特雷弗·罗珀教授对准大嚷大叫的激进派人士的鼻子打了一拳,而莫里森教授则呼吁以理智的保守精神写出历史,在这时候,我将展望这个在动乱中的世界,在阵阵剧痛中的世界,而且将借用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大家用得有些陈旧了的词句回答说:‘可是地球还是运行呀!’”(171 页)卡尔是一位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而且是已经没落的大英帝国的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但是他仍然毫不气馁地要追求历史的未来，不满足于点滴的改良，也不怕在惊涛骇浪中翻船。我们，人民中国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难道不应该比他更信心百倍地展望共产主义的光明远景，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竭尽全力地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吗？

齐 华 甫

一九八〇年十月三日



#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1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29
第三章	历史，科学和道德	58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93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118
第六章	在扩展中的天地	146
索引		172

#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 事实

历史是什么？为了免得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提得多余，我打算在本文中引用两段与第一版和第二版《剑桥近代史》分别有关的文章。阿克顿在1896年10月就他负责编写的这部著作向剑桥大学出版部的委员们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这样写道：

这是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把十九世纪将要遗留给后代的知识详加纪载的绝好机会。……根据恰当的分工，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是能使国际研究中的最新文献和最成熟的结论深入人心的。

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问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到达的境地。<sup>①</sup>

几乎整整六十年以后，乔治·克拉克教授<sup>②</sup>在他为第二版《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论中，对阿克顿及其合作编著者相

---

<sup>①</sup> 《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 第10—12页。

<sup>②</sup> 原文为 George Clark。——译者

信有一天终将产生“终极的历史”这一提法作了评论，接着指出：

后世的历史学家并不向往这么一种前景。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一再被后人超过。他们认为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由他们“加工处理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素……这样的探索仿佛是无止境的，可是有些缺乏耐心的学者却在怀疑主义之中找安慰，至少是在这样一种学说之下找安慰，这就是：既然所有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一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sup>①</sup>。学者们彼此大相径庭的地方，正是这一领域有待于探究的所在。我希望我本人还能够赶得上时代，因而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东西无非是些无稽之谈。不过，我也还不会先进到这样一种地步，乃至醉心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任何东西必然都是很有道理的。的确，你们可能已经想到，这种探索容易超出范围，涉及甚至比历史的性质这种问题还要广泛得多的题目。阿克顿跟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冲突，反映了在他们两个提出两种看法的这一段时期之间，我们整个的社会观的改变。阿克顿说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念，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能明辨是非的自信心。乔治·克拉克爵士则跟垮掉的一代的惶惑不安以及心意缭乱的怀疑主义起了共鸣。当我们试图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们的

---

<sup>①</sup>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第24—25页。

回答便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我们自己在这一时代的地位，而且也构成了对另一范围较广泛的问题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便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我并不担心我的课题在精心的考察之下，显得有些琐细平凡。我所担心的只是，我提出了这么个既广泛又重要的问题，显得有些不揣冒昧。

十九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sup>①</sup>这部小说里的葛雷格来德先生说：“我所需要的是事实……生活之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同意他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朗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咒文也像大多数咒文一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自己释去一肩重负，不再进行独立思考。实证主义者，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因而对于崇拜事实这一点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之中得出结论。在英国，这种历史观恰恰适合于从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作为英国哲学主流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经验主义关于知识的理论是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完全分离。事实，就像感官印象一样，从外界向观察者袭

---

<sup>①</sup> 《艰难时世》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葛雷格来德是书中主人翁之一。——译者

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的。接受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了资料之后随即就这些资料采取行动。缩编牛津字典是一部有用的辞书,可也是一部有倾向性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辞书。它给事实一辞下的定义就是:“区别于结论的一种经验的资料”,这样一来便把两个过程截然分开了。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普通常识的看法。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带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阿克顿的口味比较纯朴,便把它们做得清淡一些。在他给第一版《剑桥近代史》编纂人的指示信中,他宣布了这样的要求:“我们的滑铁卢必须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人能看得出牛津的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了笔,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去的。”<sup>①</sup>就拿乔治·克拉克爵士来说,尽管他批评了阿克顿的态度,他自己也是把历史中“事实的硬核”跟“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待争论的解释”<sup>②</sup>相对比的——这里他也许竟忘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凭藉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这不禁使人想起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sup>③</sup>的名言:“事实是神圣

---

① 阿克顿:《近代史讲演集》(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6),第318页。

② 引自《听众》(The Listener, June 19, 1952),第992页。

③ 原文为C. P. Scott。——译者

不可侵犯的，意见却是不受拘束的。”

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不想从事一场对我们过去知识的性质作哲学上的讨论。为了当前的目的，让我们假定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一事实跟这屋子当中有一张桌子这一事实，是同类的**事实**，或者是可予比较的事实，这两件事实以相同的形式，或者以可予比较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而它们跟知道这些事实的人的关系，则都具有一种客观的性质。可是，甚至在这种大胆的、不大能自圆其说的假定之下，我们的论据仍然立刻碰到这样的困难，即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那么，区别历史事实跟其它关于过去的事实的标准是什么呢？

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我们必须较仔细地加以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常识的看法，有一些基本事实，对于所有历史学家说来全是一样的，这就构成了所谓历史的中枢——例如，哈斯丁斯战役发生在1066年这种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种看法还要求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跟历史学家有根本关系的并不是像这样的事实。知道这次重大战役是在1066年而不是在1065年或1067年打的，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在伊斯特本或布莱屯打的，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这些弄错了。不过，提出了这类论点以后，我就想起了豪斯曼的说法：“准确是责任，不是美德。”<sup>①</sup>称赞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准确，就像称赞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中用了干燥的木材，或者适度的混凝土。这是他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

<sup>①</sup> 梅里利亚斯：《天文：卷之一》（M. Manilius: *Astronomus: Liber Prim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第二版，第87页。

主要职能。正好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历史学家有权利依靠所谓历史学的“辅助科学”——考古学、碑铭学、古钱学、年代学等等。历史学家并不要求具备一个专家那种特有的技能，鉴定陶器或大理石残片的来源和年代，辨认费解的碑铭，为确定精确年代费尽心思作出庞大数字的计算。这些所谓基本事实对所有历史学家全是一样，通常属于历史学家的素材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本身的范畴。第二个需要考察的便是：确定这些基本事实的必要性并不在于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质，而在于历史学家“既有的”决定。尽管斯科特的格言是如此，但每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我记得是彼兰德罗的剧中人物之一说过，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很想知道这次战役是1066年在哈斯丁斯进行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历史学家把它当作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正是历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理由来决定凯撒渡过那条小河卢比孔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在此前后，成百万的其他的人渡过这条河，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半小时以前，你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或者乘汽车来到这栋房子，这一事实跟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一样，也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事实。可是，这一事实大概不会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sup>①</sup>曾经把科学叫做

<sup>①</sup> 原文为 Talcott Parsons。——译者

“以现实为明确方向的、经过选择的体系”。<sup>①</sup>这句话也许还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不过，历史除开还是别的一些东西以外，也就是这个。历史学家当然是要选择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

让我们看一看一件单纯关于过去的事实变成一件历史事实的过程。1850年在斯塔利桥威克斯地方，一个卖假货的小贩跟人发生了小小的口角，竟至被一伙暴徒踢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么？一年以前，我本来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不是。这件事由一个目击者记载在某一本不甚知名的回忆录里。<sup>②</sup>我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一年以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sup>③</sup>在牛津的福德讲座的讲演中提过它。<sup>④</sup>这就使这件事变成一个历史事实了么？我认为还没有。我觉得它目前的身份是有人推荐它加入经过精选的历史事实俱乐部为会友。它现在仍在等待附议人和赞助人。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也可能看到这一事实先在有关十九世纪英国的文章和书籍的脚注里出现，然后在正文里出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可能成为一件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说，也许没有人再提起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落入

---

① 塔尔卡特·帕逊斯与爱德华·希尔斯：《向行动的一般理论前进》(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3r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第167页。

② 乔治·桑格：《七十年的头面人物》(Lord George Sanger: *Seventy Years a Showman*,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26), 第188—189页。

③ 原文为 Kitson Clark。——译者

④ 这些讲演最近将用《维多利亚英国之形成》(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这一书名发表。



有关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基特森·克拉克博士一片侠义心肠原想从这深渊之中把它挽救回来的。究竟什么东西决定这两件事情之中哪一件会发生呢？我想这要取决于基特逊·克拉克引证这一事件来支持的那个命题或解释，其他历史学家是否也认为很有根据和意义。它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这一问题上。解释这一因素渗入每一件历史事实之中。

可否让我提起一件本人记忆中的事情？好些年前我在这个大学里念古代史的时候，我有过一项专题研究叫“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我收集了十五册或者二十册的书籍放在书架上，而且认为在这些书里，我所需要的有关我的题目的材料全都有了。我们可以假定——而且也非常接近于事实——这些书籍是包括了当时已经知道的，或者当时可能知道的一切事实。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去追问，从以前有人知道过的堆积如山的事实之中，到底经过甚么偶然的会或者什么样的消逝过程，这些精选的事实才保留下来成为历史事实。我猜想，甚至在今天，古代史和中古史令人神往的道理之一便是：它给我们一种错觉，使我们以为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可供处理的事实。在这里历史事实和其它关于过去的事实之间的讨厌的界限已经消除，因为已知的这点点事实全是历史事实。研究过这两个时期的伯里说过：“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纪载中到处都是漏洞。”<sup>①</sup>历史曾被叫做一具缺了许多零件的巨大的机器钢丝锯。不过，主要的麻烦并不在于漏洞。我

---

<sup>①</sup> 伯里：《短论选集》(John Bagnell Bury: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第 52 页。

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部分已偶尔丧失，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作出的。五世纪时的希腊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从斯巴达人、哥林多人、须卜兹人看来它是怎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于波斯人，对于奴隶，或者居住在雅典的非公民它是怎样的了。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受一特定观点的影响，并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点的一些事实是有保存价值的。同样，当我在一本现代人写的中世纪历史中读到中世纪人对宗教十分虔诚时，我就在揣度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其真实性如何。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中世纪历史的事实，差不多全是由历代的编年史家为我们选择的。他们的专业就是从事宗教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因此，他们认为宗教最为重要，便把有关宗教的每一件事都记载下来，而别的东西便记载得极少。把俄国农民描绘成虔诚地信奉宗教的这种形象，被1917年的革命摧毁了。中世纪人虔诚地信奉宗教的形象，不管是否真实，都是摧毁不了的，因为关于中世纪人的一切已知的事实都是人家预先为我们选择好了的。这些人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别人也相信这一点。其它的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证据反驳这一说法的大量事实，却又已经无可挽回地失散了。已经死去的历代史学家、纪事者和编年史家一手确定了过去的型式，毫无挽回的可能。巴勒克拉夫教授本人是个有素养的中古史学家，他这么写道：“我们所读的历史，虽然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但严格说起

来一点也不合乎事实，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sup>①</sup>

让我再看看近代历史学家的另一种、但是同样严重的情况。古代史和中古史的历史学家对于大规模的甄别选择的过程，可能是很感激的。这一过程，经过这些年代，提供给他由他自由处理的大量历史事实。利顿·史特雷奇说过这样俏皮的话：“愚昧是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这是指能简化、阐明的那种愚昧，能选择、省略的那种愚昧。”<sup>②</sup> 当我总是羡慕，我有时候也的确总是羡慕从事写作古代史或中古史的同事们的极大能耐时，我却在这样的想法里找到了安慰。这种想法便是：他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只因为他们对他们从事的学科愚昧无知。近代历史学家并没有从这种内在的愚昧无知得到任何好处。他应该为自己培养这种必需的愚昧——他越这样就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他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可是，这跟十九世纪的那个异端恰恰相反。那个异端就是：历史包括编纂最大数量无可辩驳的、客观的事实。任何屈服于这种异端的人，要么得把历史当作一件坏事加以放弃，开始热衷于集邮或其它爱好古董的方式；要么就只好进疯人院去终其天年。正是这种异端，在过去的百来年里，对近代历史学家发生了那么大的摧毁性的影响，在德

---

① 巴勒克拉夫：《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历史》（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Mott; 1955），第14页。

② 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序言（Lytton Strachey: *Preface to Eminent Victorians*）。

国、英国以及美国产生了一大批、而且还在增长的大批枯燥无味、充满事实的史书，专门已极的论著，还有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里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东西，不留一点痕迹地沉没到事实的大洋中去了。我想就是这种异端——而不是所谓忠实于自由主义与忠实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斗争——使阿克顿这个历史学家遭到挫败。在一篇早期的论文里，他这么谈论他的老师德林格尔<sup>①</sup>：“他是不肯用不完全的材料进行写作的，而对他说来，材料总是不完全的。”<sup>②</sup>阿克顿在这里肯定是预先给自己作了一个判断，也就是给一个历史学家的一种奇怪的现象预先作了一个判断。这位历史学家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大学里近代史钦定讲座最有名的主讲人——可是，他写的不是历史。在阿克顿逝世不久后发表的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的序言里，他哀叹着压在历史学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从一个饱学之士变成一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之势”，<sup>③</sup>说这种话的时候，他实际上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里面是有毛病的。毛病就在于相信不知疲惫地、无止境地积累不可动摇的事实是历史的基础，相信事实自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决不嫌事实之多。这种信念在当时显得如此不必怀疑，因而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想到还有必要——有些历史学

① 原文为 Döllinger。——译者

② 乔治·古治：《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George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52), 第 385 页，引用了这段话。以后阿克顿又曾谈到德林格尔，说“他的历史哲学建立在人们可能得到的最大的归纳的推理之上。”见《自由史及其它短论》(*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7), 第 435 页。

③ 《剑桥近代史》，第 1 卷(1902 年)，第 4 页。

家今天仍旧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出这么个问题：历史是什么？

十九世纪对文件的崇拜使这一时期对于事实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且更具有理由。文件就是事实这座圣殿里那个盛摩西十诫的大柜。虔诚的历史学家低着头走近它们，用敬畏的音调谈论它们。只要你在文件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然而，只要好好加以研究，这些文件——这些法令、条约、地租帐簿、政府或议会的报告书、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记——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发生或将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想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历史学家在它上面加过工，作过解释以前，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事实，不论出自文件与否，在一个历史学者加以利用以前，还必须由他加工处理。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我就要说历史学家对这些文件的利用就是加工处理的过程。

让我举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我打算要说的话。当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高斯塔夫·施特雷泽曼<sup>①</sup>于1929年逝世后，他留下来一大批——装满三百箱的——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差不多全跟他担任六年的外交部长职务有关。他的朋友和亲戚很自然地认为应该建立一座石碑来纪念这么伟大的人物。他的忠实的秘书伯恩哈特<sup>②</sup>便开始工作。三年之内便出现了从三百个箱子里挑选出来的厚厚的三大册文

① 原文为 Gustav Stresemann。——译者

② 原文为 Bernhardt(一译博哈特)。——译者

件，每册约六百页，冠以这样的引人注目的书名《施特雷泽曼的遗产》<sup>①</sup>。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文件原会在某一个地窖或阁楼里自己朽坏掉，从此永远消失。或者，也可能在一百多年以后，有那么个好奇的学者偶然看到这些文件，便动手拿它们跟伯恩哈特的版本加以比较。已发生的情况比这个要富于戏剧性得多。1945年，这些文件落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手里。它们把这大批文件照了相，而且把影印照片交由伦敦的公共案卷处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局的专家们使用。因此，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好奇心，便可以发现伯恩哈特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所做的事既不特殊，也不惊人。施特雷泽曼死的时候，他的西方政策似乎已经获得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罗加诺条约之缔结，德国之加入国际联盟，道威斯与杨格赔款计划，美国贷款，协约国军队自莱茵地域的撤退。这似乎就是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的重要的和有收获的部分。在伯恩哈特的文件选集中过分着重表现了这一部分，这也不是不自然的事。在另一方面，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他跟苏联的关系都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成就。既然谈判只产生一些微不足道的结果，大量有关谈判的材料便没有多大意思，也不能增加施特雷泽曼的声誉，因此，选择这些材料的办法就可以严厉一些。事实上，施特雷泽曼经常地也是忧心忡忡地花更多力量注意着跟苏联的关系。就他整个的外交政策看，德苏关系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伯恩哈特选集的读者所能推测得到的。不过，我认为伯恩哈特的几册书，跟坊间出版的、为寻常的历史学家所盲目信赖的许多文件汇编比起来，那要好得多。

<sup>①</sup> 原文为 Stresemanns Vermächtnis。——译者

我的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伯恩哈特的几册书问世不久，希特勒便上了台。施特雷泽曼的名字在德国被人置之脑后，这几册书也就不再流传。有一些版本，也许是大部分版本想必已经销毁。现在《施特雷泽曼的遗产》已经成为相当稀有的书籍。然而在西方，施特雷泽曼的声誉还是很高的。1935年，英国一位出版商印行了一部伯恩哈特的著作的节译本——伯恩哈特的选集的选集，大约节略了原书的三分之一。萨顿<sup>①</sup>是个著名的德文著述的翻译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在序言中这么说：英译本只是“略加压缩，而且压缩的办法也只是删去一部分看来英国读者或研究者不感兴趣的、只有一时意义的东西。”<sup>②</sup>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结果却是在伯恩哈特的书里已经表现得不够的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在我们的眼前就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了。在萨顿的几册书里，苏联只是作为一个偶尔出现、不受欢迎的、闯进施特雷泽曼大占优势的西方外交政策中去的不速之客罢了。不过，这样说准没有错：所有的人之中，除开少数专家以外，都认为是萨顿，而不是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文件本身——向西方世界表达了施特雷泽曼的真实意见。如果这些文件在1945年的大轰炸中毁灭了，如果剩下的伯恩哈特的书也没有了，萨顿的真实性和权威就永远不会有问题了。由于缺乏原件，历史学家们带着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许多印行的文件汇编，而这些文件汇编并不比上面所谈的这部书有更可靠的基础。

<sup>①</sup> 原文为 Sutton。——译者

<sup>②</sup> 《高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日记、书信和文件》(Gustav Stresemann: His Diaries, Letters, and Paper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5) 第1卷，编者按语。

我还打算把这个故事谈得更深入一步。我们且先别管伯恩哈特和萨顿。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查阅这位参预过当代欧洲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的领导人物的真实文件。文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文件之中除其它一些东西之外,还包括了施特雷泽曼跟在柏林的苏联大使好几百次谈话的纪录,跟契切林<sup>①</sup>二十来次谈话的纪录。这些纪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施特雷泽曼描写成占住了这些谈话中的绝大部分,而且他发表的论点全无例外地提得又好又有力,跟他谈话的人的论点则大部分是零零落落、混乱而且毫无说服力。这是一切外交谈话的纪录中人所熟知的一个特点。这些文件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仅仅告诉我们施特雷泽曼心里想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他要别人想象、甚至要他自己想象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开始这种选择的过程的不是萨顿或伯恩哈特,而是施特雷泽曼本人。如果我们手边有,比如说,契切林关于相同的这些谈话的纪录,我们仍旧只能从这些纪录知道契切林是怎么想的,真正发生了的事情也还只能在历史学家的脑子里加以再创造。当然,事实和文件对于历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们。它们并不能单独地构成历史。它们本身也不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麻烦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说到这里,我想就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一般表示冷淡这个问题说上几句。这一术语是伏尔泰创造的,而自他以后,运用起来便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我如果打算用它,我便认为它的意义就是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十九世

<sup>①</sup> 原文为 Chicherin。——译者



纪对于西欧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个称心如意的时代，它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些事实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对这些事实提出难题，并且要求解答的倾向也就相应地要弱一些。朗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布尔克哈特<sup>①</sup>带着更为现代的冷嘲热讽的味道说：“没有人叫我们知道永恒智慧的心意。”巴特菲尔德教授<sup>②</sup>迟至1931年显然非常满意地写道：“历史学家很少想过事物的性质，甚至很少想过他们自己的那个科目的性质。”<sup>③</sup>在我之前担任这个讲座的罗斯博士采取了比较恰当的批评态度，对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世界的危机》——他那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本书就其品评人物、鲜明生动、充满活力而言，是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相匹敌，但在一个方面稍逊一等，这就是：这本书里“没有历史哲学”。<sup>④</sup>英国历史学家拒绝表示意见，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没有意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是含蓄的，同时也是不讲自明的。十九世纪关于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跟经济方面的自由竞争的学说是血肉关系的——这也是一种沉着、自信的世界观的产物。让各人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好自为之，而那只神秘的手就会在暗中照应着整个世界的和谐。历史事实的本身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事实的明证，这就是朝更高的境界仁慈亲切地，而且显然是永无止境地向前迈

① 原文为 Burckhardt。——译者

② 原文为 Butterfield。——译者

③ 巴特菲尔德：《辉格派的历史观》(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31), 第67页。

④ 罗斯：《一个时代的终结》(Alfred L. Rowse: *The End of an Epoch*, London: Macmillan & Co., 1947), 第282—283页。

进。这是天真无邪的时代，历史学家在伊甸园里走着，不用哲学来遮蔽身体，在历史这位上帝的跟前，一丝不挂，也没有感到害羞。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恶，同时体验到了堕落。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妄想抛开历史哲学，就只不过像一些裸体主义者，徒然忸忸怩怩地，想在自己郊外的花园里重建一座伊甸园一样。今天，这个使人作难的问题是不能再回避的了。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在“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作过许多严肃认真的工作。德国是个干了许多事情，搅扰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称心如意的统治地位的国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首先向历史事实该居首要地位，历史事实应该独立自主这样的学说提出挑衅的，也就是德国。提出挑衅的哲学家现在只不过留下了几个名字。他们之中也只有狄尔泰<sup>①</sup>最近才在英国得到一些为时已晚的认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前，英国极为繁荣，信心极大，因而对那些攻击崇拜事实的异端，不加注意。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这支火炬传入了意大利。克罗齐开始提出他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显然受了德国大师们很大的影响。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②</sup> 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在的眼光、根据当前的

① 原文为 Dilthey。——译者

② 这一有名的格言的上下文是这样的：“作为每一历史判断的基础的实际要求，使得一切历史具有‘当代史’的性质，因为，不管这样详加记述的事件的年代看来有多么久远，而实际上，历史所涉及的是当前的需要以及这些事件活动于其中的当前的局势。”（贝奈戴·克罗齐：《作为自由史的历史》第19页。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1）

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纪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纪载下来的？1910年，美国哲学家卡尔·贝克尔<sup>①</sup>故意使用挑战性的语言论证道：“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sup>②</sup>这些挑战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只是到1920年以后，克罗齐的学说才在法国和英国相当风行。这也许不是因为克罗齐跟德国的前辈比起来，是个更为精明的思想家，或者是个更富于文采的学者，而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事实向我们投过来的笑脸没有1914年以前那些年那么慈祥了，因而我们便容易接受一种有意贬低事实的威望的哲学了。克罗齐对于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科林伍德<sup>③</sup>有重大的影响，后者是本世纪对历史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仅有的英国思想家。他没能写成他计划中的系统论著便去世了，不过他关于这一主题的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文章，在他逝世后都已收集成书，定名《历史的观念》<sup>④</sup>，于1945年问世。

科林伍德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下列这些。历史哲学所牵涉到的并不单是“过去”，也不单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想法”，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断言反映了现在通用的、“历史”这一词的两重意义——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索以及历史学家所探索的一系列过去的事件。）“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

① 原文为 Carl Becker。——译者

② 《大西洋月刊》，1928年10月号，第528页。

③ 原文为 Collinwood。——译者

④ 原文为 The Idea of History。——译者

的过去。”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懂得在一个过去的行动的背后的思想,那个行动对他来说就是死了的,也就是说毫无意义的行动。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在历史学家的脑子里把过去重新加以组织,要靠经验的证据。但是这本身并不是一种经验的过程,也不能只是叙述一些事实。恰恰相反,重新组织的过程支配着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这的确就是使这些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关键所在。奥克肖特教授在这一点上是跟科林伍德很接近的。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sup>①</sup>

对于这种尖锐的评论,尽管必须作许多重要的保留,但它却揭示了某些被人忽视的真理。

首先,历史事实既然不会也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因而当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们总是通过纪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从这一点推论下去便是:我们拿起一本历史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不是里面所包括的事实,而是写这部著作的历史学家。让我拿特里维廉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作为例证。这一套讲座就是为了纪念他并以他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特里维廉在他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是“在富于辉格派的传统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sup>②</sup>如

① 奥克肖特:《经验及其程式》(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第99页。

② 特里维廉:《自传》(G. M. Trevelyan: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49),第11页。

果我把他描写成受辉格派传统影响的、英国最后一个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伟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我希望他不会否认这种头衔。他追溯自己家庭的世系，从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乔治·奥托·特里维廉追溯到辉格派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麦考利，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特里维廉博士最好的和最成熟的著作《安女王治下的英国》就是根据这样的背景写成的。这部著作也只有根据这样的背景来读，才能对读者产生充分的意义。作者也的确使得读者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如果按照读侦探小说的行家的办法从小说的结局读起，你就会发现第三卷的最后几页上，有现今所谓辉格派历史观的总结，而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总结。你将看到特里维廉企图要做的就是研究辉格派传统的起源和发展，而且在这种传统的建立者威廉三世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切实地庇护着这种传统。尽管这也许并不是对安女王治下所发生的事件唯一可能的解释，然而它是根据事实的、而且在特里维廉的手里更是一种很有实效的解释。可是，要充分赏识它的全部价值，就得了解历史学家在干什么。正如科林伍德所说的，如果历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思想里重建他的剧中人物脑子里有过的东西，那么，一个读者也就必须重建历史学家脑子里有过的东西。在开始研究事实之前必须先研究历史学家。这一点毕竟不是什么玄妙费解的。这样的事有头脑的大学生已经做了。有人向一个大学生推荐阅读那位伟大的学者圣朱迪地方的琼斯的一本书，这位大学生便跑到在圣朱迪的一个朋友那里去打听，琼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脑子里苦思冥想的又是些什么。读一本历史著述时，应该仔细倾听作者的心声。如果你听不出什么

声音，要么是你有些重听，要么那位历史学家便是个钝才。事实的确并不像鱼贩子案板上摆着的鱼。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及的海洋里的鱼。历史学家能钓到什么，这一部分要靠机会，而主要地要靠他到海洋的哪一部分地区去钓，他用的钓具是什么——这两个因素当然是由他要钓哪种鱼而决定的。从整体看来，历史学家是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材料的。历史就意味着解释。说实在的，如果我把乔治·克拉克爵士的话颠倒过来，硬要说历史是“一个解释的硬核，它外面包着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水果”，我这种提法无疑会是片面的、容易使人误解的，不过，我敢说一句，这并不比原来那句格言更加片面，更容易使人误解。

第二点是大家更加熟悉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我说“富于想象力的理解”这一词，而不说“同感”，因为我怕有人把同感看作暗指同意。十九世纪对于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是很薄弱的，因为这个世纪非常厌恶中世纪的那些迷信以及由迷信而引起的野蛮行为，因而对于中世纪人民没有任何富于想象力的理解。再举布尔克哈特关于三十年战争的那句吹毛求疵的评语为例。“把自己的得救摆在民族的完整之上，这样的教义，不管它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都是极为可耻的。”<sup>①</sup>一个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所受到的教养使他深信为保卫国家而厮杀是正确的、值得颂扬

---

<sup>①</sup> 布尔克哈特：《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价》（Jakob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London: S. J. Reginald Saunders & Company, 1958），第 179 页。

的,为了保卫宗教而厮杀便是极不道德、极为错误的。要使这么一个人理解那些参加三十年战争的人们的心情,那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在我现在研究的这个领域里就尤其厉害。过去十年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材料,以及在苏联写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材料,都由于对对方心里想的缺乏一种最起码的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损害,因而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被弄成有恶意、没有道理或者虚伪的样子。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触,是写不成历史的。

第三点是:我们只有通过现在这双眼睛才能看到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他所用的那些词汇——如民主,帝国,战争,革命等等——都有当前流行的内在涵义,而他是不可能使这些词汇脱离它们的涵义的。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喜欢用诸如 polis (市民)和 plebs (平民)这类词的原文,仅仅为了说明他们没有掉进这个陷阱。其实这并不能帮他们多少忙。他们也是生活在现代的,他们不能靠采用一些冷僻的或者已废弃不用的词汇来欺骗自己,说自己是生活在过去,这正好比他们即便穿上罗马人的短披风或者宽松的罩袍来讲学,也不能使他们变成更好的希腊或者罗马历史学家一样。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历史学家曾经用许多名词来描写那些在革命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巴黎老百姓,而所有这些名词——如 les sans-culottes (极端共和主义者), le peuple(下层群众), la canaille (暴民), les bras-nus (光胳膊汉)等——对于懂得此中奥妙的人说来,都是表明政治从

属关系和特殊解释的宣言。历史学家都非作出选择不可：文字的运用不容许他持中间态度。况且这还不只是一些词汇的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欧洲已经改变了的均势使英国历史学家对斐特烈大帝的态度完全颠倒过来。在基督教教会内部罗马天主教教义与新教教义之间已经改变了的均势，深深地改变了他们对这样一些人物，如罗耀拉、路德以及克伦威尔的态度。只要对过去四十年来法国历史学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述有一些肤浅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些著述受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多么深刻的影响。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特雷弗-罗珀教授<sup>①</sup>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应当爱过去”<sup>②</sup>。这是一道含糊的训令。爱过去很可能就是老年人和老的一些社团发怀古之幽情的表现。也是对现在或未来失去信念和兴趣的征兆。<sup>③</sup>如果用陈辞滥调代替陈辞滥调，我倒更加喜欢这句话：从“过去这只死了的手”里把自己解脱出来。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爱过去，也不是从过去之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

如果这就是我所谓的科林伍德历史观的某些内容，那么，现在就是考虑一下某些危险的时候了。强调历史学家在历史

① 原文为 Trevor-Roper。——译者

② 布尔克哈特：《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价》一书序言，第17页。

③ 试与尼采关于历史的观点对比：“属于旧时代的有老人们的这样一些事情：回顾过去，算算老帐，从记忆过去和历史文化之中寻找安慰。”见《过了时的想法》(Thoughts Out of Seas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9), 第2卷, 第65—66页。



写作中的作用,如果穷究其逻辑结论,那就会有排除一切客观的历史的倾向,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创造的。就像在一位编者引用过的一个未发表的注释里那样,科林伍德有一个时期是达到了这种结论的。这就是:

圣奥古斯丁是从一个早期基督教徒的观点出发来观察历史的;蒂利蒙特则从一个十七世纪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出发;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出发。要问谁的观点正确是没有意义的。每一观点就是采用这一观点的人唯一可能采用的观点。<sup>①</sup>

这是纯粹的怀疑论,正像弗劳德<sup>②</sup>的说法一样。弗劳德认为历史是“小孩的一匣子字母,我们爱拿它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sup>③</sup>。科林伍德反对“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反对把历史看作仅仅是编纂事实的那种观点,他这样反对时,却又危险地走到另一极端,即几乎把历史当作从人的脑子里编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引回到乔治·克拉克爵士在我上面引用的那段文章中谈到的那种结论:“‘客观的’历史真实是没有的。”用来代替那种历史没有意义的理论的,便是这个历史有无数种意义的理论,而这些意义之中,这一意义并不比另一意义更正确一些——这种理论跟前一种理论也差不了多少。第二种理论跟第一种理论一样,肯定也是站不住脚的。并不能因为从不

---

①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Robin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46),第12页。

② 原文是 Froude。——译者

③ 弗劳德:《若干重大问题浅论》(James Anthony Froude: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1894) 1卷,第21页。

同角度看山,山会有不同的形状,就推论说山在客观上要么根本没有形状,要么就有无数种形状。并不能因为解释在确立历史事实时有它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还不完全客观,就推论说这一解释跟另一解释一样好,而历史事实大体上是无法依从一种客观解释的。我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讨论历史的客观性的确切意义究竟是什么。

但是在科林伍德的假设之中还潜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必须以他自己的时代的眼光来看他所研究的历史时代,而且研究过去的问题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锁钥,那么,他难道不会落入用纯实用主义观点看待事实的窠臼,从而主张正确解释的准则就在于它是否符合当前的某种目的?在这一假设之中,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却是一切。尼采早就宣布过这条原则:“一种意见的虚伪并不能促使我们来反对它……问题在于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个意见能助长生命,保持生命,保持物种,甚至也许是创造新种。”<sup>①</sup>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尽管不那么明确、不那么热心,却也是沿着这条同样的路线往前走的。知识就是为了一定目的的知识。知识之正当就靠目的的正当。就是在那些没有公开宣扬这种理论的地方,实际的运用也并不令人安心些。在我研究的这个领域里,不顾事实、任意解释、丝毫不为这种危险的现实所动的例子,我见得太多了。读一些苏联史学学派和反苏的史学学派的比较极端的著述,有时便使人产生一种怀旧之感,怀念那种迷人的、十九世纪纯事实的历史,这一点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我们如何明确历史学家对于事

<sup>①</sup> 弗劳德:《超乎善恶之外》(Froude: Beyond Good and Evil) 第1章。

实应有的义务呢？我自信近年来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寻觅并细读一些文献，并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加上些恰当的事实作脚注，以免背上轻率处理事实和文献的坏名声。历史学家所担负的尊重事实的义务并不以他负起了注意事实是否准确的义务而告终。他必须设法非常生动地描述所有已经知道的或者有可能知道的事实。这些事实在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之下，要跟他所研究的主题有关，跟所提出的解释有关。如果他打算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当作一个有道德有理性的人来描写，他就不应该忘记在1850年一年一度的斯泰利布里奇假日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过，这还不是说他可以排除解释。解释是历史的生命必须的血液。有些外行——这是指学术界以外的朋友或者其它学术领域中的朋友——有时候问我，历史学家写历史时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最通常的假设就是，历史学家把他的工作划成截然分开的两个方面或两个时期。首先，他用很长的预备时期阅读资料，笔记本上记满了事实。做完了这一步，他才把资料放在一边，拿出笔记本来，然后一气呵成地写他的书。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既不足说服人，也没有什么道理。就我来说，我才一开始钻研一些我所认为重要的资料，跃跃欲试的心情便如此强烈，于是我就动手写起来——当然倒也不一定在开始的阶段，但总是在某一阶段，任何一阶段就动手了。从此阅读和写作便同时进行。一边阅读，所写的东西便一边有所增、减、重新组织，并加以删节。阅读是由写作来引导、指点方向，并使它产生效果的：我写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也就越理解我所找到的东西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有些历史学家也许并不用纸、笔、打字机，只

是在他们的头脑里从事这种初步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只是在自己脑子里下棋，并不要棋盘和棋子那样。这种才能我很羡慕，不过学不了。可是我相信，对于任何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说来，经济学家称之为“入量”和“出量”的这两个过程是在同时进行的，而且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你把它们分开，使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有优先权，你便落入两个异端中的一个里去了。要么你写的是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没有意义也毫不重要，要么你写的便是宣传品或历史小说，只是采用过去的事实来润饰一种文章，它跟历史毫不相干。

因此，我们对历史学家跟历史事实的关系加以检查以后，就发现我们大家处于显然是不稳定的地位，要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这个巨岩就是那种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认为事实应该无条件地比解释占住优先的地位。那个大漩涡同样也是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历史学家确立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解释的过程掌握历史事实。我们也得航行于两大历史观点之间，一种史观以过去为重心，另一种则以现在为重心。不过，我们的地位也不如看上去的那么不稳定。在这一套讲演当中，我们还要碰到以其它形式出现的、把事实和解释分开的同样的两分法——比如特殊与一般，经验的与理论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历史学家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反映人的本质。人除了在他的婴儿时期和他的晚年以外，并不完全为他的环境所拖累，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也从来不曾独立于环境之外，成为环境的绝

对的主人。人跟环境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主题的关系。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这是不可能叫这一个比另外一个居于更重要的地位的。

历史学家一开始时便就许多事实作了临时性的选择，也作了临时性的解释。这种临时性选择便是根据临时性解释不仅由他本人也由别人来作出的。当他继续工作下去时，解释和选择这两个方面以及事实的次序都在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经历一个微妙的，也许有一部分是不自觉的改变。这种相互之间的作用，也由于历史学家是现在的一部分而事实却是属于过去的，便把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进去了。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因此，我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复便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先有社会还是先有个人这样的问题，就好像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那个问题一样。无论你把它当作逻辑问题或者当作历史问题来处理，你从这方面或者那方面作出的说明，总是要被一个完全相反的、而且同样片面的说明所纠正。社会和个人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互为需要、相互补充的，并不是对立的。多恩有几句名言说：“人不是岛屿，不能完全独立于其它事物之外。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部分。”<sup>①</sup>这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再举那位正统的个人主义者穆勒的格言为例，他说：“把人集合在一起并不能变成另一种物质。”<sup>②</sup>那当然是不能的。不过，这一论据的谬误在于，它假定在把人“集合在一起”以前，人是存在的，而且是有某种物质的。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在每一历史时期或者史前时期，每一个人总是生在一个社会里的，而且从他出生的最早时期起就是由那个社会塑造的。他所说的语言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从他生长于其中的那个社会集体得来的。

---

① 《紧急关头时的祈祷》(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第17号。

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种逻辑体系》(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第7章，第1节。

语言和环境这两者都有助于决定他的思想特征；他的早期的思想是从别人那里来的。离开了社会的个人就会变成既不会说话也不会思索，这句话是说得很不错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虚构故事永远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企图设想出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这种企图失败了。鲁滨逊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个人，而是一个来自纽约的英国人。他随身带着圣经，向他那个种族所敬奉的上帝祈祷。这个故事很快又赐给他一位“星期五”，于是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工作便开始了。另外一个有关联的虚构故事便是陀斯妥叶夫斯基的《魔鬼》中的基里洛夫。他以自杀来表示他的充分自由。自杀是一个人可以随意采取的唯一自由行动。其它的行动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总要牵涉到他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成员的地位。<sup>①</sup>

人类学家通常这么说，原始人比起开化了的人来，要少一些个人的成分，而是更完全地由社会加以塑造。这是有些道理的。较简单的社会跟那些较复杂、较先进的社会比起来，在这一种意义上是要比较划一些的，那就是，这样的社会所要求的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个人技能，它所提供的机会也不是什么多样的职业。就这种意义而言，日益增长的个人化便是近代先进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也从上到下贯串在这一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但是，把个人化的过程跟社会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和结合力对立起来，是非常错误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是携手前进的，是相互制约的。的确，我们所谓复杂的或先进的

---

<sup>①</sup> 杜克汉姆 (Durkheim) 在他有名的研究自杀的著作中，新创造了“anomie”这个词，来表示跟社会隔绝的人的状态——这种状态特别容易引起情绪波动和自杀，不过，他也指出自杀绝对不是与社会条件无关的。

社会是这么个社会，在这里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采取了先进的、复杂的形式。假定近代民族社会塑造它的单个成员的性格和思想的力量，这个社会在它的成员之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划一性的力量，都要比原始部落社会的力量弱一些，这种假定是很危险的。民族性格以生物学上的差异为根据的旧观念早已被推翻了，但是，由于民族的社会和教育背景的区别而产生的民族性格之间的差异，是难以否定的。那个难以捉摸的“人性”的实体，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是如此变化多端，因而不能不认为它是由占优势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一种历史现象。比如说，在美国人，俄国人以及印度人之间便有许多差别。可是，其中有一些差别，也许最重要的差别是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就是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构成社会的方法。因此，研究作为整体的美国社会，俄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之间的差别，就可能很顺利地变成研究单个的美国人，俄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别的最好方法。开化了的人跟原始人一样，也是由社会塑造的，而且正如社会由人来塑造一样地很有效果。你不能只要鸡蛋而不要母鸡，正跟你不能只要母鸡而不要鸡蛋一样。

要不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我们眼前被产生西方世界的非凡出众、异乎寻常的历史时代所掩蔽的话，在这些真理上面饶舌是没有必要的。对个人主义的崇拜是散播得最广的现代历史神话之一。根据大家熟悉的布尔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一书的纪载（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副标题是“个人的发展”），个人崇拜是随同文艺复兴而开始的。一直到



那时为止，人总“以为自己仅仅是一个种族、民族、集团、家庭或者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到最后终于“成为一个崇高的人，而且就认定自己是那么样的人”。以后这种崇拜还跟资本主义和新教教义的兴起有了关系，跟工业革命的发端，跟自由竞争的学说有了关系。法国革命所宣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是伟大的十九世纪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摩利<sup>①</sup>那篇《论妥协》的文章是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特色的文件。这篇文章管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叫“人类幸福和福利的宗教”。“道路崎岖的个人主义”是人类前进中的基调。这可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所作的十分健全而恰当的分析。不过，我要解释清楚的是，伴随着近代世界的兴起而来的已经增长的个人化，正是蒸蒸日上的文明的一个正常进程。一次社会革命使一批新的社会集团占住有势力的地位。这种革命总是通过个人来起作用的，而且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主要是掌握在个人的手里。新社会秩序的思想意识极力强调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个人积极性的作用。但是，这整个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代表着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能用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或者个人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字眼来解释。西方世界是这一发展和这种思想意识的中心。有许多迹象表明，甚至在西方世界里，这一时期的历史已经到了尽头：在这里我用不着坚持提出所谓大众民主的兴起，也用不着提出占优势的个人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组织的形式已逐渐为占优势的集体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组织的形式所代

<sup>①</sup> 原文为 Morley。——译者

替的问题。不过，由这个很长的而且有成就的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仍然是西欧以及其它说英语的国家里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如果我们用抽象的字眼来谈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局面，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紧张局面，我们便容易忘记这样一点：斗争并不是在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的。这些斗争并不是在个人作为个人与社会作为社会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之中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许多集团之间进行的。每一集团竭力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社会政策，竭力挫败对自己不利的社会政策。不再意味着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而只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人为的对抗的这种个人主义，今天已经成为有利害关系的集团的一个口号，而且由于它本身有许多有待争议的地方，它便成为我们了解当前世界的动态的一个障碍了。用个人崇拜来反对那种以个人为手段、以社会或国家为目的的谬论，这我是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立足于社会之外的抽象的个人的概念而企图进行工作，那我们是既不可能真正理解过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在的。

上面这一些终于使我回到我说了许多离题的话的道理上来了。从常识出发的历史观把历史当作由个人写出的关于个人的东西。这种观点肯定是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和鼓励的，而实质上也不是错误的。可是，现在看来是太简单化、太不充分了。我们得往深处探索。历史学家的知识不是他独占的私人财产：世世代代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人，看来都为积累知识出过力。历史学家研究他们的行动的那些人，并不是一些在其空中行动的孤立的个人：他们是在过去的社会里各方面的联系之中、在那个社会的推动之下行动的。

我在上一次演讲里，把历史描写成一个今天的历史学家跟过去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交谈的过程。我现在打算探究一下在等式两方的个人成分和社会成分的比重如何。历史学家在多大的分量上是单独的个人，在多大的分量上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在多大的分量上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在多大的分量上则是社会事实？

历史学家毕竟是单个的人。他像其余的人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既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那个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正是以这样的资格去接触过去的历史事实的。有时候我们把历史的进程叫作“在行进中的队伍”。这样的比喻，如果不会引起一位历史学家把自己想成一只老鹰，独立巉崖，眺望景色，或者想成一位显要，高踞检阅台上，那么它就是相当确切的。历史学家岂能是老鹰或显要！历史学家只是在队伍的另一部分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行进的另一种朦胧不清的人物而已。当这支队伍迂回前进，时而偏向右边，时而偏向左边，有时又急忙折回，队伍里不同部分的相对地位经常变换，因而提出下面这种说法是非常合理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比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曾祖父辈要更加接近中世纪一些，或者也可以说，凯撒的时代比但丁的时代离我们近一些。这支队伍——以及在队伍里的历史学家——向前行进时，新的景象，观察景象的新的观点不断出现。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

即使一位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时代离他本人的时代很远，

也无损于这一不辨自明的道理。我学古代史的时候,关于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是——现在也许还是——格罗特的《希腊史》和蒙森的《罗马史》。格罗特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行写作的一位开明而激进的银行家。他通过一幅理想化了的雅典式的民主的图景,来体现政治上进步的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愿望。在他的笔下,庇里克利斯被描写成一个边沁功利主义的改革家,而且由于作者一时的漫不经心,竟使雅典获得了一个帝国的地位。有人认为,格罗特忽视雅典的奴隶制度这一问题,便反映出他所从属的那个集团没有能够正视新的英国工厂里的工人阶级,看来这种提法倒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蒙森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由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混乱和屈辱而感到理想幻灭。他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进行写作,这正好是产生“现实政治”这个名词与概念的那十个年头。他便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收拾德国人民由于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而留下的混乱局面。他那种人所共知的把凯撒理想化的作法,实际上是他极想有个强悍有力的人来挽救德国危亡的要求的产物。他所写的那个法学家兼政客的西塞罗,那个无能的饶舌家,滑头滑脑的拖延时间的人,实际上是1848年从法兰克福特的保罗教堂那几场辩论中直接走了出来的。除非我们能认识到上面这些,否则我们便无法鉴赏他所写的历史的真正价值。如果有人要说格罗特的《希腊史》今天既能告诉我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哲学方面的激进派思想的许多情况,同样又能告诉我们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民主方面的许多情况,或者还有人要说任何希望了解1848年德国自由主义者的遭遇的人,都应该把蒙森的《罗马史》当

作他的一本教科书，我当然不应该把这些说法看作毫无道理的逆说反论。同时，这些说法也不会减低这两部书作为伟大历史著作的重要性。我对于伯里在他首次讲演中所创的先例是忍受不了的。他把蒙森的伟大之处说成不在于他的《罗马史》，而在于他的碑铭集以及他关于罗马宪法的著述：这就把历史写作贬低到资料搜集的水平了。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见识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有人经常表示奇怪，为什么蒙森没有把他的历史写到共和政体衰亡以后的年代去。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还没有知识。但是，蒙森写这部历史时，那个强悍有力的人还没有在德国出现。在他写作生命正旺盛的时候，一旦有一个强悍有力的人物掌握权力便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成为现实。没有什么可以启发蒙森，使他把这个问题反映到罗马的史实中去，因而罗马帝国的历史便留下没有着笔了。

要在近代历史学家中，就这一现象列举许多例证是很容易的。在上一次讲演中，我对特里维廉博士的《安女王治下的英国》一书极力推崇，认为这是关于作者生长于其中的辉格派传统的不朽巨著。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被大部分人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在学术界的、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刘易士·纳米尔爵士<sup>①</sup>的重大成就。纳米尔是个纯粹的保守派——不是典型的英国保守派，英国保守派只要揭开外表，骨子里便成为百分之七十的自由派了。纳米尔却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英国历史学家之中没有见到过的那种保守派。从十

<sup>①</sup> 原文为 Lewis Namier。——译者

九世纪中叶到 1914 年之间这个时期,英国历史学家,除开朝好的方面的变化以外,不大可能想象其它的历史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们便进入这么一个时期,这时候,变化便开始跟对未来的忧虑结合在一起,同时可以看成是朝坏的方面的变化——这是一个保守思想复活的时代。纳米尔的保守主义,正像阿克顿的自由主义一样,是以扎根于欧洲大陆的背景,而获得它的深度和力量的<sup>①</sup>。纳米尔不同于费希尔和汤因比,他的根不是扎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之中的,他也没有因为怀念和惋惜这一点而伤过脑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无结果的和平都显示出自由主义的破产,随之而来的反响便只有采取这两种方式之一——社会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纳米尔以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了。他致力于两个选择好的领域,而这两者的选择是重要的。在英国史方面,他回溯到上一个时期,在那时,统治阶级曾经在一个秩序安定、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社会里,对于权力地位进行合理的追求。有人指责纳米尔,说他从历史之中把精神给抽掉了<sup>②</sup>。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提法,不过读者可以看出这位批评者的用意所在。在乔治三世即位的时候,政治还没有受到对一些理想加以盲目信仰的影响,没有受到对进步加以热情地信仰的影响,而

<sup>①</sup> 在这里提出下面的事实也许是有意义的。两次大战之间唯一的另一位不可忽视的英国保守派作家便是埃利奥特(T. S. Eliot),而他也是受到非英国背景的好处的。1914年以前在大不列颠长大的人,没有一个能完全不受自由主义传统的抑制影响的。

<sup>②</sup> 这种批评原来出自 1953 年 8 月 28 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一篇论《纳米尔历史观》的未署名的文章。批评是这么写的:“达尔文被人指责为从宇宙中把精神抽掉,而就不止一种意义而论,刘易士·纳米尔爵士便是政治史中的达尔文。”

这种盲目信仰是随着法国大革命才突然出现在世界上的，而且带来了胜利的自由主义的世纪。没有理想，没有革命，没有自由主义：纳米尔有意给我们描绘一个还没有受到上述三种危险威胁的光辉的景象——尽管不受威胁的日子并不久长了。

纳米尔选择的第二个主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他绕过那些伟大的近代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他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方面，没有写过什么有内容的东西——而有意地给我们一套 1848 年欧洲革命的透辟的研究。这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这是全欧洲前途大有希望的自由主义的一次挫折，这是一次例证，说明在武装暴力面前理想的空虚，在兵大爷面前民主主义者的空虚。让理想侵入政治这种严肃的事务当中去，是没有好处的，是危险的：纳米尔把这次使人受屈辱的失败叫做“知识分子的革命”来再三再四阐明这个教训。我们的结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推断而已，因为，纳米尔尽管在历史哲学方面没有系统地写过东西，可是他跟往常一样，非常清楚而且笔锋犀利地在前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一个人越少控制自己在政治学说和政治信条上的自由思考，就越有利于他的思想。”他提到人家指责他从历史之中抽掉了精神，但他对此不予反驳，只是继续写道：

某些政治哲学家对于“感到烦厌的暂时停滞”，对于目前国内在一般政治问题上没有争论的情况很抱怨。人们在寻求具体问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纲领与理想则被双方人士置之脑后了。可是对于我说来，这种态度似乎正是开始导致一个民族的更加成熟，而我只有希望这种态度

能长期地继续下去，别受政治哲学的作用的侵扰。<sup>①</sup>

目前，我不愿对这种看法进行争论，我打算保留到以后的讲演里去谈。我现在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你如果没有先就掌握住一个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工作的立场，你是无法完全理解或者重视他的研究成果的。第二，那个立场本身是扎根在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来的那样，别忘记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用现代的俗话来说便是：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是被洗过了的。历史学家在开始写历史之前，就是历史的产物。

我刚才谈到过的历史学家，如格罗特与蒙森，特里维廉与纳米尔，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放进单一的社会模型和政治模型里铸造出来的；他们的早期著述与晚期著述之间没有发生过观点上的显著变化。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在激剧变化的几个时代里，便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反映出不止一个社会，也不止一种社会秩序，而是一系列的不同的社会秩序。我所知道的说明这种情况的最好例证便是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他的生命以及创作时期特别长，充满了他的国家命运中的一系列革命性的以及灾难性的大变动。这里我们实际上便有了三个不同的梅涅克，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言人，每一个都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著作中的一部来说话。作为1907年发表《世界资产阶级与民族国家》<sup>②</sup>一书的作者，梅涅克信心十足地看到在俾士麦政权之中实现了德国的民族

---

<sup>①</sup> 纳米尔：《人物与权力》（Lewis Namier: Personalities and Power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5）第5页，第7页。

<sup>②</sup> 原文为 Weltbürgenthum und Nationalstaat。——译者



理想,而且他也像自马志尼以后的许多十九世纪思想家一样,把民族主义跟宇宙一家这一思想的最高形式等同起来:这是继俾士麦时代之后威廉的奇特风格的产物。1925年出版的《理智国家的概念》<sup>①</sup>一书的作者梅涅克在谈到魏玛共和国时,是三心二意不知如何是好:政治界已成为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未分胜负的竞争场地。道德是附属于政治的,可是它不能作为无视政权的生命与安全的最后手段。最后,193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产生》<sup>②</sup>一书的作者梅涅克被一场纳粹的洪水冲走了一切学术上的荣誉,发出了失望的呼声。他对似乎承认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那种历史主义予以批驳,同时又心神不安地摇摆于历史的相对跟超理性的绝对之间。末了,当梅涅克晚年眼见自己的国家遭受比1918年更大的军事失败而屈服时,他在1946年出版的《德国的灾难》<sup>③</sup>一书中,只得仍旧持一种信念:认为历史是听任盲目而冷酷的变化所摆布的。<sup>④</sup>心理学家或者传记家在这里是把梅涅克作为个人而对他的发展感到兴趣的。然而使历史学家感到兴趣的却是,梅涅克把三个——甚至四个——连续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现代时期反映到历史过去之中去的方法。

让我们再举一个本国的显著的例证来说明一下。在打破

---

① 原文为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译者

② 原文为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译者

③ 原文为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译者

④ 这一点我受到斯达克博士(W. Stark)的启发。他在英译本的《理智国家的概念》序言中对于梅涅克的发展作了极好的分析。这本书于1957年以《马基雅弗利主义》为题出版。斯达克博士对梅涅克在第三时期里的超理性因素也许有些夸大。

旧风气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自由党作为英国政治上的实力刚被压制下去时，巴特菲尔德教授写了一本叫《辉格派的历史观》的书。这本书享有应得的极大的成功。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尽管书里有一百三十多页的篇幅用来指责辉格派的观点，但就我不用索引所能发现的，全书除福克斯之外，没有举出一个辉格派人的名字，而福克斯不是历史学家；除阿克顿之外，也没有举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名字，而阿克顿不是辉格派，不过这本书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不寻常的。<sup>①</sup>在细节和确切方面这本书所缺乏的，都由它的才华焕发的谩骂所补偿了。读者会毫不怀疑辉格派的观点是一种坏东西，对这种观点的责难之一便是它“根据现在以研究过去。”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教授是毫不含糊，极为严厉的：

研究过去而又比如说用一只眼睛盯住现在，这是历史学中一切罪孽和诡辩的根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历史的”这个词的真谛。<sup>②</sup>十二年过去了。打破旧风气的潮流不再盛行了。巴特菲尔德教授的祖国在作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在一位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从事保卫辉格派传统中所体现的固有的自由的战争。这位领袖却经常是召唤过去“而又比如说用一只眼睛盯住现在”的。在1944年出版的叫《英国人和他的历史》的一本小书里，巴特菲尔德教授不仅断定辉格派的历史观就是“英国人”的观点，而且热忱地谈到“英国人跟他的历史之间的联盟”，以及

---

<sup>①</sup> 巴特菲尔德：《辉格派的历史观》。在第67页上，作者坦白承认对“不具体的推论”有“一种健全的怀疑”。

<sup>②</sup> 同书，第11页，第31—32页。

“现在跟过去的结合”。<sup>①</sup>着重指出这些观点上的反复，并不是一种不友好的批评。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用第二个巴特菲尔德来驳斥原始的巴特菲尔德，也不是叫清醒的巴特菲尔德教授去跟酩酊大醉的巴特菲尔德教授对质。我完全明白，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找出我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写的一些东西，责怪我的矛盾和前后不一致至少跟我在别人身上找到的同样露骨，那是一点也不困难的。说实在的，我不敢肯定我会羡慕那样一种历史学家，他经历了过去五十年中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还能够老老实实说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激剧的变化。我的目的只是要指出，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不仅事件在不断变化。历史学家本人也在不断变化。拿过一本历史著作时，只找一找标题页上作者的名字是不够的，还应该找一找出版或者写作的年代——有时候这更能说明问题。如果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说我们不可能两次走进完全相同的一条河里去是正确的话，那么以同样的理由，两本书不可能由完全相同的一个历史学家写出来，这也许同样是正确的。

如果暂时不谈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转过来看看所谓历史写作中的广阔倾向，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历史学家是他所在的社会产物，就益发明显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把历史过程看作说明进步这一原则的例证。他们所表达的，是进步极为迅速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只要历史看来还按照我们的方式前进，它对于英国历史

---

<sup>①</sup> 巴特菲尔德：《英国人和他的历史》(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第2页,第4—5页。

学家说来就是充满着意义的。既然历史已经走上了邪路，再要相信历史有意义就是异端邪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汤因比拼命设法用一种循环理论来代替直线形的历史观——这是在没落中的社会里特有的思想意识。<sup>①</sup>自从汤因比失败以后，英国历史学家大都自愿认输，宣称历史之中简直就没有一种普遍的型式。费希尔说过大意是这种意思的一句平凡的话<sup>②</sup>，几乎跟在上一世纪里朗克的格言享有同样盛誉。如果有人告诉我，过去三十年中的英国历史学家，由于深刻的个人反复思虑，由于在他们各自的顶楼里夜以继日地勤奋用功，他们都经历了这种内心的变化，我认为没有必要跟这种事实进行争辩的。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一切个人思考和深夜用功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看作1914年来我们社会的性质和观点起了根本变化的产物和表现。由社会性质写出来的历史，或者没有能够写出来的历史，便是这个社会的性质的指标，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指标了。荷兰历史学家盖尔<sup>③</sup>在他那篇引人入胜的专论，英译本题为《拿破仑：赞成者与反对者》的书里，说明了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评价反映出整个世纪中法国政治生活及政治思想的正在变化、相互矛盾的许多型式。历史学家的思想，正跟其他人的思想一样，是由包括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造成的。阿克顿充分认识

---

① 马卡斯·阿里利亚斯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他想“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过去是怎样发生的，在将来又将怎样发生。”（《致他自己》第10章，第27节）。汤因比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吸取了这种思想，这是尽人皆知的。

② 见1934年12月4日为《欧洲史》所写的序言。

③ 原文为Geyl。——译者

到了这一真理，他从历史本身来寻找逃避环境的办法：

历史应该是我们的救星，不仅使我们免于其它时代的不当影响，也免于我们自己时代的不当影响，免于环境对我们所施加的暴虐，以及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给我们的压力。<sup>①</sup>

这听来也许是对于历史的作用所作的过于乐观的一种估价。不过，我敢大胆相信，一个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历史学家，跟那种大声抗议说自己只是单独的个人，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学家比起来，更能超越自己的处境，更能理解他自己的社会和观点跟其它时代、其它国家的社会和观点之间的区别的主要性质。一个人超越他的社会处境和历史处境的能力，似乎是由他认识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程度的敏感性而决定的。

我在第一篇讲演里说过：你们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现在我要加上一句：你们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正是应该从这双重的事实出发来看待历史学家。

现在让我们撇开历史学家不谈，而按照同一问题来考虑我所提问题的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所探索的目标，究竟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力量的行动？在这里我就走到大家常走的路上来了。几年前伯林爵士<sup>②</sup>发表了题为《历史的必然性》的才华焕发、颇受欢迎的一篇文章——关于

① 阿克顿：《近代史讲演集》，第33页。

② 原文为 Isaiah Berlin。——译者

这篇文章的主题，我在以下的讲演里还要提到——他在文章的篇首，题上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是从埃利奥特<sup>①</sup>先生的著作中挑拣出来的。在全文中，他从头到尾都在嘲弄那些相信“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而不相信个人是决定因素的人。我打算把它叫做坏国王约翰式的历史理论的那种理论，是有一个很长的来历的。这种理论认为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个人的性格和行为。这种认定个人天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的愿望，是历史意识的初级阶段的特点。古代的希腊人喜欢在过去的一些成就上面标上有名的英雄人物的名字，说他们对这些成就尽过责。他们把他们的史诗说成是一位叫荷马的诗人写的，把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归功于一个叫莱库格斯的或者叫梭伦的人。同样的倾向在文艺复兴时期也重新出现了。那时候，作为传记家兼伦理家的普罗塔克，比起太古的历史学家来，在古典文学的复兴方面，他是个更有声望、更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我们英国，可以说我们还是母亲膝下的小儿女的时候，就学会这套理论了。今天我们也许该认识到，这种理论有点幼稚，或者至少是有点孩子气。在社会比较单纯，公共事务看来是由一小撮知名之士在管理的时候，这种理论表面上似乎还讲得通。很明显，它对我们这个时代较为复杂的社会是不适合的。十九世纪的社会学这样的新科学，正是由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应运而生的。不过，旧的传统很难绝灭。本世纪之初，“历史是伟人的传记”仍然是一句名言。就在十年以前，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指责他的一些同行，这种指责也许不是太顶

<sup>①</sup> 原文为 T. S. Eliot。——译者

真的,说他们把历史人物当作“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傀儡”,因而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集体屠杀”。<sup>①</sup> 喜爱这种理论的人现在对它也有点感到羞怯,不过,我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在韦奇伍德小姐一本书的序言里找到一段关于这一理论的、当前极好的陈述:

作为个人的人的行为,比起作为集团或者阶级的人的行为,使我更感兴趣。历史不仅可以带着别的偏见,而且也可以带着这种偏见写下来。这既不会更多地贻误读者,也不会更少地贻误他们。……这本书……试图了解这些人是怎样感觉的,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估计,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行动。<sup>②</sup>

这种陈述是很明确的,而韦奇伍德又是个有声望的作家,那么我敢说许多人会有她这样的想法。比如,罗斯博士告诉我们,伊丽莎白时代的制度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詹姆士一世不理解那种制度。他还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由斯图亚特王朝头两个国王的愚蠢引起的。<sup>③</sup> 甚至比罗斯博士严格得多的那位历史学家詹姆士·尼尔爵士<sup>④</sup> 有时候似乎对表达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钦敬,要比

①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1卷,第2期(1951年,1月),第270页。

② 韦奇伍德:《长治久安》(Cicely Veronica Wedgwood: The King's Peace,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1955),第17页。

③ 罗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Alfred L. Rowse: The England of Elizabeth,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0),第261—262页,第382页。应该公平地指出,罗斯博士在早一些的一篇文章里也曾指责“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巴本王室于1870年以后,没有能够在法国重建帝制,只是由于亨利五世喜爱一面小白旗所致。”(见《一个时代的结束》The End of An Epoch,第275页)。也许罗斯博士把这种着重个人的解释保留在英国史里了。

④ 原文为James Neale。——译者

他解释都铎王朝代表着什么来得热切些。伯林爵士在我刚才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对历史学家可能不把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指斥为坏人的迹象大为担忧。<sup>①</sup>越是近些年，这种坏国王约翰、好女王白斯式的理论就越盛行。管共产主义叫“卡尔·马克思脑子里的产物”是比分析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性质来得容易些（我是从股票经纪人的传单上摘取这句妙语的）。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说成是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愚蠢或者德国的金矿而产生的，比研究这次革命深刻的社会原因要容易些。同样，从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里，看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个人弱点的结果，这也比看出在国际关系的体系中某种由来已久的衰退迹象要容易得多。

韦奇伍德小姐的陈述把两项命题结合在一起了。第一项是：作为个人的人的行为跟作为集体或者阶级的成员的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而历史学家可以合法地有意详细讨论这种行为而不讨论那种行为。第二项是：研究作为个人的人的行为，包括研究这些人的行动的有意识的动机。

在我说过上面那些话以后，我毋需再在第一点上费唇舌了。并不是把人当作个人这样的观点，比把人当作集体里的成员这样的观点更多地或者更少地贻误人，而是把这两者截然分开这样的企图在贻误人。个人，就它的定义而论，便是一个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也许还是不止一个社会的成员——叫它作集体，阶级，部族，民族，或其它你爱叫的名色全可以。早年的生物学家只满足于把各种鸟、兽、鱼类划分为装入笼子

<sup>①</sup> 伯林：《历史的必然性》（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第42页。



的，盛在缸里的和放进展览橱里的。他们不去研究活的动物跟它的环境的关系。也许今天的社会科学还没有从那种原始阶段摆脱出来。有些人把心理学看作研究个人的科学，把社会学看作研究社会的科学，从而将两者区分开来。另外给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分析个人行为这样的观点取了一个名，叫做“心理行为学”<sup>①</sup>。但是，一个心理学家不去研究个人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的。<sup>②</sup>在把人作为个人来处理的传记与把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处理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界限，而且提出好的传记会构成坏的历史，这样做是很吸引人的。阿克顿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在人们的历史观里，没有比由于个别人物所引起的兴趣而招致更多的错误和更多的不公平的现象了。”<sup>③</sup>但是这条界限也本来不是实在的。杨<sup>④</sup>在他那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扉页上，写上一句维多利亚时代的谚语。这句谚语就是：“仆役们谈论人，老爷们讨论事。”<sup>⑤</sup>

① 原文为 *psychologism*。——译者

② 近代心理学家仍然犯这样的错误：“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学家们，没有把个人当作正在发生作用的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单位来处理，而是把他当作进行建立社会制度的、具体的人来处理的。这样，他们便对他们的范畴总该是抽象的，这一特殊的意义注意不够。”见帕森斯教授(Talcott Parsons)所写韦贝尔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理论》(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一书的序言,第27页,参看韦贝尔书中第184页上关于弗洛伊德的一些话。

③ 《国内外评论》(*Home and Foreign Review*) 1863年1月号,第219页。

④ 原文为 G. M. Young。——译者

⑤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第2章里,以极严肃的笔调,发挥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想约略地估计一下一个人的智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他谈话里所用一般的东西跟个别的東西之间的比例——观察关于个人的简单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被从人与物的无数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事实所代替。你这样衡量过许多人之后,就会发现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人,才会接受除用传记的观点看人类事物以外的任何其它观点。”

我倒并不想拿这句谚语来打掩护。有些传记是对历史的贡献——在我自己这一研究领域里，多伊澈<sup>①</sup>的《斯大林传》和《托洛茨基传》就是显著的例子。还有一些像历史小说之类，便属于文学。特雷弗-罗珀教授写道：“对于利顿·斯特雷奇说来，历史上的问题总是，而且也只是个人行为和个人怪癖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有关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他从来不曾设法去解答，甚至从来不曾问过。”<sup>②</sup>任何人也不是非写历史，非读历史不可，而且许多有关过去的好书并不是历史，也写出来了。可是，正如我在这些讲演中打算做的那样，我想我们根据惯例有权力保留“历史”这个词，只用于对社会之中人的过去所作的严肃认真的探究。

第二点便是，历史关系到探究为什么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估计，要那样行动。”这种提法乍看起来非常奇怪，而且我疑心韦奇伍德小姐正如其他通情达理的人们一样，并没有照她自己所宣传的去做。如果她真做了，她必然会写出非常奇特的历史。今天谁都知道，人并不总是，或者也并不是习惯地从他充分意识到了的动机出发，从他愿意承认的动机出发来行动的。不去看那些无意识的动机和未加承认的动机，这肯定就是尽力干自己的工作，却又固执地把一只眼睛闭起来。然而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这正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问题的症结在这里。只要你满足于说国王约翰之坏，就坏在他的贪婪、愚蠢以及作为暴君的野心，那么，你就仍然在以个人的特性为

---

① 原文为 Isaac Deutscher。——译者

② 特雷弗-罗珀：《历史文集》(Hugh Redwald Trevor-Roper: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7), 第281页。

依据来谈问题，这甚至是只要有幼稚园这种水平的历史就能理解的东西。不过，一旦你开始说国王约翰是各种既得利益的不自觉的工具，跟封建贵族的争夺权力相抗衡，那么，你不仅就国王约翰的坏处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比较老练的看法，而且你似乎也暗示，历史事件不是由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决定的，而是由某些外表的、全能的、引导着他的下意识的力量所决定的。这自然也是胡说。就我说来，我不相信天命、世界精神、命运、至高无上的历史，以及其它一切抽象的概念，这些东西有时候被认为是引导事件的进行的。我要无条件地赞成马克思的评论：

历史并不做什么事，它没有巨大的财富，也不打仗。是人，真正的、活着的人在做一切事情，他有财富，他从事战争。<sup>①</sup>

在这一问题上我要谈到的两点，跟抽象的历史观点毫无关系。它们都是以纯经验的观察为根据的。

第一，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个数目的问题。卡莱尔说过：“历史是伟人的传记。”他对这种不幸的说法是应该负责的。可是也得听听他在最具有雄辩力的时候，在他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中是怎样说的：

衣食无着以及视为当然的压迫，重压着二千五百万颗心灵。正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哲学之士、富商、乡绅们的受伤的虚荣心和相互矛盾的哲理，成为法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这些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sup>②</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Gesamtausgabe, I, iii, 625）。（按此处所引书的卷页中无此段引文，可能系刊误。——译者）

<sup>②</sup> 《法国革命史》第3卷，3册，第1章。

或者,再听听列宁说的:“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sup>①</sup>卡莱尔和列宁所说的几百万正是几百万个人:这里没有与个人无关的东西。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容易把不具姓名跟与个人无关这两者混淆起来。人民并不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不成其为人民,个人也不因为这样一来而不成其为个人。埃利奥特先生的“巨大的、与个人无关的力量”,就是那位更大胆更坦白的保守派克拉伦登管他们叫“没有姓名的肮脏的人民”<sup>②</sup>的那些个人。这些不具姓名的、成百万的人就是一些个人。他们多多少少不自觉地在一起行动,构成一股社会力量。一个历史学家在通常的情况下,对一个表示不满的农民,或者一个表示不满的村落可以不必理会。可是成千的村落里的成百万的表示不满的农民,便是任何历史学家决不会忽视的一个因素。使琼斯无法结婚的原因,并不会叫历史学家发生兴趣,除非这些同样的原因使得琼斯同辈的成千的其他人也无法结婚,同时还使结婚率显著下降:这时候,这些原因就很有历史意义了。我们也不要因为把运动说成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这种陈辞滥调,而感到不安。一切有效果的运动都只有很少几个领导人物,但是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并不是说这大批人对他们的取得胜利毫不重要。数目在历史里是举足轻重的。

我的第二个观察甚至得到了更好的证实。许多不同思想

---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译者

② 克拉伦登:《霍布斯对教会与国家有危险的错误之简略考察》(A Brief View & Survey of the Dangerous & Pernicious Errors to Church & State in Mr. Hobbe's Book entitled Leviathan 1676),第320页。

派别的作家都一致认为个别人的行动常常达到一些结果，而这些结果并不是采取行动的这些人甚至也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原来有意达到或想要达到的。基督教徒相信，为了自己常常是自私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在行动着的个人，却是上帝的意旨的不自觉的执行者。曼德维尔的“私人的罪恶——公众的恩泽”这种说法，正是在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早期的、经过深思的、似非而是的表达方式。亚当·斯密的隐蔽的手，黑格尔的“理智的狡诈”，都促使个人为它们工作，满足它们的目的，尽管这些人还以为在实现他们本人的愿望。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用不着多加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与亚当·斯密有共鸣，他写道：“人是有意识地为自己活着，可是，人又是在实现人类的有历史意义、有普遍意义的目的时的不自觉的工具。”<sup>①</sup>在这一问题上，把这个已经够长的名言选集加以结尾的便是巴特菲尔德教授。他写道：“历史事件的性质中，有那么一种东西，它把历史的进程加以歪曲，使它走上人们从来不曾想过要达到的那个方向。”<sup>②</sup>经过一百多年只打过一些小规模地区性战争以后，1914年以来，我们便打了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如果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比起十九世纪的后七十五年来，有更多的人要打仗，较少的人要和平，这对于这种现象似乎不是什么合理的解释。很难令人相信，有任何个人愿意，甚或极想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严

①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ix，第1章。

② 巴特菲尔德：《英国人及其历史》，第103页。

重的经济萧条。然而毫无疑问，这种萧条正是由个人的行动使它形成的，而每一行动有意识地追求着某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个人的意向跟他行动的结果之间有差距，而识别这种差距并非总要等待日后的历史学者去加以追溯。1917年3月，洛奇是这样来写伍德罗·威尔逊的：“他无意于从事战争，可是我认为他会被一些事件所左右。”<sup>①</sup>有人竟不顾一切例证提出历史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来，这基础就是：“根据人的意向来解释”<sup>②</sup>，或者行动者本人关于自己的动机的说明，关于为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估计，他们要那样行动”的说明。历史事实，的确不错，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是关于在孤立的状态下采取的个人的行动，也不是关于一些真实的或者假想的动机，在这样的动机之下，人们设想自己曾经采取过行动。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之中的相互之间的事实，它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个人想达到的结果每每有出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

科林伍德的历史观的严重错误之一，我在上一讲中讨论过的，便是假定要求历史学家去研究的、在行动后面的那个思想，就是有这样行动的个人的思想。这是个错误的假定。要求历史学家去研究的是行动后面的那个东西；而一个有行动的个人的有意识的思想和动机，可能与那个东西毫不相干。

① 托恰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在《齐墨曼的那封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8)一书第180页上曾引用此语。

② 此语引自伯林：《历史的必然性》，第7页。文中对以这种办法写历史似表称许。

在这里,我应该说一下历史中的叛逆者或反对者的作用。树立一个反抗社会的、赢得人心的个人形象,就是再次推荐那个社会跟个人之间的错误的对立。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同一的。每一社会都是社会矛盾的斗争场所。那些反抗现存的权威的个人跟那些维护这种权威的个人同样都是这一社会的产物和反映。理查二世和凯塞琳一世代表十四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俄国的强大社会力量;同样,瓦特·泰勒和蒲加乔夫这些伟大的农奴起义的领袖们也是如此。君主们和反抗者同样都是他们的时代和国家特殊条件的产物。把瓦特·泰勒和蒲加乔夫作为反抗社会的个人来描写是一种误人的简单化的作法。如果他们只是那样的人,历史学家根本就不会知道他们。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还靠大批的追随他们的人,他们作为社会现象极为重要,否则便毫无重要可言。让我们再举出在更为成熟一些的水平上的一个杰出反抗者和个人主义者为例。很少有人比尼采还要猛烈和过激地反抗过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国家。然而尼采正是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的直接产物——一个不可能在中国或者在秘鲁发生的现象。尼采逝世后的三十年,这股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力量有多么强大,对这时比对他同时代的人们说来,是更加明显了,而尼采这个人正是这股社会力量的表达者。尼采便成为对于后世比对于他自己的时代更为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了。

历史上的叛逆者的作用跟伟大人物的作用有一些类似之处。历史中的伟人论——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所谓好女王伯斯派——近年来不再时髦了,虽然这种论调偶尔还要露一下它那丑陋的头。二次大战后开始出版的一套通俗历史教科书

的编者，曾经请这套书的作者们“用编写伟人传记的办法，开创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主题”。泰勒在他的比较严肃认真的著述中，虽然没有作出这样的轻率的建议，可是在他一篇比较次要的论文中，却提出“写近代欧洲史可以以这三位巨人为依据：拿破仑，俾士麦和列宁”<sup>①</sup>。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作用是什么？伟人是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杰出的个人，便也是一个有突出重要性的社会现象。吉本说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真理：时代必须适合于那些非凡卓绝的人物，克伦威尔或瑞兹这样的天才在今天可能会默默无闻终身。”<sup>②</sup>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分析了这种相反的现象：“法国阶级斗争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如果俾士麦生在十八世纪——这自然是个可笑的假设，因为这样他就不成其为俾士麦了——他就不会统一德国，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伟人。不过，我认为人们也不必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伟大人物贬损为只不过是“给事件贴上一些名目的标签”。当然有时候对伟人的崇拜有一些有害的含义。尼采的超人就是个讨厌的人物。我不必重提希特勒这种例子，或者重提在苏联“个人迷信”所产生的残酷的后果。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缩小伟人的伟大处，也不是要赞成这样的提法，说“伟人几乎总是坏人”。我希望打消的一种看法便是，把伟大人物放在历史之外，认为这些人是依仗他们的伟大

---

① 泰勒：《从拿破仑到斯大林》（A. J. P. Taylor: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0），第74页。

②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70章。



强使历史依从自己，“就像玩具盒里的玩偶，盒盖一开便跳了出来，不可思议地从未知世界里出现，来阻断历史的延续进程。”<sup>①</sup>甚至迟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们有谁能超过黑格尔的这种经典性的描述：

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词把他的时代的意志说出来，能告诉他的时代什么是那时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的时代的核心与精髓；他使他的时代现实化了。<sup>②</sup>

利维斯博士说伟大的作家“就其促进人类的认识而论，是很有意义的。”<sup>③</sup>他说这话时，也有跟恩格斯差不多的意思。伟大人物要么是现存力量的代表，要么就是他以向现存的权威提出挑战的方式，协同创造的那股力量的代表。较大程度的创造性可能要给予像克伦威尔或列宁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协同塑造了使他们成为伟人的那股力量，而不是给予像拿破仑或俾士麦那样的人物，他们骑在已经存在的力量的背上，从而取得伟大的称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样的伟人，他们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前面极远，因而他们的伟大只有在后世才能得到认识。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似乎是认识到，一个伟人就是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者，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

---

① 查尔德：《历史》（V. Gordon Childe: History, London: Cobbett Press; 1947），第43页。

② 《公理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第295页。

③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Frank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第2页。

会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思想。

就历史这个词的两方面意义而言——这就既指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也指他所探究的过去的事实——历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个人是作为社会的人在这进程中从事工作的。社会与个人之间那种想象的对立,只不过是拿不对题的事转移我们对主要事物的注意力这样来搅乱我们的思想。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交往的进程,我曾经管它叫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的,并不是一些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按布尔克哈特的话说,历史是“一个时代在另一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纪录。”<sup>①</sup>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

<sup>①</sup> 布尔克哈特:《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价》,第158页。

### 第三章 历史,科学和道德

我很小的时候,当知道尽管外表相似,鲸鱼并不是鱼时,印象相当深刻。如今这些分类的问题没有以前那么叫我激动了;有人叫我相信历史不是科学的时候,也不会使我过分伤脑筋了。这个有关术语的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古怪现象。在任何其它欧洲语言里,“科学”这个词的同义词里毫无疑问要包括历史这个词。可是在说英语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大段历史,而且由此引起的问题就可以触及到关于历史方法的一些问题上去了。

十八世纪末,当科学对于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关于他自己身体的特征的知识,都有极好的贡献时,科学能否促进人的社会知识这一问题就开始提出来了。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包括在社会科学之内的历史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期间逐渐发展起来。科学在研究自然界所用的方法也用来研究人类事务。在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牛顿的传统占优势。社会,也象自然界一样,被看作一种机械的结构;1851年出版的斯宾塞<sup>①</sup>的一本书叫《社会静力学》,这个书名是大家至今还记得的。伯特兰·罗素是在这种传统里成长的,后来他回忆起有个时期他曾希望早晚会有“一种跟应用于机器的数学一样精

---

<sup>①</sup> 原文为 Herbert Spencer。——译者

确的、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数学。”<sup>①</sup> 随后,达尔文进行了另一次科学革命,而社会科学家们,学了生物学的榜样,开始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可是,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达尔文在完成莱尔在地质学领域中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历史带进科学领域里。科学所涉及的从此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与时间无干的东西<sup>②</sup>,而是一种变化与发展的进程。科学里的进化确定了也补充了历史中的进展。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足以改变我在第一讲里所描写的那种史学方法中的归纳观点的事情:首先是搜集事实,其次才是解释这些事实。毫无问题,这肯定也是研究科学的方法。1903年1月,伯里在就任讲席的首次讲演里作结束语时,脑子里显然也有这样的观点,当时他把历史描写成“一种科学,不折不扣的科学。”在伯里首次讲演以后的五十年当中,人们便看到一股反对这种历史观的逆流。科林伍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作的时候,特别想在作为科学探讨对象的自然界跟历史世界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这期间,伯里的这句格言除开被拿来取笑以外,很少为人所引用。可是这期间历史学家所没能注意到的倒是,科学本身已经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次革命似乎使伯里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正确得多,尽管认为他正确的理由全是错误的。莱尔在地质学方面所作的以及达尔文在生物学方面所作的工作,现在在天文学方面也作了,天文学已成为研究宇宙如何变成现在

① 罗素:《记忆中的人物像》(Bertrand Russell: Portraits from Mem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第20页。

② 迟至1874年,布雷德利还把科学看作关系到超时间的、“永久不变”的东西,而跟历史区别开来。见布雷德利:《论文集》(F. H. Bradley: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第1卷,第36页。

这种情况的一门科学。当代物理学家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历史学家有了一定的借口，感到今天厕身科学界比起一百年前要心安理得得多了。

让我们先看看规律这个概念。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科学家们认为自然的规律——牛顿的运动律，引力定律，鲍育律，进化的规律等等——都已经发现，而且都已经确立，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从已认识到的事实用归纳的方法发现和确立更多这样的规律。“规律”这个词带着从伽利略和牛顿身上得来的光荣相传至今。研究社会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都想维护自己那些研究项目的科学地位，便也采用了同样的词句，而且也相信他们在遵循着同样的程序。政治经济学家们似乎在他们的领域里，首先有了格雷沙姆律以及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贝克求助于“贸易的规律，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因此也就是上帝的规律。”<sup>①</sup>马尔萨斯提出了关于人口的规律。拉萨尔提出了关于工资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则宣称，他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巴克尔在他的《文明史》的结束语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人类事务的过程中“渗透了一条光辉的原则，这就是普遍的、不离正轨的有条不紊的原则”。今天看来，这种提法显得既有些陈旧，同时也有些傲慢，而且它无论对自然科学家还是对社会科学家同样都显得有些陈旧。在伯里发表就职讲演的前一年，法国数学家

---

<sup>①</sup> 见《爱德蒙·贝克全集》(1846)第4卷，第270页，《关于贫乏的想法及其细节》(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1795)一文。贝克得出结论说：“把政府当作政府来看，甚至把有钱的人当作有钱的人来看，他们都没有能力为穷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正是上帝暂时不高兴给他们的。”

亨利·普安卡雷发表了一本叫《科学与假设》<sup>①</sup>的小册子，在科学思想中开始了一次革命。普安卡雷的主要论点是，科学家提出来的一般命题，如果不只是一些定义，不只是一些隐蔽的玩弄文字，那便是许多假设。这些假设拟定出来以便组织进一步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具体化；这些假设有待证实、修正和辩驳。这一切现在已成为极平常的事情。牛顿所夸耀的“我从不制造假设”在今天说起来便显得空洞。尽管科学家们，甚至社会科学家有时可以说是为了记得过去而提到一些规律，然而他们不再在十八、九世纪的科学家心目中的那种含义之下，象他们那样普遍相信这些规律的存在了。大家认为科学家的发现，获得新知识，并不依靠确立一些确切和全面的规律，而是依靠提出一些假设，为新的探索开辟道路。两位美国哲学家写的一本论科学方法的标准教科书，把科学的方法描写为“主要是循环的”：

我们有求于经验的材料；有求于通常所谓的“事实”，以便为原则获得证据；同时，我们又根据这些原则来选择、分析和解释经验的材料。<sup>②</sup>

“相互的”这个词也许比“循环的”这个词要好一些，因为结果并不是回到原处，而是通过原则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向前推进到新的发现。一切思想都需要接受根据观察而得的一定的假定。这些假定使科学的思考成为可能，而又应该根据那番思考接受修改。这些假设

① 原文为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译者

② 科汉和内格尔合著：《论理学和科学方法导论》（*Morris Raphael Cohen and Ernest Nagel: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34*），第 596 页。

为了某种目的在某些场合之中可能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在另一些场合下发现并不符合。在一切事例中，这个检验是个根据经验的检验，无论这些假设能否真正有效地增长新的洞察能力和增加我们的知识。拉瑟福德有一位最杰出的学生和同事，最近是这样描写他的方法的：

他迫切希望知道核子现象究竟是如何起变化的，甚至要象一个人能说他知道厨房里是个什么情况那样。我不相信他是运用古典的办法，采用许多基本规律来寻求解释的。他只要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就心满意足了。<sup>①</sup>

这种描写同样也适合于这样的历史学家，他放弃了寻求基本规律，而满足于探究事务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历史学家在探索过程中所运用的假设的地位，跟科学家所用的假设极为相似。以马克斯·韦贝尔<sup>②</sup>对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著名分析为例。今天不会有人说这是一条规律，尽管早些年有可能被人称赞，说它是条规律。这是种假设，尽管在它的启发之下而进行的探索使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改变，但毫无疑问它增加了我们对这两个运动的理解。或者再举马克思这样一种提法为例：“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sup>③</sup>就现代术语说来，这不能算作一条规律，虽然马克思可能称之为规律，它却是一种有益的假设，指引出进一步探索和崭新的理

---

① 艾利斯爵士 (Sir Charles Ellis) 在《特尼第评论》(Trinity Review, Cambridge, Lent Term, 1960) 上一文, 第 14 页。

② 原文为 Max Weber。——译者

③ 马克思:《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143—144 页。——译者

解的途径。这样的假设是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佐姆巴特以一种压抑着那些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忧虑”，坦白地说：

当我们失去了在这种复杂的生活中至今还作为我们指南的、令人引为慰藉的公式时……我们感到似乎淹没在事实的大洋之中，直到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处，或者学会了游泳为止。<sup>①</sup>

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也是属于这一范畴的。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并不是一种实际情况，而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者思想工具。这种假设或工具只要能说明问题便能发生效力，而且是靠解释发生效力。在中世纪究竟何时终结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历史学家们，实际上是对某些事件有不同的解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实际情况的问题，但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把历史按地理区域加以划分同样也不是实际情况，而是一种假设：在某些场合，提出欧洲史这一说法是一个有效的和有益的假设，在另一些场合，就成为使人误解和有害的东西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有些历史学家则非常激动地否定这一点。历史学家的偏见可以用他所采用的假设来加以判断。我要引用一段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总声明，因为这个声明出自一位有自然科学家的素养的伟大社会科学家之口。乔治·索雷尔<sup>②</sup>在四十来岁开始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著述以前，是个工程师。他强调指出，尽管有过分简

<sup>①</sup> 佐姆巴特(前译桑巴特):《资本主义之精髓》(W.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5), 第354页。

<sup>②</sup> 原文为 Georges Sorel。——译者



单化的危险，仍然有从一种局势之中把一定的因素分离出来的必要：

人们应当摸索着前进，应当彻底试验一些可能的和局部的假设，并且以暂时的近似为满足，以便总是为不断地纠正错误敞开着大门。<sup>①</sup>

这和十九世纪有很大的悬殊。那时候的科学家以及象阿克顿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期望着有那么一天，通过积累许多充分证实了的事实，建立一整套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争论的问题。如今，无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怀着一种比较谨慎适中的愿望，想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向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前进，以他们的解释为媒介分离出他们的事实，用这些事实来检验他们的解释。这些历史学家们所极力采用的方法，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在我的第一次讲演里，我曾引用过巴勒克拉夫教授的一句话，说历史“完全不是什么事实，而是一系列被人接受了判断。”在我准备这些讲演时，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节目，下了一个定义，说科学的真理是“专家们公开承认的一种说明。”<sup>②</sup>这两个公式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满意的——等我讨论到客观性的时候，再谈不满意的理由。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几乎用完全相同的词句，各自独立地就同一问题作出了扼要的说明。

可是，对于不细心的人说来，类似便是个尽人皆知的陷

---

<sup>①</sup> 索列尔：《无产阶级一种理论的资料》（G. Sorel: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1919），第7页。

<sup>②</sup> 齐曼（J. Ziman）在1960年8月18日的“听众”节目里所说的话。

阱。我打算带着尊重的心情来考察一下为下列这样的信念所作的辩护：尽管数学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或者在这些范畴之内的各个不同科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然而这些科学与历史之间总可以划出一条根本的界限，而且这一界限便使得把历史——也许还有其它所谓社会科学——称之为科学，容易令人误解。这里所提出的异议——其中有一些比另外一些要有说服力——简单说来有：（一）历史只涉及独特的，而科学则涉及一般的；（二）历史不给人以教训；（三）历史不能作预言；（四）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他自己；（五）历史跟科学不一样，它涉及宗教和道德方面的一些争论。我打算对这些论点一一加以考察。

首先，有人断定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的和特殊的，科学所涉及的则是一般的和普遍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有的。亚里士多德宣称诗比历史要“更富有哲理”和“更为严肃”，因为诗与普遍真理有关，而历史只与特殊真理有关。<sup>①</sup>以后直到包括科林伍德<sup>②</sup>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也在科学与历史之间作出了类似的区分。这似乎有一种误会为根据。霍布斯有名的格言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世界上，除开名目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普遍的，因为有了名目的东西则每一件都是单个的和独特的。”<sup>③</sup>这对于自然科学说来，肯定是合乎事实的：没有两个地质结构，没有同类的两个动物，也

① 《诗学》第9章。

② 科林伍德：《历史的假想》（Collingwoo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第5页。

③ 《利维坦》（Leviathan）第1卷，第4章。

没有两个原子是相同的。同样，也没有两个历史事件是相同的。可是，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也会跟穆尔从巴特勒主教那里接受下来的那种陈辞滥调一样，产生同样的麻痹作用，而这句话有一时期是特别为语言哲学家们所喜爱的：“每一件东西就是这件东西，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一旦走上了这条途径，你很快就会达到一种哲学上的天堂，在这种境界里，对于任何事情谁也说不出一句有重要意义的话来。

语言的运用本身使得历史学家就象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而两者又都是独特的。可是历史学家却管两者都叫战争，只有学究才会提出抗议。吉本把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都作为革命写入历史时，<sup>①</sup>他正是把两个独特的事件加以概括。近代历史学家在写英国、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革命时，也正是这样做的。历史学家并不是对独特的东西真有兴趣，而是对独特之中的一般有兴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学家关于1914年大战的原因的讨论，经常是在这样的假定上进行的：大战的起因要么是由于秘密进行工作、不受舆论监督的外交家们的失职，要么是由于这个世界不幸被分成许多主权国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讨论便在这样的假定上进行：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在衰退中的资本主义急于瓜分世界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些讨论都涉及战争起因的概括，或者至少是二十世纪条件下战争起因的概括。历史学家经常运用概括来检验他自己的证据。如果关于理查是否在伦敦塔里谋杀了那几位王子的证据还不清楚，

<sup>①</sup>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0章，第1节。

历史学家便要问问自己——也许更多的是不自觉地而不是自觉地——除掉王位的潜在竞争者这种作法是不是这一时期统治者的一种习惯作法，而这位历史学家的判断，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这种概括的影响。

不仅历史的写作者，就是历史的读者也都是个积重难返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所作的观察运用到他自己所熟悉的其它历史现象上去——或者运用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我读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时，就发现自己一再对他的论点加以概括，把他的论点运用到俄国革命中自己有特殊兴趣的那些方面去。拿下面谈到恐怖的这句话为例：

在执法上有过一律对待的国家里，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在那些执法上从来没有过一律对待的国家里，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下面这一段就更有意思：

这一时期的历史普遍地是带着歇斯底里的情绪写成的，这尽管很自然，却是非常不幸的。夸张很多，还充满着咒骂，痛哭；而总的说来是一片黑暗。<sup>①</sup>

还有一段，这回是从布尔克哈特论十六世纪近代国家的成长的论著中摘引的：

政权的起始越近，它就越不容易保持稳定——首先因为创建政权的那些人，早已习惯于步步深入的迅速运动，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革新者，而且还要保持永远是革新者。其次，因为他们所激发的以及压制的力量，只有通过进一步

---

<sup>①</sup> 《法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第1篇，第5卷，第9章；第3篇，第1卷，第1章。

的暴力行动才能加以运用。<sup>①</sup>

说概括与历史无关，这是胡扯。历史是由于概括而兴旺起来的。正如埃尔顿先生在一册《新剑桥近代史》中简洁说明的那样，“历史学家跟历史事实的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sup>②</sup>他也可以加上一句，自然科学家跟养鸟养狗商人或者标本收集者之间的区别也就在此。可是，别以为概括会允许我们设想出某种让许多特殊的事件都很适合的庞大的历史方案。由于马克思常被指责为要设想这样的方案，而且相信这样的方案，我打算从他的一封信里引用一些话来总结我的这一段论述，这些话使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③</sup>

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与一般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学家，你没法把两者拆开，也不能说这个比那个优越，正跟你没法把事

① 布尔克哈特：《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判断》（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第34页。

② 《剑桥近代史》第2卷（1958），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摘引这段文字的那封原信，于1877年发表在俄文杂志《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波珀教授似乎把马克思跟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主要错误”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的错误便是相信历史的趋势或倾向“可以仅仅从普遍规律中即刻推究出来。”（见《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第128—129页）。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否定的东西。

实跟解释分开一样。

这里也许是个恰当的地方稍微谈一下历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目前面临两个互相对立的危险——成为极端理论的危险以及成为极端经验的危险。第一个危险便是，使社会学消失于对一般社会的抽象而无意义的概括之中。把社会这个词的第一字母大写成 S，使它成为抽象名词，正跟把历史这个词大写成 H，使它成为抽象名词，同样都是贻误人的谬见。这一危险被一些人弄得更为紧迫了。这些人分派给社会学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历史记载下来的独特事件加以概括。甚至有人指出，社会学跟历史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学有“规律”。<sup>①</sup>另外一个危险是差不多三十年以前卡尔·曼海姆就预见到了的，而目前则显得极为紧迫，这就是把社会学“分裂成一系列各不相干的、重新调整社会的 technical 问题”<sup>②</sup>。社会学关系到历史时期的各个社会，每一社会都是独特的，都是由特殊的历史前提和历史条件所塑造而成的。然而，试图把自己局限于所谓列举与分析的“技术”问题，而回避概括和解释，那就会成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的不自觉的辩护者。社会学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研究领域，就必须象历史那样，把自己

<sup>①</sup> 这看来是波珀教授的观点（见《无限制的社会》第二版。The Ope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第 2 卷, 第 322 页。）不幸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的规律的例证：“凡是思想自由以及思想交流的自由，受到法律机构和保证公开讨论的机构的有效保护的任何地方，就有科学方面的进步。”这是 1942 年或 1943 年写的，显然是受到这种信念的启发：西方民主国家依靠机构的组织安排，会继续在科学的进展中领先——自那两年以后，由于苏联的发展，这种信念便已消失或大大地加以修正了。这远非一条规律，甚至连有效的概括也不是。

<sup>②</sup> 卡尔·曼海姆：《思想与幻想》（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6），第 228 页。

跟独特与一般这两者之间关系联系起来。而且它还必须成为有动力的——不是研究静止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而是研究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至于其它，我只想谈，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让我们把两者之间的边界保持开放，成为有来有往的双行交通线。

概括的问题是跟我的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这一问题。概括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我们通过概括，试图向历史学习，我们试图把从一连串事件中所获得的教训运用到另外一连串事件上去：我们进行概括时，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试着这么做的。那些拒绝进行概括、坚持历史仅仅与独特有关的人们，非常合乎逻辑地就是那些否定能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的人。可是，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种说法，是为大量显著的事实所批驳的。没有任何经验比这条经验更为寻常的了。1919年，我作为英国代表团里一个较低级的成员出席了巴黎和会。代表团里的每个人都相信，我们能够从维也纳会议，——一百年以前欧洲最后一次最大的和会——得到许多教训。有一位叫韦伯斯特的上尉，当时在陆军部任职，也就是现在的查理斯·韦伯斯特爵士，杰出的历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告诉我们那些教训是什么。有两个教训我是一直还记的。一个是：当重画欧洲地图时，忽视自决的原则是危险的。另一个是：把秘密文件丢进字纸篓里是危险的，字纸篓里的东西肯定是会被另一代表团里的谍报人员收买去的。这些历史教训被看作信条而接受了，而且影响了我们的行

动。这个例子是近代的，也是琐细的。然而，要在比较遥远的历史里，追溯更为远古的过去所留下的教训影响也还是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古代希腊对于罗马有很大影响。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经试着就罗马人从古希腊的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或者认为他们曾经得到过的那些教训，进行过确切的分析。对于西欧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里从旧约圣经的历史中所得的教训加以考察，可能得到有益的结果。没有这个，对于英国清教徒的革命就很难得到充分的理解。上帝的选民这样的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九世纪时，古典教育的印记是深深地加盖在英国的新统治阶级的身上的。正如我提到过的，格罗特指明雅典是新的民主的榜样。我也很希望看到有人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有意或无意地传给英帝国的缔造者那些广泛而重要的教训。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进行俄国革命的那些人，被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几次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教训所深深感动——简直可以这么说，被这些教训所缠住。在这里，我得再提一下由历史的双重性质所提出的条件。向历史学习绝不只是一个单行线的进程。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历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于过去以及对于现在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我的第三点是预言在历史中的任务。有人说，从历史之中没法获得教训，因为历史不同于科学，它不能预言未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一连串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科学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中于谈论自然规律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影响的所谓科学规律，事实上只是对一种趋势的说明，是其它条件完全相同，或者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些说明。它们并没有权利预言在具体的情况下将发生什么。地心吸力的规律，并不能证明那个特定的苹果要掉在地上：也可能有人用一只篮子把它接住。光学的规律说光是循直线前进的，这并不足以证明一种特定的光线，由于某种障碍物，也不能折射或扩散。然而这不是说这些规律都没有价值了，或者原则上都无效了。我们知道，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只涉及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今天的科学更倾向于记住这么一点，归纳很合乎逻辑地只能引导到可能性或合理的信念，而科学更想把它自己的宣告看成一般性的规则或指南，这些规则指南的有效性只有在特定的行动中才能加以鉴定。正如孔德所说的：“从科学中产生预见；从预见中产生行动。”<sup>①</sup> 历史中的预言这个问题的线索就在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在于普遍与独特之间的区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学家一定要进行概括。历史学家在这样做时，就为将来的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这些指南，尽管不是特殊的预言，却是既有效又有用的。但是，他不能预言特定的事件，因为特定的就是独特的，也因为偶然事件的因素会参与进来。这种使哲学家伤脑筋的区分，对于普通人说来却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一个学校里有两三个孩子得了麻疹，你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病症将传染开来，而这个预言，假如你打算管它叫预言的话，是根据从过去经验中所得的概括而来的，也是一个既有效又有用的行动指南。然而你没法作出特定的预言，说查理士或玛丽要

<sup>①</sup> 《实证哲学的道路》(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第1节, 第51页。

得麻疹。历史学家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人们并不期望历史学家预言下月份在罗利塔尼亚将要发生革命。部分地根据关于罗利塔尼亚事务的专门知识，部分地由于研究历史，历史学家所寻求的那种结论便是：如果有人发动，如果政府方面不设法阻止，那么，罗利塔尼亚的情况便是在最近的将来，很有可能发生革命。这种结论还可能要附带提出对于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人可能采取的态度估计，这些估计部分是根据与其它革命对比得来的。这种预言，如果这可以叫做预言的话，只有通过独特事件的发生才能实现，而这些独特事件本身是无法预言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从历史得出的关于未来的推断都是无价值的，也不意味着这些推断不具备一种有条件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既作为行动指南，也作为我们理解事物如何发生的钥匙。我不希望指出社会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推断在确切性方面能比得上自然科学家的推断，也不想指出他们在这方面之所以不如人，只是因为社会科学比较落后。从任何观点看，人类本来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复杂的有理智的实体，而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很可能牵涉许多在类别上跟自然科学家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困难。我所希望证实的只是，他们的目的和方法并不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第四点便是，为了在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划一条界限，而提出一个更能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个论证是，在社会科学里，主体与客体都属于同一范畴，而且彼此之间交相作用。人不仅是自然实体中最复杂、最为变化无常的，而且他必须由另外的人来研究，而不是由另外一个

物种的独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观察者来研究。这么一来,人就不能像研究生物科学那样,仍然满足于研究自己的肉体方面的组织构造以及肉体方面的反应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需要把有主动积极的意志的人类行为的各种形式看透彻,以便确定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人,为什么会象他已经行动的那样有意识地去行动。这就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和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便无可挽回地参与了他所作的每一次观察之中;历史便彻头彻尾地渗透了相对性。拿卡尔·曼海姆的话说,“甚至经验分类、收集和排列成的门类,也是根据观察者的不同社会地位而改变的。”<sup>①</sup> 社会科学家的偏见必然会成为他的观察后全部意见的一部分,这是实在的。同时,观察的过程会影响和限制被观察的东西,这也是实在的。这样的事可能以两个对立的方向发生。人的行为是分析和预言的对象。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可以用对后果所作的不受他们欢迎的预言事前警告,并且用这预言来诱使他们改变他们的行动,因此,不管这预言是如何正确地根据分析作出的,它总是会自遭挫败的。在有历史自觉性的人们之中,为什么历史很少重演,其原因之一便是,在第二次演出时,剧中人已经从第一次演出中知道了剧本的结局,他们的行动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影响。<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党人知道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带来了一个拿破仑,便害怕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可能得到同样的结局。因此,

<sup>①</sup> 曼海姆:《思想与幻想》,第130页。

<sup>②</sup> 这一论证在本书作者的《1917至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已有所发展(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London: Macmillan & Co.;1950)。第1章,第42页。

他们不信任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在他们的领导人之中最象拿破仑，他们信任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不象拿破仑了。然而，这个过程可能以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经济学家根据对现有经济情况的科学分析，可以预言一个即将到来的商业兴旺或者物价暴跌的情况。如果他的论断很有权威，很有说服力，单就他作出了预言这件事本身而论，他对所预言的现象的发生便作出了贡献。政治科学家借助于历史观察的力量，怀着坚定的信念，认为专制是不会久长的，他这样便可能对这个暴君的覆亡作出了贡献。大家对于竞选时候选人的行为是很熟悉的。他们为了一个有意识的目的而预言他们自己的胜利，这目的就是把预言的实现弄得更加象真有其事一些。人们怀疑，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冒昧作出预言时，看来有时候也是受了想加速预言的实现这种不自觉的希望的影响。关于这些复杂的关系，人们能这么说而没有错的便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社会科学家与他的资料之间、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继续不断的，而且也是在不断地在变化着的；这看来是历史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近年来有些物理学家谈到他们的科学时，所用的术语似乎指出在自然界跟历史学家的世界之间有更显著的类似之处。首先，他们的结果据说是包含一项不确实或不确定的原则。我打算在下一讲里谈谈所谓历史中的决定论<sup>①</sup>的性质及其范围。可是，无论近代物理学的不确定原则是不是属于宇宙的本性，或者它只是标志着我们迄

<sup>①</sup> 原文为 determinism。——译者

今对它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点仍在争论中),我对于在它里面找到了跟我们作出历史预言的能力有重要类似之处,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我这种怀疑跟前几年人们有过的怀疑一样,那时有些热心人试图在它里面发现宇宙中自由意志所起作用的证据。其次,有人告诉我们,在近代物理学里,衡量空间的距离以及时间的流逝,要依靠“观察者”的运动。在近代物理学里,由于无法在“观察者”跟被观察物之间确立永恒不变的关系,一切度量便都从属于固有的变化。“观察者”以及被观察物两者——主体与客体两者——都参与观察的最后结果之中来了。不过,把上面所描述的这些只作最少的改动,就运用到历史学家跟他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来时,我不相信这些关系的本质,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之下,能跟物理学家与他的宇宙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相比拟。尽管我在原则上打算减少而不是增加分歧,即把历史学家所采取的途径跟科学家所采取的途径分离开来,可是,企图靠并不完善的类比,连蒙带骗地使这些分歧消失,也是于事无补的。

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对象牵扯在一起,这跟自然科学家牵扯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所提出来的争论点也要复杂得多。当我认为提出这种说法是公正的时候,问题并没有到此解决。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盛行的关于知识的许多经典理论,都在求知的主体跟被知的客体之间,采取严格的两分法。无论这一过程是如何表达的,哲学家们所构成的模型却表现出主体与客体、人与外在世界是割裂的,分离的。这是个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关于知识的各种理论都受到

科学的先驱者们的观念的强烈影响。人跟外在世界是尖锐地对立着的。他跟外在世界作斗争,就象跟某种顽梗的、潜在地存着敌意的东西作斗争那样——顽梗,因为很难理解它;潜在地存着敌意,因为很难驾驭它。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取胜,这种观念已经大大地修正了。现在的科学家看来很少把自然力量看作斗争的对象,更多地是把它看作合作的对象,并且把它驯服以适合自己的目的。关于知识的经典性理论不再适合较新的科学,尤其不再适合物理科学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哲学家们对这些理论开始表示怀疑,同时认识到,知识的过程,远非把主体跟客体严格分开,而是包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存。对于各门社会科学而言,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我的第一讲里,我提过,历史研究很难跟关于知识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理论相妥协。现在我想论证,既然社会科学涉及作为主体同时又作为客体的人,作为研究者同时又作为研究对象的人,那么,各门社会科学总的看来,便是跟宣称把主体和客体严格分离的、任何关于知识的理论不相容的。社会学在试图把自己创建成首尾连贯的理论体系时,很正确地创建了一个支流,叫做知识社会学。不过,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小——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满足于在有关知识的传统理论的牢笼里转来转去。如果哲学家们,原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如今又在近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开始冲破这个牢笼,为知识的进程建立一个比那个旧有的、用资料来冲击被动知觉的枱球式的模型要新颖得多的模型,那么,这对于各门社会科学,而尤其对于历史,是个好的预兆。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论点。等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历史中的客观性是什么意思时,我还要回

到这个论点上来。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讨论这样的观点:由于历史直接涉及宗教和道德问题,它便跟一般的科学不同,也许甚至跟其它的社会科学不同。关于历史跟宗教的关系,我只要谈谈能弄清楚我自己所处的地位的那么一点点,也就够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而又相信上帝创造和指挥整个宇宙,这两者并不矛盾。但相信上帝可以随意进行干预来改变一个行星的行程,推迟一次日蚀或月蚀,变换宇宙运动中的规则,这就有矛盾了。同样,有时候有人指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可以相信上帝在指挥和解释作为整体的历史的进程,然而他不可能相信旧约圣经中描写的那样的上帝,这位上帝进行干预不让屠杀亚美利加人,他为了有利于约书亚的军队,便在日历上玩花样,把白天的时间延长了。历史学家也不能祈求上帝,把他当作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解释者。达西神父在他的近著中试图说明这个区别:

一个研究者在回答历史中的每一问题时,总说这是神力的驱使,这是不行的。只有在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力量来整理尘世间的事件和人间的戏剧时,我们才被允许提出比较广泛的考虑。<sup>①</sup>

---

<sup>①</sup> 达西:《历史的世俗意义和宗教意义》(M. C. D'Arcy: *The Sense of History: Secular and Sacred*, London: Faber & Faber; 1959),第164页。在达西以前,波利比亚斯就已说过:“任何时候,只要能找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我们就不应该求助于神灵。”〔弗利兹:《古代混合宪法的理论》(Kurt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第390页上所引。〕

这种观点的弊端就在于，它似乎把宗教看成一副牌里的那张飞牌，留着以备取得用任何其它办法都无法取得的真正要紧的那几张得分的牌。当路德派神学家卡尔·巴尔特<sup>①</sup>宣告把神的历史跟世俗的历史截然分开，并且把后者交给世俗学者的手里时，他是做得比较恰当的。如果我没有把巴特菲尔德教授理解错的话，当他提到“专门的”历史时，也是这个意思。专门的历史看来是你我打算写的、唯一的一种历史，也是他自己已经写了的那种历史。但是，从他采用这个奇特的形容词看来，他保留相信另有一种秘传的或通神意的历史的权利，对于那种历史我们这些人是不必过问的。象别尔迪耶夫、尼布尔、马里坦这样的作者想保持历史的独立的身份，但是坚持说历史的目的或目标是在历史之外的。就我个人说，我很难把历史的完整性跟相信历史的意义寄托在某种超越历史的力量上面这样的信仰调和起来——不管那种力量是选民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自然神教信徒的那只神秘的手，还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为了符合这套讲演的目的，我想一个历史学家应当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求助于那种从天而降的救星，也可以打个比方说，历史就是打一场牌，而这付牌里却没有那张飞牌。

历史跟道德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而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有许多混淆不清的地方而受了一些损失。没有人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作出道德上的鉴定，这一点在今天几乎是几乎毋需争辩的了。历史学家的立场跟道德家的立场并不相同。亨利八世很可能是个坏的丈夫，而是个好的国王。可是，历史学家只有看到前一种身份对历史事件发

<sup>①</sup> 原文为 Karl Barth。——译者



生了影响时，才对他那种身份发生兴趣。如果他在道德上的过失就象亨利二世那样，对于公共事务并没有多显明的影响，历史学家对那些过失也就不必操心了。这不仅对于恶行，就是对于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巴斯德和爱因斯坦在私生活方面都是足以为人楷模，甚至是近乎圣贤的人。但是，假定他们都是不忠实的丈夫，暴戾的父亲，没有节操的同事，他们的历史成就会要小一些么？在历史学家的脑子里先入为主的正是这样一些东西。有人说斯大林对他的第二个妻子冷酷无情，但是，我作为一个苏联事务的历史学家倒不觉得这件事有多大关系。这并不是说私人道德不重要，也不是说道德史不是历史的一个合法部分。不过，历史学家总不会转过头去对在笔下出现的人物的私生活，宣布道德上的判断。他还有好多其它的事情要做哩！

在对与公众有关的行动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这个问题上，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淆情况。历史学家有责任对他的剧中人物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这种信念由来已久。但这种信念没有比十九世纪时的英国更为强烈的了。那时候，这种信念由于大讲道德的时尚，以及未遭阻止的个人主义的崇拜而加强了。罗斯伯利说过，英国人所要知道关于拿破仑的事便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sup>①</sup>阿克顿在他写给克列顿<sup>②</sup>的信里宣称：“道德信条的不可移易就是历史之所以有权威，有庄严，有功利之奥秘所在。”他要求把历史当作“争论的仲裁人，彷徨者的

---

<sup>①</sup> 罗斯伯利：《拿破仑的末期》(Rosebery: Napoleon: The Last Phase), 第364页。

<sup>②</sup> 原文为 Creighton。——译者

向导，尘世的力量以及宗教本身的力量经常想要压抑的那种道德标准的维护者。”<sup>①</sup>——这种观点的根据便是，阿克顿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至高无上具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作为超历史力量的那种历史的名义下，显然要求历史学家并授予他权力，对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这种态度有时还以想象不到的形式重新出现。汤因比教授把墨索里尼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所进行的侵略描写成“蓄意的个人罪过”<sup>②</sup> 伯林爵士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情绪激昂地坚持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从他们的大屠杀来判断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或者斯大林。”<sup>③</sup> 这种观点已经由诺尔斯教授给予了充分的纠正。诺尔斯在他的就职讲演里引用了莫特利指责菲利普二世的话（“如果他免于许多罪过……那是因为人的天性哪怕是在邪恶方面也不允许达

---

① 阿克顿：《历史论文及研究》（Acton: 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7），第505页。

② 《国际事务评论》（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第2册，第3页。

③ 伯林：《历史必然性》（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第76—77页。伯林爵士的态度跟十九世纪那位坚强不屈的保守法律学家史蒂芬（Fitzjames Stephen）的观点有共鸣：“刑法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行事的，这就是，从道德上看，憎恨罪犯是对的。……罪犯被人憎恨是很合人心意的。对罪犯的惩罚应该这么安排，以便能表达这样的憎恨，而且只要公众所提供的表达和满足这一健康的自然情绪的手段能辩解和助长这种憎恨，那就应该为这种憎恨进行辩解。”（见《英国刑法史》（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1883）第2章，第81—82页。拉齐诺维奇：《詹姆士·费兹詹姆士·史蒂芬爵士》（L. Radginowicz: 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7）一书第30页上也引用了这点。这些观点已不再广泛地为刑罚学家们所具有了，但我跟他们的争论在于，不管这些观点在其它方面效用如何，它们对于历史的裁决是不适用的。

到完满的境界”)，他又引用了斯塔布斯对约翰王的描写(“为每一个能使人丢脸的罪恶所污染”)。他引用这些作为对个人在道德上的判断的例证，而这些判断是历史学家没有权力作出的，因而他说：“历史学家不是法官，更不是一个能判决绞刑的法官。”<sup>①</sup> 克罗齐论及这点时也有一段很好的文章。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

这种指责忘记了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的法庭(无论是司法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当前的法庭。这些法庭是为活着的，在积极活动的而且是危险的人物设立的，而另外那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庭上出现过，那些人不能够判两回罪，或赦免两回。任何法庭都不能判他们有罪责，正是因为他们过去时代的人，他们是属于过去时代的治安管辖的。正由于他们是那样的人，他们只能是历史的臣民，不能接受其它判断，只能接受洞察和理解其工作精神的判断……有些人借口编写历史，象法官似地到处奔忙，到这里来判刑，到那里去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历史的职责……这样一些人一般是被认为缺乏历史感的。<sup>②</sup>

如果有人对这种提法：即对希特勒或者斯大林——如果愿意的话，对参议员麦卡锡——进行道德上的判断，不是我们的事，加以无端指责，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我们之中一些人的同时代人，因为成千上万的由于他们的行动而直接或间接受罪的人现在还活着，也正因为有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很难以历史学

<sup>①</sup> 诺尔斯：《历史学家与个性》(D. Knowles: *The Historian and Charac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第4—5页, 第12, 19页。

<sup>②</sup> 克罗齐：《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B.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第47页。

家的身份跟这些人打交道，很难放弃我们其它的职能，而这些职能在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时，可能为我们辩解。这是当代历史学家感到为难的事之一——应该说，这是主要为难的事。但是谴责查理曼或者拿破仑的罪恶，人们今天又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因此，让我放弃历史学家作为有权判决绞刑的法官的这种想法。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更为困难但是比较有用的问题。这就是，不对个人而是对过去的事件、制度或政策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这是历史学家的很重要的判断。那些强烈坚持对个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的人，有时候却不自觉地为整个集团或整个社会提供了犯罪者不在现场的遁辞。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sup>①</sup>有意开脱法国革命对拿破仑战争中的灾难与流血应负的罪责，而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一位将军的独裁……这位将军的脾气……就是很难于接受和平与克制的。”<sup>②</sup>德国人今天很欢迎对希特勒个人的邪恶进行谴责，认为这就很满意地代替了历史学家对产生希特勒的那个社会作道德上的判断。俄国人、英国人以及美国人都欣然参与了对斯大林、张伯伦或者麦卡锡的个人攻击，把他们当作了大家的集体错误行动的替罪羊。进一步说，对个人道德上的赞扬，跟对个人道德上的谴责一样，完全能够贻误人，为害于人。有人认为个别的奴隶主是高尚的，而这种认识便常被利用作为不要把奴隶制度谴责为不道德的借口。马克斯·韦贝尔提到过“没有奴隶主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资本主义缠住了工人或者欠债的人。”

<sup>①</sup> 原文为 Lefebvre。——译者

<sup>②</sup> 《人民与文明》(Peuples et civilisations)第14章：《拿破仑》，第58页。

他正确地争辩说,历史应该对制度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对建立这种制度的个人进行判断。<sup>①</sup> 历史学家不随便批评个别的东方君主。但是也不是要求他,例如说,在东方的专制制度跟帕里克利兹时代的雅典的制度之间保持无所谓和毫无偏袒的态度。他不会对个别的奴隶主作出判断。但这并不妨碍他谴责一个蓄奴的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预先包含了一定的解释,而历史解释总是涉及道德上的判断的——如果你喜欢用听来比较中立一些的名词,也可以说价值方面的判断。

然而,这还只是我们的困难的开始。历史是个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某些集团获得了成果,不管我们认为这些成果是好是坏,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而且经常是直接多于间接地——牺牲了别人而取得的。失败者付出了代价,痛苦在历史之中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伟大的历史时代不仅有胜利,而且还有灾难。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一种衡量的办法,能使我们把有些人得到的较大的好处,跟另外一些人所作的牺牲平衡一下:然而,这样一笔账总得找个办法结算一下的。这并不全是历史方面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有时只不过不愿承认而已,而更多的情况是我们迫不得已只好选择了较小一些的坏事,或者作一点坏事,以便让好事随之而来。在历史方面,有时候这个问题是按“进步的代价”或者“革命的代价”这样的程式来讨论的。这是容易引起误解的。正如培根在他的《论革新》一文中所说的:“固执

<sup>①</sup> 《马克斯·韦贝尔文选:社会学论文集》中引文。(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7), 第 58 页。

地保持一种习俗跟改革一种习俗同样是引起骚动的事情。”为保持而付出的代价落在那些无基本权益的人的身上，正跟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落在这些被剥夺特权的人的身上，是一样沉重的。有些人得到了好处，就为另一些人受的苦作了辩解，这样的论点在所有政府里是无怀疑余地的，它是个过激的学说，就象它同时又是个保守的学说一样。约翰逊博士坚定地提出危害取其轻这样的论证，来为维持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进行辩护：

有一些人不幸福比没有一个人幸福总要好些。这就是平等的一般情况的一个例证。<sup>①</sup>

但是只有在激剧变化的时代，这个问题才以最戏剧性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最容易研究历史学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

让我们举 1780 年至 1870 年间英国工业化的经历为例。事实上每个历史学家大概毋需讨论就会把工业革命当作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成就。他也会描写农民被驱逐离开土地，工人拥挤在有害于健康的工厂里和不卫生的工棚里，以及剥削童工的情况。他也许要说在执行制度时发生了弊病，有些雇主比另一些雇主要残酷些，还要带着一定的情热大谈特谈其一旦这个制度确立起来，人道主义的良心也就渐渐滋生了。可

<sup>①</sup> 博斯韦尔：《约翰逊博士传》(Boswell: Life of Doctor Johnson, 1791, Everyman ed.)第 2 章,第 20 页。这种说法的好处是坦白。布尔克哈特(见《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判断》第 85 页)面对进步中的牺牲者的“沉默了的呻吟”不禁落泪。“这些牺牲者一般说来并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保全财产”,但是布尔克哈特本人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旧政权下的牺牲者的呻吟却保持了沉默,而那些牺牲者一般说来,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全的。

是,他会认为,也许仍旧不会说出来,那些高压和剥削的手段,在开始阶段无论如何总是工业化的代价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我倒从来没有听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从这些代价看来,那最好叫进步从此住手,不再工业化了。如果真有这样的历史学家,那他无疑是属于切斯特顿或者贝拉克学派,真正的历史学家们——十分恰当地——不会对他看得太认真。这个例子使我特别感到兴趣,因为在我的苏维埃俄国史里,我希望很快就要接触到作为工业化代价的一部分的农民集体化的问题。同时我深知,如果追随研究英国工业化的历史学家的榜样,我一方面对集体化的残暴和弊端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把这一过程当作希望得到而又必需的工业化政策中不可避免的代价的一部分,那么,我就要引起人家的指责,说我冷眼旁观,并且宽容坏事。历史学家们对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使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化的事实表示宽容,其藉口是这不仅对世界经济立即产生了后果,而且对这两个大陆的落后人民产生了长远的后果。有人说,近代印度毕竟是英国统治下的产儿,而近代中国则是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交织着俄国革命影响的产物。不幸的是,活下来享受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光荣与利益的,却不是那些在根据条约开放的港口里西方人开设的工厂里做工,在南非的矿山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上做工的中国工人。付出代价的人很少是那些获得利益的人。恩格斯这段有名的、用绚烂的词句写下的话是很恰当的,恰当得叫人不怎么舒坦了:

历史大约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女神的。她驾着她那架胜利之车压过成堆的尸骨,不仅战时如此,就是“和

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也是如此。但我们这些男人和女人不幸竟如此愚蠢，以致我们从来不曾鼓起勇气争取真正的进步，除非我们为苦难所逼迫才去争取，而这些苦难看来几乎是多得太不相称了。<sup>①</sup>

伊凡·卡拉马佐夫的有名的轻蔑的姿式，是一种英雄人物的谬误。我们生下地，就落入社会之中，落入历史之中。人家给我们一张入场券，随便我们要还是不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对于遭受苦难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并不比神学家有更为明确的答复。他也是要靠两害择其轻和两善取其优这个论点的。

历史学家跟科学家有所不同，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材料性质而牵涉在道德上的判断这样的争论之中的。难道这样的事实不正是意味着历史屈从于一个超历史的价值标准么？我想不是这样。让我们假定，象“好”与“坏”这样的抽象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后来较成熟的发展，都是在历史的范围之外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抽象概念在历史道德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跟数学和逻辑的公式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相同的。这些都是思想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它们之中加入特定的内容之前，它们便是没有意义或者无法应用的。如果你喜欢用另外一种比喻的话，也可以说我们运用于历史以及运用于日常生活的道德概念，很象银行里的支票。支票有印好的一部分，还有填写的一部分。印好的那部分包括一些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34)第510页，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信(此处引文，未见有中译。——译者)。



抽象含义的字,如自由和平等,正义和民主等。这是些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我们填好另外那一部分之前,这张支票是没有价值的。另外那部分说明,我们打算给谁多少自由,我们把谁当作跟自己平等的人,以及数目达到多少。我们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填写支票的办法,便是属于历史的问题。把特定的历史内容赋予抽象的道德概念的过程,就是历史的过程。的确,我们的道德上的判断是在一个概念体系之内作出的,这个概念体系本身就是历史所创造的。当前国际上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最喜欢采取的形式,便是就要求自由与民主的对立观点进行辩论。这些概念是抽象的,也是有普遍性的。但是,搁进它们之中的内容,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从一地到另一地,通过整个历史,是有变化的。关于运用这些概念的实际问题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理解,也才能加以辩论。再举一个不怎么通俗的例子。有人曾经试图把“经济合理化”这个概念用作一种客观的、无可争辩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来检验和判断经济政策是否符合愿望。这种企图随即就失败了。受过古典经济学的规律的教养的理论家,从原则上指责计划是闯进合理的经济过程中来的不合理的东西。比如说,作计划的人在他们的价格政策中,拒绝受供求律的约束,在计划之下的价格不可能有合理的基础。计划者常常采取了不合理的行动,因而也就是采取了愚蠢的行动,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判断他们的标准不是古典经济的那个陈旧的“经济合理化”。就我个人说,我更同情这个相反的论点,这就是:不合理的主要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没有组织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而计划正是试图把“经济合理化”引导到这个过程中来。不

过,目前我想提出的唯一论点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判断历史行动的、抽象而又超历史的标准是不可能的。争论的双方不可避免地都会认为那样一种标准里有适合他们自己的历史条件和愿望的特定内容。

这就是对这样一些人的起诉书,这些人有意建立一个超历史的准则或者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便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情况作出判断——姑毋论这个标准是来自神学家所主张的神的权威,或者来自启蒙时期哲学家所主张的一个静止的理智或自然。并不是在运用这个标准时出现了缺点,或者这个标准本身还有不足之处,而是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标准就是非历史的,就是跟历史的本质相矛盾的。这对历史学家根据他的天职必须不断提出的问题,作出了一个教条主义的答案。接受对这些问题预先作出答案的历史学家,便是蒙上自己的眼睛去工作,并且放弃了自己的天职。历史是运动;而运动就包含比较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倾向于用有比较性质的字眼,如“进步的”和“反动的”,来表达他们在道德上的判断,而不用无妥协余地的绝对意义的字眼,如“好”与“坏”。这就是试图不依靠某种绝对标准,而是依靠它们互相之间的联系,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社会,以及各种历史现象。此外,当我们检查一下这些假定为绝对的和超乎历史之外的价值,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也是扎根在历史之中的。一个特定的价值或理想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地点的出现,是用地点与时间的历史条件来解释的。这些假定的绝对字眼如平等、自由、正义或自然规律的实际内容,是从这一时期到那一时期,从这一大陆到另一大陆有变化的。每一集体都有扎根在历史之中

的、他们自己的价值。每一集团保卫着自己，以免遭受外来的、不合式的价值的侵入，对这些价值，它使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或者更加粗糙一些，就用非英国和非美国的这样一些鄙俗的形容词来加以侮辱。这个抽象的标准或价值，跟社会脱离，又跟历史脱离，正象抽象的个人一样，也是一种幻想。一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承认一切价值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性质，而不是那样一种人，他为自己的价值要求获得超历史的客观性。我们所保持的信仰以及我们树立的判断的标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跟人类行为的任何其它方面一样，也是有赖于历史研究的。今天，很少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会要求完全的独立。可是历史并没有根本依靠它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它跟其它科学有所区分。

让我总结一下我所说过的关于历史要求包括在各项科学之中的话。科学这个词已经包括了那么多不同知识的部门，运用了那么多不同的方法与技术，因此，这项任务看来是落在那些打算把历史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人的身上，而不是落在那些打算把它包括在科学之内的人的身上。很有意思的是，排除的论证并不是来自急于想从他们精选的同辈中排除历史学家的那些科学家们，而是来自急于想证明历史具有一门高雅学问的身份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一争论反映出人文科学与科学之间的旧有的区分是有偏颇的。在旧区分里，人文科学被看成是代表统治阶级主要文化的，而科学只代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技术人员的技能。在这种含义下，“人文科学”和

“高雅的”这些词本身，就是由来已久的偏见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科学跟历史的对立，除英语以外，在其它语言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事实就说明这个偏见所具有的一个岛国的特殊性质。我反对人们拒绝把历史叫作科学的主要点是，这会为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缝进行辩解，而且使它永远存在下去。这种裂缝本身就是这个古老的偏见的产物，是以本身就属于过去的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基础的。我本人还不相信，使历史学家跟地质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就一定比使地质学家跟物理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要深些，或者无法填补一些。但是在我看来，弥补这一裂缝的办法，并不是教给历史学家一些基础科学知识，或者教给科学家一些基础历史知识。这是糊涂思想把我们引进的死胡同。科学家本人毕竟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劝工程师们去上植物学的基础课的。

我想提出的一个补救办法便是改善我们历史的标准，使它——如果我敢冒昧这么说的话——更科学一些，使我们对于追求这个标准的人的要求严格一些。在本大学作为专业训练的历史，有时被一些对古典语言觉得太难，而科学又太一本正经的人看作杂物箱。在这次讲演里，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印象便是，历史是比古典语言要难得多的一个学科，又是跟任何一门科学同样严肃的一个学科。这个补救的办法就包含着历史学家本身对他所进行的工作的更大的信心。查理斯·斯诺爵士，在最近讨论这一命题的一次讲演里，当他把科学家的“突然一阵的”乐观主义跟他所谓的“通文学的知识分子”的“低低的声音”和“反社会的情绪”加以对比时，他是很有有一些

见地的。<sup>①</sup>有些历史学家——更多的并非历史学家而又写关于历史的书的人——都是属于这种“通文学的知识分子”的范畴的。他们都那么忙于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一种科学，那么忙于说明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是什么，不能够也不应该做什么，因而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历史的成就和潜力。

另外一个弥补这道裂缝的办法是，促进对科学家们与历史学家们之间的目标的同一性的更深刻理解。这就是对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哲学的新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主要价值。科学家们，社会科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们都在从事同一研究的不同部门的工作：研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于人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增加人对于他的环境的理解以及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假定和方法的细节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我并不坚持这样的主张：为了更加合乎科学，历史学家必须更加专心地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然而，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历史学家，正如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个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一种动物。在我的下一讲里，我要探讨一下他提出问题以及试图回答问题的各种方法。

---

<sup>①</sup>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9），第4—8页。

##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如果把牛奶放在一个小锅里去煮,就会溢出来。我不懂,也从来不曾想要懂这是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我解释,我也许就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牛奶有煮开就会往外溢的性质,这是很确实的,不过不解决问题。本来我又不是个自然科学家。但是同样地,人们可以阅读、甚至写下关于过去的事件,却并不想懂得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只满足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希特勒要打仗,这也是很确实的,不过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人们实在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硬说自己是历史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正如我在上一讲的结尾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在不断地问“为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只要他一直希望得到答案,他便不能够休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许我该说得更广泛一些,应该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对于新鲜事物,或者对于在新情况下的事物,总是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

希罗多德,这位历史之父,在他的著作的开端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目的:把希腊人以及野蛮人的事迹保留下来,“而且除其它一切之外,尤其要把他们彼此征战的原因说出来。”他在古代的世界里没有几个门徒:甚至连修昔底德也被指责为

没有因果关系的明确概念。<sup>①</sup>但是，在十八世纪开始建立近代历史编纂法的基础时，孟德斯鸠在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把这样一些原则作为起点，这就是，“有许多总的原因，有精神方面的或者物质方面的，在每一君主政体中起作用，使它兴起，使它得以维持，或者使它覆灭”，同时，“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从属于这些原因”。几年以后，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发展了和概括了这一思想。假定“盲目的命运产生了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后果”，这是荒谬可笑的。人“并不是完全受自己的幻想的支配的”；他们的行为遵守着从“事物的本质”推究出来的某些规律和原则。<sup>②</sup>在这以后的差不多两百年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忙于试图发现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支配历史事件的规律，以便整理人类过去的经验。有时候，这些原因和规律是从机械的观点，有时候则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考虑的，有时则作为形而上学的，有时作为经济学的，有时又作为心理学的东西加以考虑。但是，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原则便是，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件整顿成为有先后次序的因果关系。伏尔泰在一篇为百科全书写的论历史的文章里说道，“如果你除开告诉我们，在奥克苏斯河和查克萨提河的两岸，一个野蛮民族代替了另一个野蛮民族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好说，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现在，由于我在上一讲中讨论过的那些理由，我们不再谈论历史“规律”了；甚至连“原因”这个词也已不再流行，

---

① 康福德：《修昔底德·米息斯托利卡斯》（F. M.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散见本书各处。

② 《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序言及第1章。

这部分地是因为某种哲学上的混淆不清,这一点我不必多说,同时也部分地是由于这个词跟宿命论之间的人们所假定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就要谈到。有些人不再提历史中的“原因”,而提“说明”或“解释”,或“情况的逻辑”,或“事件的内在逻辑”(这是由第西提出来的)。有些人拒绝采用表示原因的方法(事件为什么发生),而更喜欢采用表示作用的方法(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尽管这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引导我们即刻回到“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上去。另外有些人把各种不同的原因区别开来——有机械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等等——而且把历史的原因看作历史所特有的一个范畴。虽然这些区分之中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合式的,但为了当前的目的,强调对各种原因有共同性的东西,而不去强调区别这些原因的东西,这可能是更为有利的。就我说来,我将满足于用“原因”这个词的通俗的意义,而不管那些特别细微的区分。

当历史学家有必要指出事件的原因的时候,他在实际工作中干些什么呢?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作为开始。历史学家解决原因这一问题的途径的第一个特点便是,他一般将把好几个原因归之于同一事件。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写道,“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警告人们,叫他们别只是考虑由任何一种原因所产生的行动,……而不考虑另外那些原因,但另外那些原因的后果却是跟这一原因混杂在一起的。”<sup>①</sup>“1917年在俄国为什么发生革命?”回答这道问题的考生如果只提出一个

---

<sup>①</sup> 皮古主编:《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论文集》(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第428页。



原因，那就只能侥幸得个三等。历史学家是要跟多种多样的原因打交道的。如果有人要求一位历史学家考虑一下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因，他可能就会指出：俄国接二连三的军事失败；在战争压力下，俄国经济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沙皇政府解决农业问题的失败；贫困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彼得堡各个工厂里的集中以及列宁果断而对方却没有一个人果断——总之，这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方面的以及个人方面的许多原因、久远的以及短暂的许多原因的乱七八糟的大混合。

这就即刻把我们引导到历史学家的途径的第二个特点。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考生，如果只满足于就俄国革命提出一个接一个的十几个原因而止于此，可能得个第二等，却很难得到第一等；“见识广博，但缺乏想象”，这可能会是主考人所下的评语。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面对着他自己拟定的这张罗列原因的单子，会感到一种出于本人职责方面的压力，一定得把它按次第排定，一定得建立起原因的等级制以确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许还得决定哪一个原因，或者哪些原因的范畴，应当“穷究到底”或“归根结蒂”（这是历史学家们最爱用的词句）看成最终的原因，即一切原因之原因。这是他对自己的主题的解释。历史学家是以他所提出来的原因而知名的。吉本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结为野蛮和宗教的胜利。十九世纪英国的具有辉格派传统的历史学家，把英国霸权之兴起和旺盛的原因归结为体现着宪法自由的原则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今天看来，吉本和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陈旧的，因为他们忽视了经济的原因，而近代历史学家是把这些经

济原因推在最前列的。每一有关历史的争论都是环绕着什么是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来进行的。

亨利·普安卡雷在我上次讲演中引用过的那一著作中写过,科学是同时“向多样与复杂”,又“向一致和单纯”前进的,而且这种双重的、显然矛盾着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sup>①</sup>这对于历史说来也同样是对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自己的研究的扩大与加深,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答案。近年来,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法律的历史的繁衍——更别提对于政治史的错综复杂情况的新见解,以及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新技术——这些都大大地增大了我们的问题的数目和范围。伯特兰·罗素说过,“一门科学中的每一进展都使我们进一步脱离那些生硬粗糙的一致东西,这些一致的东西原先是吸收在前提与后果之间较大的区分之中,同时也吸收在被当作有关联的、不断扩大的前提的范围之中的。”<sup>②</sup>当罗素作出这样的评论时,他实际上是描写了历史之中的情况。但是,历史学家由于自己迫切想要理解过去,象科学家一样,同时也被迫把答案的重复性加以简化,把一个答案归属于另一答案,使杂乱的事件以及杂乱的特定原因之中出现某种秩序与和谐统一。“一个上帝,一个规律,一个活动范围和一个抽象的神迹”,要不就是亨利·亚当斯所探索的“某种伟大的概括,这种概括会使人不再叫嚷要受教育了”<sup>③</sup>。——这些在今天

① 普安卡雷:《科学与假设》,1902,第202—203页。

② 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Bertrand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8),第188页。

③ 《亨利·亚当斯论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8),第224页。

读起来,就象是过了时的笑话一样。然而,历史学家不仅必须通过简化原因来进行工作,而且也要通过增加原因来进行工作,这一事实是至今不变的。历史,正跟科学一样,是通过这种双重的,同时显然是矛盾着的过程前进的。

谈到这里,我还得勉强离开正题,来处理一下插进我们道路上来的两条可口的熏青鱼——一条的标签是“历史中的决定论,或黑格尔的邪恶”;另一条是“历史中的偶然机会,或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首先我得稍微谈一下它们的来历。卡尔·波珀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维也纳的时候,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论科学里面的新观点。这部书最近译成了英文,题名为《科学探究的逻辑》。在大战期间,他用英文发表了两本比较通俗一些的书:《无限制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sup>①</sup>这两本书是在反对黑格尔的强烈情绪影响下写成的,黑格尔跟柏拉图一道,被当作纳粹主义的精神上的祖先来看待。这些书也是在反对一种相当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情绪影响下写成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左派人士的思想趋向。主要的目标便是所谓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的宿命论哲学,把这些凑在一起,给予一个带侮辱性的名目叫“历史主义”。<sup>②</sup>1954年,伯林爵士发表了他论《历

<sup>①</sup> 《历史主义的贫困》于1957年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印行,但也包括了原来在1944年和1945年发表过的一些文章。

<sup>②</sup> 由于波珀教授的、讨论这一问题流传甚广的著述已经使“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一名词不再具有确切的含义,因此,我除开在一两个不需要很确切的场合以外,就避免使用这个词。总坚持就一些术语下定义,这是有些迂腐的。然而一个人也应该知道他自己讲的究竟是什么;波珀教授把“历史主义”这个词当作一个杂物箱来使用,盛上他不喜欢的任何关于历史的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在我看来是很健全正确的意见,也包括一些据我猜想今天真正的作家不再持有

史必然性》的文章。他放弃了对柏拉图的攻击，这也许是出于对牛津这座学府的古代栋梁所表示的某种经久不衰的崇敬<sup>①</sup>。他在他的控诉书之上，加上了在波珀的著作中找不到的一种论证，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其所以应该遭到反对是因为通过原因来解释人的行动，便暗示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怂恿历史学家逃避为他们所假定的义务，这种义务，我在上一讲中谈过，就是对历史上的那些查理曼、那些拿破仑以及那些斯大林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除此之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伯林爵士是个深孚众望、拥有广泛读者，而当之无愧的作家。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在英国或美国，每一个写过关于历史的文章，甚至写过关于历史著述的认真评论的人都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宿命论，表示过有意识的鄙视态度，而且指出不认识历史中的偶然事件的作用，是荒谬的。要伯林爵士为他的门徒们负责，也许是不公平的。即便在他说一些荒谬的话的时候，他却说得那么动人而有吸引力，因而使

的意见。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见《历史的贫困》第3页），他发明了从来不曾为任何知名的“历史主义者”所采用过的“历史主义的”论证。在他的著作中，历史主义既包括把历史同化于科学的那些学说，也包括把两者截然分离的那些学说。在《无限制的社会》一书里，反对预言的黑格尔被当作历史主义的祭司长来看待，而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序言里，历史主义又被描写成“研究社会科学的一个途径，它认定历史预言是这些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到这时为止，英文“historicism”一词一直是普遍地用作德文“Historismus”一词的英译文，而随后波珀教授又把“historicism”一词跟“historism”区别开来，这就为已经用得很混乱的一个术语增加了进一步混乱的因素。达西（M. C. D'Arcy）在《历史的世俗意义和宗教意义》一书第11页上是把“历史主义”这个词，当作“相同于一种历史哲学”来使用的。

<sup>①</sup> 说柏拉图是第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样的攻击，起源于牛津出身的克罗斯曼的一套广播讲演。这套讲演题名为《今日之柏拉图》（R. H. Crossman: Plato Toda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7）。

得我们着迷。他的门徒们重复了那些荒谬的话，却没有能使那些话具有吸引力。总而言之，这里边没有新的东西。查理斯·金斯利，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们之中并非最卓越的一位，也许从来不曾念过黑格尔的著作，从来不曾听说过马克思，在1860年他的就任讲演中却谈到人的“打破他自己生存的规律的那种神秘力量”，并以此证明历史之中是不能有“必然的次第”的。<sup>①</sup>不过，幸运得很，我们早把金斯利忘记了。夹在他们的中间，把这匹死马鞭打得象要活转过来似的是波珀教授和伯林爵士；这就需要一些耐心才能澄清这团混乱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决定论。我对决定论所下的定义是——我希望这是没什么可以争论的——它是一种信念，相信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或几个原因，而且除非这个原因或这些原因中的某种东西有了改变，否则这件事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sup>②</sup>决定论并不是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切人的行为的问题。人的行动没有原因，因而这些行动便非决定了的，这样的人正跟我们在上一讲里讨论过的那种处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相同，也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波珀的“在人类事务中每种事都是有可能的”这种说法，<sup>③</sup>要么是毫无意义的，

<sup>①</sup> 金斯利：《运用于历史的严正科学的范围》(C. Kingsley: *The Limits of Exact Science as Applied to History*, 1860), 第22页。

<sup>②</sup> “决定论……的意思是……只要作为论据的事实就是那样不变，那么，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都明确无误地那样发生，而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说它可能，就意味着如果作为论据的事实有改变的话，那就会有可能。”见亚力山大的一篇文章，载《献给埃斯特·卡辛耳的论文集》(S. W. Alexander in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 1936), 第18页。

<sup>③</sup> 波珀：《无限制的社会》第二版，第2章，第197页。

要么就是错误的。在日常生活里,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一点。每件事都有原因这个原理,是了解我们周围在发生什么事的能力的一个条件。<sup>①</sup>卡夫卡的小说里的恐怖的特质就在于,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有任何明显的原因,或者没有任何能够加以确定的原因:这就导致人的个性的全面瓦解,人的个性正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的,这就是,事件有原因,而且有足够的这样一些原因能加以确定,以便在人的脑子里建立一个过去与现在充分连贯的型式,作为行动的指南。日常生活简直无法过下去,除非人们假定,人的行为是由一般说来能够加以确定的原因所决定的。有那么一个时期,有些人相信探究自然现象的原因是亵渎神明的,因为这些原因显然是由神的意志来支配的。伯林爵士反对我们解释人其所以象他已经行动的那样来行动,是因为这些行动受人的意志的支配。他这种反对就属于上述的同样类型的思想,也许还表明,社会科学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正跟当年自然科学受到这种论证的攻击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同。

让我们看看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你在办理日常事务的时候,经常要碰上史密斯。你跟他打招呼,说上一句和蔼可亲的但是毫无意义的、关于天气,或者关于学院或大学情况的话。他回答一句同样和蔼可亲,也同样

---

<sup>①</sup>“因果关系律并不是这个世界强加于我们的”,而“对我们说来,也许是使我们自己能适应这个世界的最方便的一种方法”。见罗夫:《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J. Rueff: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9)第52页。波珀教授本人(见《科学探究的逻辑》第248页)则把相信因果关系叫做,“使一条很有道理的方法学上的规则加以形而上学的实体化。”

毫无意义的、关于天气或者关于一般事务的话。但是，假定某一个早晨，史密斯没有按照平常的老规矩回答你的问题，却突然发作，就你个人的容貌与品格，狠狠加以诋毁。你难道会耸耸肩头，把这种行动看作史密斯的意志自由的有力表现，看作人类事务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这一事实的有力表现？我猜想你是不会的。相反地，你也许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怜的史密斯。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他的父亲是在精神病院里死的。”或者说：“可怜的史密斯！他一定又是跟他的太太闹翻了。”换句话说，你会试图分析史密斯的从外表看来似乎没有原因的行为的原因，坚决相信其中必有某种原因。你这么做，我耽心你会使伯林爵士勃然大怒。他会狠狠地埋怨，说你由于对史密斯的行为解释成有原因的，你便一口吞下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假定，规避了谴责史密斯为下流坏子的义务。然而，在日常生活里，没有人采取这样的看法，也没有人认为不是决定论就是道德上的职责遭到了危险。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逻辑上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出现的。并不是人的某些行动是自由的，另外一些行动则是确定了的。事实上是根据人们考虑这两者时所采取的观点，人的一切行动既是自由的，又是确定了的。在实际问题上，则也有所不同。史密斯的行动有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但是，只要这种行动不是受到外来的压力而引起的，而是受到他自己的个性的压力而引起的，那么，他就要负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应该对他们自己的个性负起道德上的责任，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是否要他负责，这是个由你作出实际判断的问题。即算你要他

负责,这也不意味着你认为他的行为没有原因:原因与道德责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本大学最近成立了刑事学学院,设立了刑事学讲座。我敢肯定,那些从事于研究犯罪原因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会使他们否认罪犯应负的道德责任。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他正象普通人一样,也相信人的行动是有一般说来可以确定的原因的。如果不作出这个假定,历史就象日常生活一样,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研究这些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任务。这也许会被看成让历史学家特别对人的行为的已确定的那一方面发生兴趣:不过他并不否认自由意志——除开自愿的行动没有原因这种维持不住的假定以外。他也不会为必然性这个问题感到为难。历史学家也跟其他人一样,有时会落入一种修饰的语言的窠臼,当他们的意思只是说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就使人想到它特别强大有力时,他们却说这事的发生是“必然的”。近来我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搜寻这个令人不快的词,结果也不能给自己颁发一张完全无毛病的健康证明书:在一段文章里我写着,1917年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跟正教教会的冲突是“必然的”。写上“非常可能的”无疑是比较聪明些的。不过,请原谅我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改动难道不是有点迂腐?实际上,在事件发生以前,历史学家们并不假定这些事件是必然的。尽管他们十分正确地继续解释为什么终于选择了这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但是他们总是讨论故事中的主人翁可以得到的两者可择其一的道路,而且假定选择的机会总是开放的。历史上除开就这个词的形式上的意义而论外,没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因为事件的发生如果不是目前这个样子,那么它的前提一定已



经有所不同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有充分的准备不再采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无可逃避的”，甚至象“难于避免的”这类词汇。生活会要单调一些的。但是，让我们把这些字眼留给诗人们和形而上学家们去用吧！

近年来，对必然性的攻击显得如此无聊和没有道理，同时这种攻击的进行又显得如此猛烈，因此，我们必须追寻一下这后面隐藏着的动机。我猜想，这种攻击的主要来源是我要管它叫“可能发生”派的思想——或者毋宁说是这派的情绪。这派人几乎只依附于当代史。上学期在剑桥这里，我看见一个对某学会讲演的通告，讲题是：“俄国革命是必然的吗？”我敢肯定这次讲演原意是要作为一次很严肃的讲演的。可是，假如你看到通告，有人要讲“玫瑰战争是必然的吗？”这样的题目，你即刻会怀疑这是有人在开玩笑。历史学家写下诺曼征服，或者写下美国独立战争，就好象已经发生的事实际上是必然要发生的，也好象他的责任只在于解释一下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没有人指责他，说他是宿命论者，说他没有能够讨论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威廉征服者或美国的起义者有可能被人打败。然而，当我用跟这完全相同的方法——这也是历史学家唯一恰当的方法——写了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时，我发现自己遭到了批评家们的攻击。他们认为我含蓄地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描写成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没有能够考察一下其它一切也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人说，假定斯托雷平有时间完成他的农业改革，或者俄国没有参战，也许这场革命就不会发生。再假定克伦斯基政府维持下来了，而革命的领导落到了孟什维克或者社会民主党人的手

里，而不是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这许多假设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想象的；人们也总是能够跟这种历史方面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打一场牌玩玩。不过它们跟宿命论毫不相干，因为宿命论者只消回答一句：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原因也就不得不有所不同。而它们跟历史也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在于，今天并没有人真正希望扭转诺曼征服或者美国独立所产生的后果，也没有人想对这些事件表示激动的抗议。当历史学家把这些事件当作已经结束了的东西来处理时，没有人提出反对。但是，有不少的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结果中，直接地或代替别人受了痛苦，而且还一直害怕它的长远影响，想要对它提出抗议。当他们读历史的时候，便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让他们自己的想象在一切比较令人高兴的、也许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尽情奔放，而对那从容不迫地解释着真正发生了的事情，解释着为什么他们的令人高兴的梦想还没有实现的历史学家，表示极大的愤怒。当代史的麻烦就在于，人们记得所有的选择机会还在开放着的时刻，因而很难采取历史学家的那种态度，对于历史学家说来，选择的机会早已由于一些既成事实而完结了。这是一种纯粹出于感情的、非历史的反应。然而这却为近来反对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学说的运动，提供了大部分燃料。让我们毅然决然丢掉这条熏青鱼吧！

攻击的另一来源便是克娄巴特拉的鼻子<sup>①</sup>这个有名的难题。这一理论是，从任何一点看，历史都是不断发生的偶然事件，是一系列由偶合来确定的、仅仅由那些最偶尔的原因而引

---

<sup>①</sup> 法国布莱斯·帕斯卡尔在其作品中曾说“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若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此处比喻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译者

起的事件。阿克丁姆战役的结果不是由于历史学家一般所主张的那些原因，而是由于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的迷恋。当巴贾齐特由于痛风而没有向欧洲中部进军时，吉本评论道：“一滴恶毒的体液落在一个人的一根纤维组织上，就能阻止或延缓许多民族的灾难。”<sup>①</sup>希腊国王亚力山大被他蓄养着玩的一只猴子咬了一口，于1920年秋天死去时，这个意外事件便引起了一系列事件，因而使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说出了这样的话：“二十五万人死于这只猴子咬的这三口。”<sup>②</sup>或者再举托洛茨基关于他在打野鸭子时得了热病这件事的评论作例子。这场热病使他在1923年秋天他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의 争吵达到最紧急关头时，丧失了战斗力。他说：“人们能预见一次革命或一次战争，但没法预见秋天出去旅行打野鸭子的后果。”<sup>③</sup>首先要弄明白的是，这个问题跟决定论的争论毫不相干。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的迷恋，或者巴贾齐特的突然痛风，或者托洛茨基的发寒热，正跟发生的其它任何事情一样，都是偶尔决定的。指出安东尼的迷恋没有原因，这是对克娄巴特拉的美貌表示了完全不必要的失礼。女人的美与男人的迷恋之间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得到的最正常的一种因果关系。这些历史上的所谓偶尔事件表示一种因果关系，妨碍着——也可以说是冲击着——历史学家主要从事研究的那种关系。伯里很正确地谈到“两根独立的原因的锁链在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4章。

② 丘吉尔：《世界危机：余殃》（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Aftermath, London: Butterworth & Co.; 1929），第386页。

③ 列昂·托洛茨基：《我的一生》（Leon Trotsky: My Life, London: Butterworth & Co.; 1930），第425页。

互相撞击。”<sup>①</sup>伯林爵士在他论《历史必然性》这篇文章里，用赞扬的口吻举出伯纳德·贝伦森<sup>②</sup>论“历史的偶然观”的文章作为开头。他是这样一些人中的一个，这些人把这种意义下的偶尔事件跟缺乏具有原因的決定混淆起来。可是，且不说这样的混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难题。当我们的因果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被另外某种关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某种不相干的关系——所打断或歪曲时，人们又如何能在历史之中找到一个连贯的因果关系，我们又如何能发现历史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停一下，来看看近年广泛流传的坚持偶然机会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种主张的根源是什么。波利比亚斯看来是在系统地方式下坚持这种主张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而吉本则很机敏地揭露了其中的理由。他评论道：“希腊人在他们的国家降为一个省分之后，便把罗马的胜利归因于罗马共和政体的幸运，而不是归因于它的优点。”<sup>③</sup>塔西佗也是他的国家处于衰亡时期的一个历史学家，是耽迷于对偶然机会作出广泛反应的另一位古代历史学家。英国作家重新坚持历史里偶尔事件的重要性，是从一种不安定与危惧情绪的增长而

---

① 伯里关于这一点的论证，见《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0), 第303—304页。

② 原文为 Bernard Berenson。——译者

③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8章。很有趣的是，希腊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也耽迷于那种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游戏——失败者最中意的安慰：他们对自己说，如果亚力山大大帝不是那么年轻就死了的话，“他可能会征服西方，而罗马就可能会成为希腊国王的臣属了。”见弗里兹：《古代混合宪法的理论》(K.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第395页。

开始的，这种情绪随着本世纪而到来，在 1914 年以后就益为显著。经过一个很长的中断期间，第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发出这种论调的，似乎是伯里。他在 1909 年一篇论“历史中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里，叫人注意“偶合的因素”，这种因素大多“有助于确定社会进化中的事件”。1916 年他还有单独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主题，文章的标题是“克娄巴特拉的鼻子”<sup>①</sup>上面引用过的费希尔的那段文章，反映了费希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的美梦未能实现而感到失望。他在那段文章里，要求他的读者认识历史之中的“意外的和不可预见的东西的作用”<sup>②</sup>。在英国，把历史看作一连串偶尔事件这样的理论的风行恰巧跟法国的一派哲学家的兴起同时，这派人宣传的是——让我引用萨特有名的《存在与不存在》中的词句——存在“既没有原因，又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在德国，正如我们已经注意过的那样，前辈历史学家梅涅克在他晚年，开始对历史之中偶尔机会的作用有了很深的印象。他责怪朗克对这一点注意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便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民族灾难，都归因于一系列的偶尔事件，归因于皇帝的浮华、兴登堡之被选任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希特勒的固执性格，以及其它等等——这实在是迫于他本国的灾祸一位伟大历史

---

① 两篇文章都重印在伯里的《论文选集》里。科林伍德关于伯里的观点的评论，则见《历史的观念》第 148—150 页。

② 有关这段文章，见第 65 页。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 5 卷，第 414 页上引用了费希尔的话，显示出他对这句话完全误解了。他把费希尔的话看作“产生”放任主义的、“近代西方认为偶然机会会有无上力量”这种信仰的产物。放任主义学说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偶然机会，而是相信那只神秘的手，这只手广施恩泽，使杂乱无章的人的行为变成有条不紊。费希尔的话并不是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这种学说的衰退的产物。

学家的精神的破产。<sup>①</sup>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走着下坡路，而不是很得意的集团或民族之中，强调历史之中偶然机会或意外事件的作用的一些理论便会盛行起来。考试结果无非就是买彩票，这样的观点在那些被列入第三等的考生中，总是很流行的。

但是，揭示一种信仰的来源，并不等于处置掉了这种信仰；我们还得从历史记录中去发现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即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到底在干些什么？孟德斯鸠显然是第一个试图维护历史规律反对干扰的人。他在论罗马人的强大和衰弱的著作中说道：“如果一个特定的原因，象一次战役的偶然结果，使一个国家毁灭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总的原因使那个国家的衰亡随那单独一次战役接踵而至。”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只写过一次，而且只是在一封信里写到的：

世界历史也就带着很神秘的性质了，倘若“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这些偶然性的自身自然地归到一般发展的过程中去，同时为别的偶然性所补足。但是加速和推迟就非常依赖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包括着那些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头的人物的性格的“偶然情况”。<sup>②</sup>

就这样马克思为历史中的偶然机会作了三点辩明。第一，偶然机会并不很重要；它能“加速”或“延迟”，但是言外之意便是说它不能根本改变事件的进程。第二，一个偶然机会被另一

---

① 有关段落引用在斯达克(W. Stark)为梅涅克的《权谋术》(F. Meinecke: Machiavellism)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第35—36页。

②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译者

个偶然机会所补足，因此到最后偶然机会便把自己抵销了。第三，偶然机会特别是在个人的性格之中得到了说明。<sup>①</sup>托洛茨基用一个巧妙的类比，加强了这个补足和自我抵销的理论：

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是通过偶然事件把历史规律折射出来。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便是，历史规律是通过偶然事件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sup>②</sup>

我坦白说我觉得这一理论既不令人满意，也没有说服力。历史之中偶然事件的作用，如今是被喜爱强调它的重要性的那些人严重地加以夸大了。但是，偶然事件是存在的，说它只加速或延迟，而不改变，这只是在字眼上玩把戏。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比如说，列宁才五十四岁便过早地死去——会自动地被另外一个偶然事件补足起来，而且补足得使历史进程恢复了平衡。

理由同样不充分的便是这样的观点，认为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只是用来衡量我们的愚昧的一种尺度——只不过是我們没有能够理解的某种东西的名字而已。<sup>③</sup>这样的事无疑也是有的。行星当然就是“游荡者”的意思，它得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人们以为它们就是在天空随意游荡，而它们运动的规律性还不为人所了解。把某种事情描写成横祸，这是使自己免除研究其原因的令人厌倦的义务时最爱采用的办法。有

---

①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第1节里，把“偶然机会”和“天才”等同起来，认为这些都是表达人类没有能力理解那些根本原因的字眼。

② 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422页。

③ 托尔斯泰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是被迫去投靠宿命论，用它来解释那些不合理的事件的，这就是说，解释那些我们还不理解它们的合理性的那些事件的。”（见《战争与和平》ix，第1章）同时参看上而注①的引文。

人告诉我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时，我往往倾向于怀疑这个人要么是个思想上的懒汉，要么就是智力不高。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的通常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已被当作偶然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能够加以合理解释的，是包含着能够说明更广泛的各种类型的事件的意义。不过，这也没有完全回答我们的问题。偶然事件并不只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某种东西。我相信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一种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去找寻。

在前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历史是以历史学家对事实加以选择和排列，使其成为历史事实而开始的。所有的事实并不全是历史事实。但是，历史事实跟非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僵硬的、不变的。任何事实，一旦它的关联和重要性被辨别出来，便可以这么比方说，被提升到历史事实的身份。我们现在便看到了，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原因进行研究时，一个多少有些类似的过程在起作用。历史学家对于他研究的历史事件的原因关系，就跟历史学家对于他的事实的关系一样，也具有双重的、相互的性质。历史事件的原因确定他对历史过程的解释，而他的解释也确定他对历史事件的原因的选择和排列。历史事件的原因的按等级排比，这一个原因或一组原因，或者另一个原因或另一组原因的相对的意义，这正是他的解释的精髓所在。这就对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形状、巴贾齐特痛风的侵袭、使亚力山大大国王送了命的猴子咬的那一口、列宁的去世——这些都是部分改变了历史过程的偶然事件。企图把它们迅速而神秘地带走，或者佯称它们没有什么影响，这是没有用处的。另



一方面,只要它们是偶然的,那它们便不能参与到历史的合理解释之中来,也不能参与到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事件重要原因的等级排比之中来。波珀教授和伯林教授——我再一次把他们作为这一学派最著名的、拥有大量读者的两位代表举出来——他们两个都认为历史学家企图找到历史进程的意义,并从中作出结论,这就等于企图把“全部经验”整顿成为相称的体系,而历史之中有偶然事件的存在,便使任何这种企图注定要遭到失败。然而没有一个脑筋健全的历史学家会异想天开,竟打算包括“全部经验”;他甚至在他所选择的历史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想多包括一点点事实也不可能。历史学家的世界,正象科学家的世界一样,并不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张照片,而是仿照原机器运转的一个模型,它使历史学家能够多少收到实效地了解 and 熟悉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从过去的经验,或者说从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过去的经验中,提炼出他认为能作出合理说明和解释的那一部分,而且从这里面得出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一位近来很孚众望的作家,谈到科学的成就时,生动地提出人脑活动的过程是:“在已观察到的‘事实’的破布袋里仔细搜寻,选出那些有关联的已观察到的事实,把它们接合、缀补在一起,丢掉那些没有关联的事实,直到缝成了一床有逻辑性的、合理的‘知识’的毯子。”<sup>①</sup>除对过分的主观主义的危险还有待某些斟酌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脑子活动过程的很好描写。

这个过程会使哲学家、甚至某些历史学家迷惑不解和感

---

<sup>①</sup> 保罗:《人类的绝灭》(Leslie Paul: The Annihilation of Man, London: Faber & Faber; 1944),第147页。

到震惊。但这对于做日常实际工作的普通人说来，却是非常熟悉的。让我举例说明一下。琼斯在宴会后开车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点酒，车子的煞车又不大灵，开到一个死角那儿简直什么都看不见，一下撞倒了罗宾逊，把他压死了。罗宾逊是走过街到拐角处这家店子里来买香烟的。把这种种混乱情况弄清楚以后，我们就在——比如说，就在当地的警察局里——碰头，研究这一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开车人半醉的状态因而肇事的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有可能提出刑事诉讼。是由于失灵的煞车所引起的么——在这种情况下，便涉及仅仅一星期前全面检修过这部汽车的车行了。是由于那个死街角的关系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把管理道路的当局邀请来，让他们也注意一下这样的事件。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实际问题时，两位很有名望的绅士——我不想说明他们是谁——冲进屋里，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割切陈辞：如果那天晚上罗宾逊不是恰巧烟抽完了，他就不会走过街去，也就不会被压死，因此罗宾逊想抽烟的欲望便是他致死的原因，任何忽视这个原因的调查都是白费时间的，从这种调查得出的结论便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处的。得，我们怎么办呢？一旦在他们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之中我们拦得住话头，我们就彬彬有礼地，但也是十分坚决地把这两位客人半推半请地送到门口，并且吩咐门房绝对不许再让他们进来，然后我们继续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对这两位打断我们话头的人有什么答覆呢？不错，罗宾逊之所以被压死是因为他是个抽烟的人。那些虔诚信奉历史中的偶然机会和意外事件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真实，也十分合乎逻辑的。每句话都有我们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以及

《镜中世界》中所看到的那种冷酷的逻辑。我对于牛津大学学术研究的这些成熟例证表示敬佩是不后于人的，不过与此同时，我倒宁愿把我自己的不同逻辑方式保存在隔离开的密室之中。道奇森<sup>①</sup>的方式不是历史的方式。

因此，历史就是根据历史重要性所作的选择过程。这里再借用一下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历史是厘定出朝向现实的不仅有认识而且有原因的方位的“一个选择的体系”。正如历史学家从事实的汪洋大海中，选择出对自己的目的有意义的那些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出那些、而且也只抽出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历史意义的标准便是，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应于他的合理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的能力。其它一些因果关系便不得不作为偶然的東西加以抛弃，这并不是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恰当。历史学家拿它没有办法；它不能顺应合理的解释，无论对于过去或者对于现在都无意义。的确不错，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或者巴贾齐特的痛风，或者亚力山大被猴子咬的那一口，或者列宁之去世，或者罗宾逊的抽烟，这些都有后果。但是，把这些当作普遍性的假定，说将军们打败仗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或者发生战争是因为国王蓄养了宝贝猴子，或者人们在路上被压死是因为他们抽烟，这就毫无道理了。另一方面，如果你告诉普通一般的人，说罗宾逊被压死是开车的人喝醉了，或者煞车失灵，或者路上有个死角，对他说来，这似乎是非常通情达理的解释。如果他有意辨别的话，他甚至

---

<sup>①</sup> 道奇森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的作者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系牛津大学数学讲师。——译者

会说，罗宾逊想抽烟的欲望不是，而这才是罗宾逊致死的“真实”原因。相类似地，如果你告诉学历史的学生，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内部的许多斗争是由于讨论工业化的比例，或者讨论劝使农民生产谷物以供应城镇的最好办法，或者甚至是由于互相竞争的领导人的个人野心所引起的，这个学生会感觉到，从这些解释也能应用于其它历史情况这一意义来考虑，这些都是合理的、历史上有意义的解释，同时从列宁的早死这一偶然事实并非真正的原因这一意义来考虑，这些便都是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原因。如果他热衷于思考这些问题，甚至也可以提醒他黑格尔在《公理哲学》一书的序言中、那句经常被人引用、却又经常遭人误解的格言：“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

让我用一会儿工夫回到罗宾逊致死的原因上面来。我们认识到有些原因是合理的和“真实的”，另一些原因则是不合理的和偶然的，这并不难。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标准来作出这种区分的？推理的能力通常是运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知识分子有时候是为了消遣而进行推理，或者自认为他们在进行推理。但是，概括地说，人的推理是有目的的。当我们认识到某些解释合理，另外一些解释不合理，我想我们是把那些要达到某种目的的解释跟那些没有目的的解释区别开来的。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例子里，假定制止开汽车的人酗酒，对煞车的条件有较严格的限制，路道位置的改进，这一切会达到减少交通惨祸的这个目的，这就很有道理。如果假定制止人们抽烟便可以减少交通惨祸，那就毫无道理了。这就是我们作出区分时所用的标准。我们对待历史中的原因的态度也是同一个

道理。在这里我们也把合理的原因跟偶然的原因区分开来。由于前者有可能运用于其它国家、其它时代和其它情况,因而能导致有益的概括,而且能从它们获得教训;它们能达到扩大和加深我们的理解的目的。<sup>①</sup>偶然的原因是无法加以概括的;既然它们都是十足独特的,他们便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结论。不过我在这里还得说明另一点。正是把目的放在心上这样的想法,为我们处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这就当然要涉及价值的判断。正如我们在上一讲里所认识到的,历史中的解释总是跟价值判断发生密切关系的,而因果关系则是跟解释发生密切关系的。拿梅涅克的话来说——这是指那个“真正的”梅涅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梅涅克——“如果撇开价值不管,探索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在因果关系的探索的后面,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对价值的探索。”<sup>②</sup>这便使我们回想起早些时候我所说的、关于历史的双重作用和相互作用的话——根据现在以促进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以及根据过去以促进对现在的理解。任何事物,比如象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迷恋,如果不能对这种双重目的有所助益的话,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便是没有生命的,也是没有效果的。

<sup>①</sup> 波珀教授有一时期曾偶尔涉及这一点,但没有认识它。他提出“大多数的解释基本上只停留在既富于暗示又独断专横的水平上”(不管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又附带地加上一句:“其中有一些则是以丰富为其特色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见《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51页。)这不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恰好就是这点,它证明了“历史主义”(就这个词的某些意义而言)毕竟并不是那么贫困的。

<sup>②</sup>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与价值》(Kausalitäten und Werte in der Geschichte, 1928)。译文见施特恩:《历史的多样性》(Fritz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7),第263页,第273页。

谈到这里该是我说老实话的时候了。我在你们身上耍了一个相当无聊的花招,尽管你一眼看穿这个花招并不难,而且好几次它使我能把我要讲的话讲得短些,讲得简单些,你想必已经非常宽容,就把它看成一种很方便的速写法了。虽然如此,我还得坦白一番。我一直到现在一贯使用了“过去和现在”这个套头语。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只不过是象过去与将来之间一条想象的分界线那样,存在于意念之中的东西罢了。在谈现在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项论证之中偷偷地放进了另外一个时间的量度了。既然过去和将来都是同一时间长度的一部分,我认为要表明对于过去的兴趣跟对于将来的兴趣相互连结在一起,这是很容易的。当人们不再仅仅活在现在之中,而是有意识地既对他们的过去,同时又对他们的将来发生兴趣时,史前时代跟历史时代之间的这条界限就被跨过了。历史是以把传统传给后世作为开始的,而传统的意思就是把过去的习惯与教训传给将来。有关过去的纪载是为了将来世世代代的好处而开始保存起来的。荷兰历史学家胡伊津加写道:“历史思想总是目的论的。”<sup>①</sup>查理斯·斯诺爵士最近关于拉瑟福德是这么写的:“他就象一切科学家那样,……几乎没有考虑到这意味着什么,他是确信将来的。”<sup>②</sup>我想,好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想不想到这一点,他们都要确信将来。除开“为什么?”这个问题以外,历史学家还要问另一个问题:往何处去?

<sup>①</sup> 胡伊津加(J. Huizinga)的译文见施特恩编的《历史的多样性》第293页。

<sup>②</sup> 约翰·雷蒙编:《鲍德纹时代》(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0),第246页。

##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让我引波威克教授三十年前在牛津大学就任钦定讲座教授时所作的演讲中的一节,作为开始:

对历史作出一个解释的渴望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如果我们过去没有一种积极的见地,我们便会或是陷于神秘主义,或是陷于犬儒主义<sup>①</sup>。

我以为,“神秘主义”指的是这种观点:历史的意义寓于历史以外的某个地方,即寓于神学和末世学的领域内——象别尔嘉也夫、尼布尔或是汤因比<sup>②</sup>这些作者的观点就是如此。“犬儒主义”指的是这种观点: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有许多恰当的意义,也同样有许多不恰当的意义,或者是虽有意义,而其意义却是凭我们的武断,随意赋予它的,这些例子我已经引述过好几次了。这也许就是当前最普通的两种历史观。但是,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这样一来,剩下的便是“对过去具有一种积极的见地”这样一句奇妙而富于启示的话了。既然无法知道波威克教授在使用这句话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末现在我便试图对这句话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

① 波威克:《近代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F. Powicke: *Moder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dhams Press; 1955),第174页。

② 正如汤因比得意地断言过的那样,“历史过渡到神学”。见《试验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序言。

象亚洲的古代文明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作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弟子寥寥无几；而古典时代的作者们，整个说来，对未来也象对过去一样甚少关心。修昔底德曾相信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有意义的事，而其后多半是不会发生有意义的事情的。卢克莱修曾经论断过人对于过去的冷漠态度。他说：

回头瞧瞧，那些在我们出生以前的  
永恒的时间的过去的岁月，  
对于我们是如何不算一回事。  
并且自然拿这个给我们作为镜子，  
来照照我们死后那些未来的时间<sup>①</sup>。

对于更光明的未来的富于诗意的憧憬，采取的是回到过去黄金世纪去的幻想形式——这是一种把历史过程同化在自然过程之中的循环观点。历史不是走向任何地方：因为没有意识到过去，也同样没有意识到未来。维琪尔在他所作的第四首田园诗中描绘过一幅回到黄金世纪去的古典图画。只有他才在《伊尼特》这首长诗中获得了灵感，从而暂时地突破了这样一种循环观念：认为“我给你以无限的权力”<sup>②</sup>是最不正统的思想。这件事后来曾使维琪尔博得了类似基督的先知的声誉。

希伯来人以及后起的基督徒们由于假定历史过程的前进运动具有某种目标——这就是目的论的历史观——从而提出

---

<sup>①</sup> 见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81 页。——译者

<sup>②</sup> 原文为 Imperium sine fine dedi。——译者



了一个崭新的因素。历史就这样取得了某种意义和目的，然而却是以牺牲其世俗的性质为代价的。达到历史的目标也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于是历史本身便成为某种神正论了。这就是中世纪的历史观。文艺复兴恢复了以人类为世界中心和理性至上的古典的观点，但是却以一种导源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乐观主义的观点，代替了对未来所采取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古典的观点。曾经含有敌意并不断腐蚀着的时间，现在变得和蔼可亲而且富于创造性了。你如果把贺拉斯的“有害的时间难道不是把什么都缩小了？”<sup>①</sup>跟培根的“真理是时间的产儿”<sup>②</sup>作一对照，便能看出这种情况。作为近代史学奠基人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们把希伯来-基督教的的目的论的观点保存下来，但却使这个目的世俗化了；他们就这样使历史过程本身的理性主义的性质得到了恢复。历史便成为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而这个目标就是人在人世间的尽善尽美的境地。吉本这位启蒙运动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当时并未因为他的主题的性质而受到妨碍，使他不记录下他称之为“令人愉快的结论，即世界的每个时代都曾增添过，而且仍在不断增添，人类的真正财富，幸福、知识以至美德”<sup>③</sup>。当英国的繁荣、威力和自信发展到极点时，这种对进步的憧憬

① 原文为：Damnosa quid non imminuit dies? ——译者

② 原文为：Veritas temporis filia。——译者

③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8章；作者这次离开正题，正是在描述西罗马帝国覆亡的时候。1960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一位批评家引用了这节文章，并且提出不知吉本是否真意如此。当然这是吉本的真意；一个作家的观念看来更像是在反映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而不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这正是这位批评家所很好地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这位批评家有意把他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叶的怀疑主义转移到一位十八世纪后期的作家的身上。

曾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在那些最热中于这种憧憬的信徒当中也包括了英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这种现象是众所周知，毋需加以详细描述，但是，我还是要引一两节来说明为什么对进步的信心近来仍然是我们的全部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在第一讲里曾引用过阿克顿在1896年为《剑桥近代史》编写计划所作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他把历史称之为“进步的科学”；并且在这部历史的第一卷的导言中写道：“我们必须把人类活动中的某种进步设想为据以编写历史的科学的假设。”在1910年出版的最后一卷《剑桥近代史》中，丹皮尔（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他是我就学的那个学院的导师）毫不怀疑地认为，“在未来的时代，人支配天然资源的能力以及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为人类造福的可能性，将得到无限的增长”。<sup>①</sup>鉴于我即将谈到的情况，承认这就是我在其中受过教育的那种气氛，并承认我当时曾无条件地赞同比我年长十五岁的伯特兰·罗素的那些话，这对我说来将是公平的。下面就是罗素的话：“我是在维多利亚的乐观主义的高潮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当时人们常有的那种希望。”<sup>②</sup>

1920年，当伯里写他的《进步的观念》一书时，虽然他仍旧把进步描写为“生气蓬勃的和起主导作用的西方文明的思想”<sup>③</sup>，但是一种比较萧瑟的气氛已占上风，他屈从于当时的风尚，把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推到了“在俄国建立起当前恐怖统治的纯理论家们”的头上。而此后，这种调子便沉寂下去

① 《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第13页；《剑桥近代史》第1卷第4页；第12卷（1910）第791页。

② 罗素：《记忆中的人物像》，第17页。

③ 伯里：《进步的观念》，第7—8页。

了。俄国的尼古拉一世被人们说成曾颁布过一项命令禁止使用“进步”一词：而现在呢！西欧的、甚至美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终于为时已晚地同意了他的主张。关于进步的假设已遭到否定。西方的没落这句话已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以致连引号都不需要加了。但是，且不管这一切叫喊，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新的舆论潮流是谁造成的呢？前几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偶尔发现，据我想，是我看见过的伯特兰·罗素的唯一的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在我看来是他无意中表露出了深刻的阶级意识，这句话是：“总的说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比起一百年前来是少多了。”<sup>①</sup>我没有一支衡量自由的测定杆，而且也不知如何把少数人的较少的自由拿来和多数人的较多的自由作一比较。但是，无论根据什么测量标准，我只能把这种说法当作异想天开的虚构。更能吸引我的倒是泰勒先生有时使我们看到的牛津大学里饶有风趣的学院生活的一个片断。他写道：所有的关于文明的没落这一套话“都不过是意味着，按过去的惯例，教授总是有管家的仆人的，而现在却要亲自操洗涤的劳动了”<sup>②</sup>。当然，对于昔日的管家仆人们来说，教授操洗涤的劳动也许是进步的一种象征。白人在非洲的霸权地位的丧失使英帝国的勤王者，自居为非洲主人的共和主义者以及黄金股票和铜矿股票的投资者忧心忡忡，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把这看作是进步。我在这个关于进步的问题上不知何故，事实上总是比较喜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判断，而不喜欢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判断，比较喜

① 罗素：《记忆中的人物像》，第124页。

② 《观察家》(The Observer)1959年6月21日。

欢英语世界的判断,而不喜欢俄国、亚洲和非洲的判断;或者说,比较喜欢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判断,而不喜欢普通人的判断。照麦克米伦先生说法,他们从来没有过高明的判断。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或者没落的时代,让我们暂时不去对这个问题作最后的判断吧!而是略微仔细地考察一下,在进步这一概念中包含着什么,在它的背后存在着一些什么假定,以及这些假定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

首先,我想弄清楚在进步和进化问题上的混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曾采纳了两种显然是互不相容的观点。他们企图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进行辩护:历史的规律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进步。但是,当时有什么理由把自然界看作是进步的,看作是向某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呢?黑格尔由于把历史(是进步的)和自然界(是不进步的)绝对地区分开来,因而陷入了困境。达尔文的革命似乎消除了全部难题,其办法是把进化和进步等同起来:自然界原来和历史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进步的,但是这一情况却为导致一种严重得多的误解开辟了道路,这种误解是由于把作为进化的源泉的动物的天赋跟作为历史中的进步的源泉的社会获得物混淆起来而造成的。这种区别是众所周知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试把一个欧洲人的婴儿置于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中,这个幼儿长大后曾是白色的皮肤,但却操中国的语言。色素是生物的一种天赋,而语言则是社会的获得物,后者是由于人脑的作用而传授的。由天赋所引起的进化必须从数千年或数万年中去测知;人们还不知道,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人体内所发生的可以测知

的生物变化。由后天的获得物所引起的进步则可以从数代人中去测知。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他的本质就在于：他是靠积累过去各代人的经验来发展他的潜在能力的。据说，现代人和五千年以前的他的祖先相比，脑子并不见得大些，而先天的思维能力也不见得强些。但是，借助于学习以及把他的祖先与他之间的许多代人的经验跟他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于是他的思维的效力便增长了许多倍。生物学家所否认的后天特性的传授，乃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的基础。历史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后天技能的传授的进步。

第二，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具有某种有限的开始和终结。在不到五十年前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认为文明是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创造于尼罗河流域的，这种说法今天并不比认为世界创始于公元前 4004 年的编年学更为可靠。也许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诞生作为我们进步的假设的一个起点来看待，但是文明的确不是一项创制，而是一个无限的缓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时时发生惊人的飞跃。我们毋需为进步——或文明——开始于何时这个问题而操心。这种对进步有一个有限的终结的假设曾导致了更严重的误解。黑格尔曾经因为把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看作是进步的终极——显然这是他过分强调解释他认为预见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的结果而遭到了正当的责难。但是，黑格尔的错误却由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所超越了。后者在 1841 年就任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时所作的就职演讲中曾提出一种思想，认为近代史将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说：“它似乎带着时间成熟了的标记，好象在它之

外不会再有未来的历史”。<sup>①</sup> 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一最后目的，这一预言在逻辑上和道德上是较少垢病的；但是认为历史有一个终结的这种臆断，却有着一个更适用于神学家而不适用于历史学家的末世学的光轮，从而回复到认为在历史之外还存在着某种目的的那一错误，毫无疑问，对于人的愿望来说，一个有限的终结是具有吸引力的；而阿克顿的、关于历史进程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走向自由的进步过程这一见地，却似乎是冷酷而含糊的。但是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打算保持他关于进步的假设，我以为他必须准备把它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而以后各个时期的要求和条件将会赋予这个过程以它们自己的特殊意义。而这正是阿克顿的历史不仅是对进步的一项记录，而且是一门“进步的科  
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所在，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个命题改成：历史在这个词的两种含义上——作为事件的进程和作为对这些事件的记录——都是进步着的。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阿克顿对于自由在历史上的前进所作的描述。他说：

自由之所以能够在迅速变化但却是缓慢进步的四百年中免遭断送，从而得以保持并获得伸张，以至终于为人们所理解，是由于弱者为了抵制暴力统治和经常受到的虐待被迫联合起来努力奋斗的结果<sup>②</sup>。

阿克顿曾把作为事件的过程的历史，设想为向自由迈进的进

<sup>①</sup> 阿诺德：《一篇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就职演讲》(T. Arnold: A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1841), 第 38 页。

<sup>②</sup> 阿克顿：《关于近代史的演讲》(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第 51 页。

步,而把作为那些事件的记录的历史,设想为对自由逐步获得理解的进步;这两个过程齐头并进着<sup>①</sup>。布雷德利是一位在从进化作出类比为时尚的那个时代从事写作的哲学家,他曾经指出:“对于宗教信仰来说,进化的终极表现为已经进化了的那个东西……”<sup>②</sup>。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进步的终极则不是什么已经进化了的。它仍然是无限遥远的某种东西;而它的指标只有当我们在前进时才能看到。这并没有缩小它的重要性。罗盘是一种有用的,而且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向导。但是,它并非一幅航线图。历史的内容只有当对它经历了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理解。

我所要说的第三点是,从来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有那么一种进步,以一条不断的直线向前进,没有倒退、偏差和间断,因此连最厉害的倒退也必然不会成为这种信念的致命打击。非常清楚,这里不仅有进步的时期,也有退后的时期。而且,假定在退却之后,前进又会从原来的地方、沿着原来的路线重新开始,这种假定便是轻率的。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四种或三种文明,汤因比的二十一种文明,亦即经历兴起、没落、崩溃三个步骤的文明循环更替的理论——这样的方案的本身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它们却是下列这个观察到了的事实的一种征兆,即促使文明前进所需要的那股力量,在某个地方消失了,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又恢复起来,因此,我们在历史之中能观察到的任何进步,无论在时间或者在空间方面

<sup>①</sup> 曼海姆:《思想意识与乌托邦》(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第236页。作者也把人的“形成历史的意志”跟“理解历史的能力”联系起来。

<sup>②</sup> 布雷德利:《伦理研究》(F. H. Bradley: Ethical Studies, 1876),第293页。

都肯定不是连续不断的。说实在的，如果我热中于作出历史的规律的话，其中的一条规律的大意就会是，一个在某一时期的文明的进展中起主要作用的集团——你愿意管它叫阶级、民族、大洲、文明也好，管它叫什么别的也好——看来不会在下一个时期起同样的作用，其所以如此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个集团受上一个时期的传统、利害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的感染太深，以致不能使自己适应下一个时期的要求和条件。<sup>①</sup> 因此，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对于某个集团说来似乎是一个衰落的时期，对于另一个集团，却很可能是新的进展的起点。进步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对一切人全是同等的、同时发生的进步。很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所有近代的说没落将临的预言者们，那帮看不见历史的意义、认为进步业已死亡的怀疑论者，都属于世界的那一部分，属于社会的那一阶级，他们好几代以来就在文明的进展方面，成功地起着主要的、卓越的作用。如果对他们说他们这个集团过去起过的作用，现在要由别人去起了，这对于他们自然不是什么安慰。显而易见，在他们身上玩了如此卑鄙的一个花样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或者合理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打算保持进步这个假设，我认为我们就必须承认有线中断的情况。

最后，我来谈谈就历史的活动而论，甚么是进步的根本内

---

<sup>①</sup> 关于这种情况的识别与判断，参看林德：《知识为了什么？》（R. S. Lynd: *Knowledge for Wh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第 88 页：“在我们这种文化之中的年长者常被引导面向过去，面向他们精力旺盛的时代，把未来则当作一种威胁加以抗拒。也许整个的文化在失去相关联的力量的分崩离析的后期，很可能因此就有一种占优势的面向已失去的黄金时代的趋向，而生活却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呆滞缓慢地过下去的。”



容这一问题。比如说,那些为争取一切人都能享有公民权利,为争取改革刑法,为争取消除种族或财富的不平等现象而奋斗的人们,他们只是有意识地争取实现这些事情: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寻求“进步”,不是有意识地实现某种历史“规律”或者进步的“假设”。把进步这一假设运用在他们的行动上,把他们的行动解释为进步的是历史学家。然而,这并不会使进步这一概念失去效用。我很高兴发现自己在下面这一点上跟伯林爵士的意见是相同的,即“进步与反动这些字眼不管被人们多么滥用,它们并不是空洞的概念”<sup>①</sup>。历史的前提是,人是能够(当然不是说一定会)受到他的前辈的经验的好处的,而且,历史之中的进步,跟自然界的进化不一样,它所依靠的是转让已得到的贵重财物。这批财物包括物质财富以及控制、改变和利用一个人的环境的能力这两方面。的确不错,这两个因素是互相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马克思把人的劳动看作整个大厦的基础;如果“劳动”带着一种相当广泛的意义的話,这个公式看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是没有用的,除非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增长了的技术和社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还有在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的、增长了的对人的环境的控制。目前,我想很少人会对物质财富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从技术的意义来看对于环境的控制这两方面进步的事实提出疑问。所提出疑问的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对社会的整顿,我们对国内或者国际的社会环境的控制,是否有任何进步,是否真正没有显明的退步。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难

---

<sup>①</sup> 《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第28卷,第3期(1950年6月),第382页。

道不是无可救药地落在技术进步的后面了么？

引起这个问题的征候是很明显的。不过我仍然觉得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历史已经有过许多转折点，那时候领导与创始都由一个集团、由世界的一个地区转移到了另一集团和地区：近代国家的兴起以及权力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西欧的这个时代和法国革命的时代都是近代显著的例证。这样的时代总是剧烈骚动、争夺权力的时代。旧的权威削弱了，旧的划时代的事件不见了；从野心与憎恨的严酷冲突中，新的秩序出现了。我想要提出的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说我们对社会组织问题的理解，或者根据这种理解来组织社会的好心肠都已经衰退，对我说来这似乎是极不真实的：的确，我该冒昧说一句，它们都大大地增加了。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减小了，也不是我们的道德品质衰弱了，而是我们所生活经历的这个冲突和骚动的时代，由于各大洲之间、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一直在变换的权力平衡，对我们的能力和品质严峻的考验更增加了，同时也限制和损挫了它们取得积极成就的效力。我不希望低估过去五十年来在西方世界里对进步这一信仰进行挑战的那股力量；与此同时，我却仍然不相信历史中的进步已经到了尽头。可是，如果你进一步非叫我讲出进步的内容不可，我想我只能作出这样的回答。经常为十九世纪思想家所主张的、关于历史中的进步能明确下一定义的最终目的的那种概念，已经证实是不实用和无效的。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者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在能力的进步的发展。进步是个抽象的术语；人类所追求的具体目的时时起因于历史的进程之中，而不是起因于历史

以外的其它来源。我声明我不相信人的圆满无缺的可能性，也不相信人间的未来天堂。在这种程度上，我是同意那些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他们断言历史之中无法实现圆满无缺的。但是，我将满足于没有限制的进步的可能性——这种进步不从属于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正视的那些限制——这种进步的目标只有当我们朝它们前进时才能加以明确，这种目标的恰当与否只有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才能予以证实。没有关于进步的这样一种概念，我不知道社会如何能生存下去。每一文明社会，为了尚未出生的后几代，把牺牲强加在现在活着的这一代的身上。用未来较美好的世界的名义来证明这些牺牲是正当的，这是用某种神的意图来证明这些牺牲是正当的一种世俗的相对应的意图。拿伯里的话来说：“对后代尽责这项原则，是进步这一思想的直接而自然的结果。”<sup>①</sup>也许这种职责毋庸辩护。如果需要辩护，我也不知道其它辩护的办法。

这就把我引导到历史中的客观性这一著名的难题上来了。这个字眼本身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问题也未确定。我在以前的讲演里已经论证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在内——无法使自己适应关于知识的这样的理论，即把主体跟客体分割开来，在观察者跟被观察物之间强迫加以严格的隔离。我们需要新的范例，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给予公正的评价。历史事实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既然它们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只是由于历史学家赋予它们的重要性的结果。历史中的客观性——如果还打算用这个惯常的

<sup>①</sup> 伯里：《进步的观念》，第9页。

术语的话——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能是相互关系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的客观性。我不需要重提那些引导我驳斥这种企图的理由，这种企图是非历史的，它建立一个历史以外、独立于历史的绝对价值标准来判断历史事件。可是，绝对真理这一概念对于历史世界也是不恰当的——而且，我想对于科学世界也不恰当。能够判断为绝对真实或者绝对虚假的，只是最简单的那种历史陈述。在一个较高级的水平上，一位对他的前辈的断语进行争辩的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指责说这个断语绝对错误，而只是说它不适当、片面、容易误解，或者它是已被后来的证据弄成过了时或者与本题无干的一种观点的产物。说俄国革命是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愚蠢或者是由于列宁的天才而产生的，这全是不恰当的——而且是太不恰当以致完全引人误解。可是，这不能说成绝对的错误。历史学家是不卖这种绝对的货色的。

让我们回过头再谈谈罗宾逊之死的那件惨案。我们调查这一事件的客观性并不在于把事实弄正确——这些是不必争论的——而是在于把我们有兴趣的真的或者有意义的事实，跟我们可以忽视的那些偶尔的事实加以区分。我们发现要划出这条界限是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意义的标准或试金石，也就是我们的客观性的基础是清楚的，而且跟眼前的目标很有关联，这个目标就是降低马路上的伤亡率。跟一个在他眼前有减低交通伤亡事故这个简明而又有限的目的的稽查人员比起来，历史学家便是个比较不那么幸运的人。历史学家在他解释的任务中，也需要自己衡量意义的标准，这也就是他的客观

性的标准,以便把有意义的东西跟偶尔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他也只能联系着眼前的目的才能找到这种标准。不过,既然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过去是历史的必需的作用,那么,这个目的就必然也是进化的。传统的假定认为,变化总是要用某种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来解释的,这跟历史学家的经验刚好相反。巴特菲尔德教授也许暗地里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历史学家们不必跟他一道进去的区域,他说:“对历史学家说来,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变化。”<sup>①</sup>历史中的绝对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从那里开始的过去的某种东西;它也不是现在的某种东西,因为现在的思想必然是相对的。它是某种还没有完成、还在发展过程中的东西——是我们向它移近的在将来之中的某种东西,只有在我们向它移动时,它才开始形成,而且当我们向前移动时,我们是根据它逐渐形成对于过去的解释的。这是在宗教神话后面的世俗的真理,这种神话是说历史的意义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揭示出来。我们的标准不是在一种静止的意义下、昨天、今天以至永远全是一样的某种绝对的东西:这样一种绝对的东西是跟历史的性质不相容的。可是,它是关于我们对过去的解释的一个绝对的东西。它批驳这种相对论者的观点,说一种解释跟另一种解释全一样好,或者说每一解

---

<sup>①</sup> 巴特菲尔德:《辉格派的历史观》,第58页。请跟马丁《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学》(Alfred von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5)第1页上更为精密的论述相比较:“停滞与运动,静止与动力,是用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始研究历史的根本范畴。……历史只知道相对意义下的停滞: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是停滞占优势,还是变化占优势。”变化是历史中的积极的和绝对的因素,停滞则是历史中的主观的和相对的因素。

释只是在它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地区才是真实的，而且它提供了最后判断我们对过去的解释的试金石。只有这种历史中的方向感才使我们能够整理和解释过去的事件——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在现在以将来为目标来解放和组织人力——这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任务。然而这个过程本身仍然是进步的和生动有力的。我们的方向感，以及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在我们向前进时，是要经历经常的改变和进化的。

黑格尔把他的绝对包藏在世界精神这个神秘的形体里；他使历史的过程在现在就告一结束，而不是使它延伸到将来，就这样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承认在过去的不断进化的过程，但是很不相称地否定了在将来的这个过程。自黑格尔以后，在历史的性质这一问题上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们，便在这里面看到了过去与将来的一个综合。托克维尔尽管没有完全摆脱他那时代的神学的惯用语，同时对他的绝对给予太狭隘的内容，他却抓住了这一事物的本质。他在谈过作为普遍和永恒现象的平等的发展之后，继续写道：

如果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认识到，平等的逐渐和向前的发展同时是他们的历史的过去也是历史的将来，那么，单单这一发现就会使这个发展具有一种人们的上帝与主宰的意志的神圣性质。<sup>①</sup>

就这一尚未完成的主题可以写出历史的很重要的一章。马克思分享了黑格尔禁止朝将来看的部分观点，而主要地把他的

<sup>①</sup>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序言（Alexis de Tocqueville: Preface to Democracy in America）。

教导牢牢地扎根在过去的历史之中，他由于课题的性质，被迫把他那个无阶级社会的绝对延伸到将来之中。伯里有点局促地，但是很清楚以同样的意图把进步这一概念描写成“一种理论，它牵涉到对过去的综合以及对将来的预言”<sup>①</sup>。纳米尔开始用他惯常用的大量例证来说明他精心制作的一句似非而是的话，他的话是这么说的：“历史学家想象过去，记取将来。”<sup>②</sup>只有将来才能提供解释过去的钥匙；而且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我们才能谈到历史中的根本的客观性的问题。过去说明将来，而将来也说明过去，这既是历史的辩护，同时也是历史的解释。

我们称赞一位历史学家很客观，或者说这位历史学家比那位历史学家要客观些，我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很清楚，并不简单地因为他把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他选择了正确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正确的衡量意义的标准。当我们说一个历史学家客观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意思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有能力超越自己所在的社会以及所在的历史之中的地位所具有的那种有局限性的眼光——正如我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讲演里所提出的那样，这种能力，部分地要看他对在那种地位里自己牵涉进去的程度的认识能力而定，也就是说，对不可能有完全的客观性的认识。其次，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有能力以那样的办法把他的眼光投射到将来，因而能给予他一个更深入的、更持久的对于过去的洞察

---

① 伯里：《进步的观念》，第5页。

② 纳米尔：《矛盾》（*Namier: Conflict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42），第70页。

力，这比那些把观点完全束缚在自己当前地位的历史学家们所能得到的，要深入、持久得多。今天，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对阿克顿关于“终极的历史”的前景所表现的信心起共鸣。可是，有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要比其它一些历史经久一些，要有较多的终极的和客观的性质；而这些就是具有我所谓的既看到过去同时又看到将来的、一种长远的眼力的历史学家们。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

因此，当我在以前的讲演里谈到历史是过去跟现在之间的对话时，我原该叫它作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谈话才好。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的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只要主要目标看来还是宪法自由和政治权利的组织，历史学家便以宪法和政治为根据来解释过去。当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开始代替了宪法和政治的目标时，历史学家们便转而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过去。在这一过程中，怀疑论者满象很有理由似地硬说，新的解释并不比旧的解释更为真实；各自就它的时代而论都是真实的。可是，既然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任务，比起具有政治和宪法目标的任务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代表更宽广的和更先进的阶段，那么，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历史便可以说代表着比单纯的政治解释更为先进的历史阶段。旧的解释并没有被排斥，而是既包括在新的解释之中，又同时为新的解释所替代。史学史在这种意义之下是一种进步的科学，这就是，它企图在本身就是进步的事件过程中，提供不断扩大和加深的



洞察力。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需要“一个富于建设性的、看待过去的观点”的意思。近代史学史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对进步的双重的信仰里成长起来，而且没有这种信仰便无法生存下去，因为正是这种信仰为它提供了意义的标准，提供了区分真正的与偶尔的东西的试金石。歌德在他生命的后期的一次谈话里，有一点粗暴地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当时代衰微的时候，一切趋势都是主观的；而另一方面，当事物正在成熟以待一个新的纪元来临时，一切趋势便是客观的。<sup>①</sup>

任何人都不是非相信历史的未来或者社会的未来不可。我们的社会有可能遭到毁灭，也可能逐渐腐朽而趋于灭亡，历史也有可能堕落而为神学——也就是说，所研究的不是人的成就，而是神的旨意——也可能成为文学——也就是说，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叙述故事和传说。可是，这就不会是过去这两百年之中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意义下的历史了。

我还必须讨论一下那种大家熟悉、也相当普遍的对任何这样的理论所提出的异议，这种理论便是：在将来之中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据说这样一种理论隐含着成功就是判断的最后标准的意思，而且也隐含着，如果不是任何事情现在都正确，将来总会是正确的这样的意思。过去两百年来，大部分历史学家不仅假定了历史运动的方向，而且有意或无意地相

---

<sup>①</sup> 引文见胡伊津加：《人与思想》(J. Huizinga: Men and Idea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9), 第 50 页。

信,这个方向总的说来是个正确的方向,相信人类是从较坏的地方朝较好的地方移动,从较低的地方向较高的地方移动。历史学家不仅认识了这个方向,而且还赞成这个方向。他用于研究过去的检验意义的标准,不仅是对历史前进的过程的一种感觉,而且是对他自己在精神上牵涉在这一过程之中的一种感觉。“是”与“应该是”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那种所谓两分法便消除了。这是个乐观的看法,是对未来有绝大的信心的时代的产物;辉格派人与自由党人,黑格尔派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神学家与理性主义者仍然坚定地、而且多少有些明确地,专心致志于这样的观点。两百年来,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是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众所公认、无可怀疑的回答。反抗这种观点的逆流是随着近年来流行的恐惧与悲观的情绪而来的,这种情绪把这一领域完全留给了那些在历史之外去寻求历史的意义的神学家,以及在历史之中找不到任何意义的怀疑论者了。从各方面都有人叫我们相信,而且非常强调地叫我们相信“是”与“应该是”之间的两分法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从“事实”之中是不可能得到“价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路线。让我们随意挑选几位历史学家或者写过关于历史的著作的作家,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感觉。

吉本为自己在叙述中用大量篇幅来写伊斯兰教的胜利而辩护,他的理由是,“东方世界里,穆罕默德的门徒仍然掌握着民间的以及宗教的大权。”他补充说,不过,“把同样多的劳力花在七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从西徐亚平原那边来的大群野蛮人身上,那就太不值得”,因为“拜占庭的皇帝陛下打退了这

些捣乱的进袭而生存下来了”<sup>①</sup>。这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整体看来,历史是一个人们作了些什么的纪录,不是人们没有能作到什么的纪录:在这种程度上,它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托尼教授说,历史学家“把那些获胜的力量拉到显著的地位上来,把那些被它们吞没了的力量推到后边不显著的地位上去”,从而使现存秩序“带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外表”<sup>②</sup>。可是,在某种意义下,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的主要所在?历史学家不应当低估对立面;如果这是一场危险的踩软索,他一定不能把它描写成一种容易击败对方的独走。有时候,那些失败者正跟胜利者一样,对于最后的结果作出了同样巨大的贡献。这是对于每一历史学家都很熟悉的格言。但是,总的说来,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只是那些有所成就的人,而不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我不是一个研究板球的历史的专家。但是,板球史的册页上布满的大概是那些得几百分的人的名字,而不是那些得零分,退出了球队的人的名字。黑格尔说历史上“引起我们注意的,只是那些形成了国家的各族人民”<sup>③</sup>,这一著名论断遭到了恰当批评,人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给予了独有的价值,并且为令人厌恶的国家崇拜开辟了道路。但是,从原则上看,恩格斯想要说的并不错,而且反映了大家熟悉的、史前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只有那

---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55章。

② 托尼:《十六世纪农业问题》(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第177页。

③ 《历史哲学讲演集》(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884年英译本,第40页。

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组成了社会的各族人民，才不再是原始的野蛮人，才进入了历史时期。卡莱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把路易十五叫“一个世界性混乱的化身”。显然他很喜欢这个说法，因此在以后又用较长的一段话，把这句话加以润饰：

这是个什么崭新而普遍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运动呢！这是曾经合作过，而现在却在狂乱的冲突之中翻滚和捣碾的一些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个人思想的运动吗？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终于衰竭了的、一个世界性的混乱的破灭。<sup>①</sup>这个标准仍然又是历史的：在一个时代适合的，在另一时代则变成了混乱，而且因此遭到谴责。甚至当伯林爵士从哲学抽象的高度走下来考虑具体的历史情况时，他看来也同意了这种观点。在他发表了那篇《历史的必然性》的论文以后，他在一次广播里称赞俾士麦，说他尽管在道德上有些缺点，仍然是个“天才”，是“上一世纪在政治判断上最有能力的政治家的最伟大榜样”，而且在这方面跟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罗伯斯庇尔、列宁以及希特勒比起来要强得多，这些人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积极目的”。我觉得这种论断很古怪。不过，现在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作出判断的标准。伯林爵士说，俾士麦理解他所采用的资料，其他的人则被那些不能发生效力的抽象理论所引开。其教训便是“失败是由于反对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而赞成公开宣称有普遍效力的某种系统的方法或原则。”<sup>②</sup>换句话说，历史上判断的标准不是某种“宣称有普遍效

<sup>①</sup> 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第1卷，第1节，第4章；第1卷，第3节，第7章。

<sup>②</sup> 1957年6月19日，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中论“政治判断”的广播节目。

力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

我用不着说，并不是只在分析过去的时候我们才拿出“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这条标准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把大不列颠跟美国联合成为一个单一政权统治下的单一国家是符合愿望的，你可能同意这是个很合理的看法。如果他继续提出，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君主立宪比总统制下的民主更为可取，你也可能同意这也很合理。可是，假定他告诉你，他打算竭力领导一个运动，使这两个国家在英国国王的统治下重新合并起来，你也许会回答说，他这是浪费时间。如果你打算解释这是为什么，你便不得不告诉他，争辩这类问题的根据不是一般运用的某种原则，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效果的某种东西；你甚至可能犯这么大的罪过，把历史说成个抽象的力量，告诉他历史在反对你。政治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考虑在道德上或者理论上合乎愿望的东西，而且要考虑世界上存在的许多力量，以及考虑如何引导或者巧妙地使用这些力量以便部分地实现眼前的目的。根据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所作出的政治上的决定，是扎根在这种妥协之中的。然而，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也是扎根在同样的妥协之中的。对愿望得到的东西建立某种假定的抽象标准，而且根据这种标准来谴责过去，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为极端错误的了。“成功”这个词已经有了许多令人不快的涵义。让我们坚决地采用带中性的“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这个词来替代“成功”这个词吧！在这些讲演里，我跟伯林爵士在好些地方是持不同意见的，因此，我感到很高兴能够在结束这一段叙述时，无论如何总有这么一点彼此同意的地方。

不过，接受“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这个标准，并不使运用这个标准容易一些，或者更明确一些。这并不是一个鼓励突然作出判断的标准，并不是屈从于存在的就是正确的这种观点的标准。孕育着重大结果的失败，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的。历史是承认我所谓的“耽搁了的成就”的：在今天显然的失败，结果很可能对于明天的成就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之前产生的预兆。的确不错，这一标准比起假设一种固定的普遍原则那一标准来，有一个好处，即它可能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的判断，或者根据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限制这一判断。蒲鲁东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毫无拘束地说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成功之后，宽恕了这次政变。马克思拒绝采用抽象道德原则作为标准，对蒲鲁东宽恕这次政变加以谴责。从较长的历史前景回顾起来，我们也许会同意蒲鲁东是错的，马克思是对的。俾士麦的成就为检查历史判断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起点。我一方面接受了伯林爵士“最能产生效力的东西”这一标准，同时我仍然对那种窄狭的短暂的范围感到困惑不解，他显然是满足于在这种范围之内运用这一标准的。俾士麦所创造的真是产生了很好的效力么？我倒认为它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呢！这倒并不是说我有意图要谴责创造了德意志帝国的俾士麦，或者谴责要求有个帝国并且协助成立了帝国的德国广大群众。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仍然要提出许多问题。最后发生了灾难，是帝国的结构之中存在着某种隐藏的弱点么？或者是因为在使帝国诞生的国内条件之中有某种东西注定使这个帝国变成固持独断而且富于侵略性？或者是因为帝国诞生的时候，无论欧洲或者世界这座舞台已经如此拥挤，现

存的强国之中向外扩张的倾向已经如此强烈，因而出现另一个向外扩张的强国，便足以引起一次大的冲突，把整个制度给毁灭掉？就最后这一假设而论，叫俾士麦和德国人民对灾难负责，或者叫他们单独负责，可能是错误的：你实在不能够责备造成灾难的最后一个原因。但是，对俾士麦成就的客观判断以及这种成就如何产生效力，这都等待着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回答。我敢肯定他是能够明确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我想说的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比起来，要更接近于客观的判断，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又比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要接近些，纪元二千年时候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更加接近些。这就说明了我的命题：历史中的客观性不依靠、也不能依靠此时此地存在着的、某种固定不移的判断标准，而只是依靠在将来积累起来的、随着历史前进的过程而进化的一种标准。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有联贯的关系时，它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让我们再看一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有人断言的两分法。价值不能从事实之中获得。这种说法部分是真实的，但部分是错误的。你只需检验一下在任何时代或者在任何国家里盛行的价值体系，就能认识到这个体系有多大一部分是由周围的事实所塑造而成的。在以前的一次讲演里，我请大家注意象自由、平等或正义这样一些说明价值的字眼的正在变化的历史内容。再举主要是作为宣扬道德价值的机构的基督教会为例。把原始的基督教价值跟中世纪天主教制度的价值对比一下，或者把中世纪天主教制度的价值跟十九世纪新教教会的价值对比一下。或者再把今天，例如说，西班牙的基

督教会所传布的价值跟美国基督教会所传布的价值对比一下。这些价值上的差别是从历史事实的差别而产生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那些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引起奴隶制度、种族不平等或者剥削童工的历史事实，这些都曾经作为道德上属于不好不坏或者是高尚的东西被接受下来，而现在便一般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了。认为价值不能从事实之中引导出来的假设，至少是片面的和引起误解的。或者让我们把这种说法颠倒过来。事实不能从价值之中引导出来。这部分是真实的，但是也可能引起误解，因此需要斟酌。当我们有意了解事实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乃至我们所获得的答案，都是由我们的价值体系所促成的。关于我们的周围的事实的一幅图景就是由我们的价值塑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由我们接近事实时所通过的那些类型塑造而成的；而这幅图景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事实之一。价值进入事实，而且是事实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的价值是作为人类的我们所有的工具的重要部分。我们是通过价值才有能力适应环境、使环境适应我们，才有能力获得对环境的控制，这种能力已经使历史成为进步的纪录。但是，在戏剧性地表现人与环境的斗争时，切不可在事实跟价值之间建立一种虚假的对立和虚假的分离。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跟价值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客观的历史学家便是最能深入到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的历史学家。

“真理”这个词的普通用法为事实与价值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词脚踏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是由两者的一些因素构成的。这并不是英语的一种特性。在拉丁语系中



作真理讲的一些词，如德文中的 *Wahrheit*，俄文中的 *pravda*<sup>①</sup>，都有这种双重性格。每一种语言看来都要求这个词表示一种真理，它既不仅仅是事实的说明，又不仅仅是价值的判断，而是包含这两种因素。我上星期去伦敦，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大概不会管它叫真理：因为它没有任何价值内容。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建立者在独立宣言中提到那个显明的真理：一切人生来平等时，你可能感觉到这个声明中的价值内容压过了事实内容，也可能因此对这个声明被看作真理的权利提出责难。在这两极的中间某个地方——没有价值的事实 的北极和挣扎着使自己改变成事实的价值判断的南极——便有历史真理的领域。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是在事实与解释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取得平衡的。他不能把两者分开。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你也许不得不宣告事实与价值两者脱离关系。可是，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或者——如果你对于一个旧式一些的词不怎么吹毛求疵的话——它就是进步。

因此，在我结束时，我还要回到阿克顿对进步所作的描述上来，他把进步描述为“据以写出历史的科学的假设。”如果你高兴，你可以使过去的意义依靠某种超历史的、超理性的力量，从而把历史变成神学。如果你高兴，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文学——变成毫无意义毫不重要的、关于过去的故事和传说的

<sup>①</sup> *pravda* (правда) 这一字的情况特别有趣，因为还有一个古俄文字 *istina* (истина) 也是真理的意思。可是其区分并不在于作为事实的真理跟作为价值的真理。*pravda* (правда) 是这两个方面的人类的真理，*istina* (истина) 则是这两个方面的神的真理——即关于上帝的真理和由上帝显示的真理。

汇集。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那种历史，只有由在历史本身找到了一种方向感，而且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来写作。我们是从某地方来的，这种信念是跟我们正向某地方走去这种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向前进这一点丧失了信念的那种社会，会很快地对自己在过去的进步不再表示关切。正如我在第一讲的开头就说过的那样，我们的历史观反映了我们的社会观。现在我回到我的起点，明白宣告我对社会的未来、对历史的未来的信心。

## 第六章 在扩展中的天地

我在这些讲演里所提出的、把历史当作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则在这过程之中随之前进的这种概念，似乎使我有责任在结束时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谈谈自己一些想法。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历史上这也并不是第一次——关于世界性灾难的预言颇为风行，而且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上。这些预言既得不到证实，也没法加以否定。但无论如何跟人人必有一死那样的预言比起来，它们的肯定性总要小一些。既然人必有死的预言没能妨碍我们为自己的将来作出计划，那么，我假定我们这个国家——或者，如果不是这个国家，便是世界其它的某一主要部分——经历了威胁着我们的危险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而且历史也将继续下去，因此我将根据这种假定继续探讨我们社会的现在与将来。

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比起十五、十六世纪时中世纪世界瓦解毁灭、现代世界的基础得以奠定以来的任何变化过程，都更加深刻，更为势不可挡。这种变化毫无疑问穷其根本是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产物，是更为广泛地运用这些发现和发明的产物，是直接或间接来自这些发现发明的发展的产物。这种变化的最显明的一个方面便是一次社会革命，它敌得上十五、十六世纪使以金融和贸易作

基础、其后又以工业作基础的一个新的阶级开始兴起的那次革命。我们工业的新结构以及我们社会的新结构所提出来的问题范围太广泛,我在这里无法着手探讨。但是,这个变化有两个方面跟我的主题关系较密切——我管一个叫深度方面的变化,一个叫地理范围方面的变化。我想就这两方面简单谈一下。

当人们开始想到一段时间时不再以自然的过程——如四季的循环,人的寿命——为根据,而是以人们有意识地被牵涉在内,而且能有意识地对它们施加影响的一系列特殊事件为根据,这么一来,历史就开始了。布尔克哈特说,历史是“由意识的觉醒而引起跟自然的分离”<sup>①</sup>。历史是人运用自己的理智以了解他的环境并影响他的环境的长期斗争。但是,现代把这个斗争用革命的方式加以扩大了。人现在要求了解和影响的不仅是他的环境,而且是他自己;这可以说是给理智增加了一个新的范围,给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范围。当前的时代是个一切时代之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自觉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意识到历史的。他们热切地朝他们从里面走出来的黎明回头看去,希望黎明微弱光线将照亮他正在朝里面走去的那一片阴暗,而且,反过来,对他前面的道路所怀抱的希望以及忧虑也加深了他对背后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无穷尽的历史的锁链之中连接在一起了。

---

<sup>①</sup> 布尔克哈特:《关于历史的一些想法》(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第31页。

近代世界的变化在于人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发展。这变化可以说是从笛卡儿开始的,他最先确立了人的地位,即人不仅能思想,而且能就他自己的思想进行思考,能在进行观察时观察他自己,因而人便同时是思想和观察的主体和客体。但这一发展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完全明确起来,这时候,卢梭在人的自知和自觉方面揭发了新的深度,给予人们一个崭新的、关于自然世界和传统文明的观点。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受到这样的信仰的启示,“即所缺少的就是用来自运用人的理智,来自自然规律的简单而基本的法则以代替那种支配今天社会秩序的传统习俗的复杂东西。”<sup>①</sup>阿克顿在他的一个手稿注释中写道:“直到那时为止,人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却从来不曾追求自由。”<sup>②</sup>对于阿克顿,正象对于黑格尔一样,自由和理智从来不是相差很远的东西。而且,美国革命便联上了法国革命。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大陆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着自由,并为一切人生来平等这样的主张贡献力量。正如林肯的这句话所提示的,这是个独特的事件——这是历史上头一回人们审慎地也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组织在一个国家之中,而且有意识地同时又是审慎地开始把其他人陶冶到它里面去。十七、十八世纪时,人早已完全意识到他周围的世界及其法则。这些已不再是不可思议的神的奥妙莫测的法令,而是一些通情达理的法则了。可是,这些仍然是人所从属的

---

① 托克维尔:《论古代政体》(Tocqueville: De l'Ancien Régime),第3卷,第1章。

② 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补遗,第4870号。

法则,而不是人自己厘订的法则。在下一个阶段,人便开始充分意识到他有控制环境以及控制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他有制订他自己要在它们之下生活着的那些法则的权力。

从十八世纪朝近代世界的过渡的时间很长,而且是逐步的。在过渡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便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两个都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见解。黑格尔在神的法则变成了理智的法则这样的思想之中是扎下了深根的。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一只手紧紧抓住神意,另一只手紧紧抓住理智。他跟亚当·斯密起共鸣。各个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由此也得到了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潜伏在这种行动之中,虽然人们在意识中没有感觉到。”关于世界精神的合理目的,他写道:人“在实现这种目的的行动中,使这目的变成一个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机会,其含意跟原来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这不过是用德国哲学的语言来表现的利益调和论而已。<sup>①</sup>黑格尔提出的跟斯密的“隐蔽的手”相等的东西,便是他有名的“理智的狡诈”,这个理智驱使人们努力达到他们自己并不意识的一些目的。可是,黑格尔仍然是一个法国革命时代的哲学家,是第一个认识到历史变化之中的现实性的实质,认识到人意识自己这一发展之中的现实性的实质的哲学家。历史中的发展就意味着朝自由这一概念的发展。但是,1815年以后,法国革命的启示便在复辟时期的意气消沉之中熄灭了。黑格尔在政治上太软弱,而且到了晚年在他那时代的制度之中被束缚得太死了,以致在自己形而上学的假定里没有能够引进任何形而下的意义。赫尔岑把黑格尔学说描写成“革命的代数

<sup>①</sup> 引文均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学”，这是非常恰当的。黑格尔提供了这个记数法，但是没有提出切实的内容。把计算法写进黑格尔的代数方程式中去的工作，便留待马克思来做了。

马克思作为亚当·斯密和黑格尔两个人的学生，是从自然的理性法则支配这个世界这一概念着手的。他象黑格尔一样，但他这一回是以实用的、形而下的形式，使朝法则支配世界这一概念的过渡，通过一个适应人的革命积极性的理性过程逐渐发展。在马克思的最后综合里，历史意味着三件东西，它们彼此不能分割，形成一个有联系的、合理的整体：根据客观规律，主要是根据经济规律进行的事件的运动；通过辩证过程的相应的思想发展；以及以阶级斗争形式出现的相应的行动，这种行动把革命理论跟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并调和一致。马克思所提出的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综合，是有意识地把它们变成实践的行动的综合，是有时候（尽管是容易引起误解地）管它们叫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一种综合。马克思经常写到关于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意识到却又服从于它们的那些规律。他不止一次地叫人注意那些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他所谓的“错误意识”：“在生产代理人与运销代理人头脑中关于生产法则必然会形成的观念，会与这些法则完全违背。”<sup>①</sup>但是，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许多号召采取有意识的革命行动的显明例证。在论费尔巴哈的有名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哲学家们只是对这个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

<sup>①</sup> 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页。——译者

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谈到“理智的自觉通过一个世纪的过程,消除了一切传统的思想”。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意识,提出无阶级社会的真实意识的是无产阶级。但是,1848年几次革命的失败,是马克思开始工作时看来即将到来的那些发展的严重而具有戏剧性的挫折。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主要仍然是在一种兴盛、安全的气氛中度过的。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我们才完成向现代史时期的过渡,在这一时期,理智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支配社会上人的行为的客观规律,而是重新塑造社会以及用有意识的行动组成社会的那些个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阶级”尽管没有精确的定义,总的说来仍是留待经济分析来加以确立的一个客观概念。在列宁的著作里,着重点便从“阶级”移到了“党”,党构成阶级的先锋,并且对它灌输阶级意识的必要因素。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意识形态”是个消极术语——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虚假意识的产物。在列宁的著作里,“意识形态”则成为中性的或者积极的了——它是一群有阶级觉悟的优秀领导人播植在可能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之中的一种信仰。阶级意识的改造不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一项必须担负起来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给理智添加了一个新的范围的伟大思想家便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时至今日仍然是个有点令人难以猜透的人物。就他的训练和背景而论,他是个十九世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而且毫无问题接受了那个普遍的、但也是容易使人误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有根本对立的假定。弗洛伊德把人当作生物的实体而不是当作社会的实体来研究,因而倾



向于把社会环境看作某种历史上既定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作处于由人本身来进行的、不断创造和改变的过程中的某种东西。他经常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说他从个人的立场出发来探讨社会问题，也由于这个，被谴责为反动派。这种指责，落在弗洛伊德本人身上，只有一部分是恰当的，就美国当前流行的新弗洛伊德派而论，这指责倒是更加有道理些。新弗洛伊德派假定失去调节的现象是个人生来固有的，而不是社会结构中所固有的，同时把个人适应社会看作心理学的主要作用。另外一个普遍的指责，说弗洛伊德把人类事务中非理性的东西的作用扩大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指责所依靠的只是一种在承认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与对这种非理性的东西的崇拜，这两者之间的露骨的混淆。对非理性的崇拜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的确是存在的，主要的形式是贬低理智的成就和潜力，这不幸是个事实。这是当前流行的一股悲观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潮；关于这些，我以后再谈。但是，这不是从弗洛伊德那个不够资格的、而且相当幼稚的理性主义者的身上开始产生的。弗洛伊德所作的是把人的行为的没有意识的根子发掘出来，使它们暴露在意识和合理的探索的面前，从而拓展我们的知识与理解的范围。这是理智的领域的扩大，是人了解和控制自己，从而了解和控制他的环境的力量增加；这表现了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成就。就这方面看来，弗洛伊德补充了马克思的工作，并没有跟他的工作发生矛盾。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摆脱掉人的性格固定不变这样的概念，但他提供了更深入地理解人的行为的根本的工具，从而提供了通过合理的方法对人的行为加以有意识的改变的工

具。在这种意义下,弗洛伊德便是属于当代世界的。

对于历史学家说来,弗洛伊德的特殊意义是两方面的。首先,弗洛伊德为那种古老的幻想画下了最后一道催命符。这种幻想就是,人们断定或相信他们的行动是从一些动机出发,而这些动机实际上就足以说明他们的行动。这是一个有一定重要性的消极的成就,尽管有些热心人士所提出的、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伟人的行为,这种积极的要求要打个折扣才能接受。心理分析的程序是依靠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病人进行反复盘问:可是你没法盘问死人。其次,弗洛伊德使马克思的作品增加力量鼓励着历史学家去检查他自己和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检查他的动机——也许是隐蔽的动机——这些动机指导着他选择主题或时代,选择和解释那些事实,检查决定他观察事物的角度的那种民族和社会的背景,检查形成他对过去的概念的他对于将来的概念。自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写作以来,历史学家便没有任何借口再认为自己是独立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个人了。这是个自觉的时代:历史学家能够而且也应该知道他自己是在干什么。

这个向我所谓的当代世界的过渡——这个向理智的作用和力量的新范围的延伸——还没有完成: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的革命变化的一部分。我打算考察一下这个过渡的某些主要徵象。

让我从经济学开始谈起。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着人和民族的经济行为,人们违反这些规律只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信仰直到1914年为止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贸易盛衰的周期性、价格的波动以及失业现象都是由这些规律所决

定的。迟至 1930 年大不景气开始时，这仍然是占优势的看法。从这以后，情况便迅速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开始谈论“经济人的完结”，意思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一贯地按照经济规律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自此以后，除十九世纪的少数落后于时代的人以外，没有人再相信这种意义之下的经济规律了。今天，经济学要么已经成为一系列理论数学的方程式，要么已成为一门研究一些人如何愚弄另一些人的实用的学问。这一改变主要是从个人资本主义过渡到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产物。只要还是由个别的企业家和商人占优势，看来没有人能够一手控制经济，或者能对经济发生任何有重大影响的影响，这样，对超乎个人的那些规律和处置方式的幻想便保存下来了。甚至英格兰银行，在它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也不被看作手腕高强的经营者和操纵者，而是被看作客观的、半自动化的登记经济趋势的记录员。但是，随着自由竞争经济朝着管理经济的过渡（不论这是资本主义的管理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管理经济，也不论这种管理是由大规模的资本家的公司和小规模的私人公司进行的，还是由国家进行的），这种幻想便消失了。某些人为着某些目的在作出某种决定，这一点是开始明确了；这些决定为我们规定了经济的途径，这一点也开始明确了。今天大家都知道了，油或肥皂的价格并不是顺应某种供求关系的客观规律而变化的。大家都知道，或者以为知道价格暴落和失业现象是人为的：政府也承认，的确也还断言他们懂得如何救治这些毛病。自由竞争已经过渡到计划经济，不自觉过渡到自觉，相信客观经济规律过渡到相信人以自己的行动能成为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社会政策跟经

济政策提携并进：实在说，经济政策已被并入社会政策之中了。让我从1910年出版的第一部《剑桥近代史》中最后一卷里，引用一个作家的非常聪明的评语，这位作家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列宁：

相信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有可能进行社会改革，这是欧洲思想界占优势的思潮；它替代了认为自由是唯一的万灵药这一信仰。……这种思想在现在的流行，正跟法国大革命时期相信人权那样的思想是一样有意义，一样孕育着重大结果的。<sup>①</sup>

今天，在这段文章写下以后的五十年，俄国革命以后的四十多年，大萧条以后的三十年，这样的信仰已很普通；从屈从于那些尽管认为合理、但无法被人控制的客观经济规律过渡到相信人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运，这对我说来似乎是表现了把理智用于人类事务方面的一个进步，表现了人们理解和掌握自己及其环境的能力的增长。如果有必要，我是愿意用那老式的名字管这叫做进步的。

我没有时间用来详谈其它领域里类似过程进行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便是科学，现在也很少从事研究和确立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更多的是作出实际可行的假定，根据这些假定使人们能按照自己的目的驯服自然，并且改变自己的环境。更有意义的是，通过有意识地运用理智，人不仅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环境，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他自己。十八世纪末叶，马尔萨斯在他那部划时代的著作中，企图确立关于人口的客

<sup>①</sup> 《剑桥近代史》第12卷（1910），第15页。这一章的作者是利斯（S. Leathes），他是这部历史的编者之一，同时又是文官考试委员会的委员。

观规律。这些规律,就象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一样,在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它们的进程的情况下,在发生作用。今天,没有人相信那种客观规律,但是,人口控制已成为既合理又自觉的社会政策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已经看见了通过人的努力来延长人的寿命,来改变人口中不同的几代人之间的平衡情况。我们听说过有意识地用药物来影响人的行为,也听说过设计了外科手术,用以改变人的性格。就在我们的眼前,人和社会两者都有了改变,而且是由人的有意识的努力来加以改变的。然而这些变化之中最有意义的,便是由于发展和运用现代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产生的那些变化。如今各级教育工作者都越来越有意识地在按照特定的模型来塑造社会方面作出贡献,并且把适合于那种型类的社会的各种态度、各种忠诚思想和各种意见教给新兴的一代;教育政策是任何合理计划的社会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智运用于社会中的人时,它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仅仅是研究,而是改变。人有力量运用合理的方式来改进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这种力量的已经提高的自觉性,在我看来似乎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要方面之一。

理智的扩展只是我在以前一次讲演中管它叫“个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即独特的技能、职业和机会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伴随着一个正在前进中的文明而来的附带物。工业革命最为深远的社会后果也许就是,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运用理智的那种人的数目在不断递增。在英国,我们热中于渐进的思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有时候简直觉察不出有什么前进。几乎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安于普及初等教育的小小的成

就,而在普及高等教育方面,便没有很大的或很快的进展。当我们在世界上还是领先的时候,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当我们被那些比我们性急得多的人赶上以后,当到处的速度都由于工艺改革而增加以后,这就比较有关系了。因为社会革命,工艺革命以及科学革命都是同一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如果你要找一个人个人化过程的学术方面的例证,你可以考虑一下过去五、六十年里,历史、科学、或者任何一门特定的科学的那种广大无边的多样性,考虑一下由这种多样性所提供的、大大增长了个别专门化的繁多的种类。但是,我还有一个在另一水平上的、关于这一进程的更为显著的例证。三十多年以前,访问苏联的一位德国高级军官,从跟建立红军中的空军有关的一位苏联军官那里,听到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谈话:

我们俄国人不得不使用还很原始的人材这么干下去。我们被迫使飞机去适应可供我们使用的、这种类型的飞行员。我们成功地培养一种新型的人,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物质技术发展便也能完成到那样一种程度。这两个因素是互为条件的。原始的人是没法放进复杂的飞机中去的。<sup>①</sup>

今天,才三十来年以后,我们都知道俄国的飞机不再是原始的了,而且成百万的设计、建造和驾驶这些飞机的俄国男女,也不再是原始的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对于后一种现象更感兴趣。生产的合理化意味着某种远为重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合理化。今天,全世界的原始人都在学着用复杂的机

<sup>①</sup> 《现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 第1卷(1953),第38页。

器,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他们都在学着思考,学着运用他们的理智。这次革命,你可能有理由管它叫社会革命,而我就目前所谈问题的意义而言,管它叫理智的扩展,它还刚刚开始。可是,它以一种摇晃不定的步伐前进,以便跟过去这三十年来来的摇晃不定的技术前进的步伐取齐。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要方面之一。

如果谈到这一点时我没能注意到,在当代世界里,分派给理智的任务之中的那些危险以及含混的地方,有些悲观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一定得警告我,说我违反规则。我在前面的讲演里指出过,在我所说的这种意义下的、在增长中的个人化,并不暗示争取一致和同一的社会压力有任何削弱。这的确是我们这个复杂的近代社会里的一个似非而是的理论。教育是促进扩展个人能力和个人机会的、因而也是促进在日益增长个人化的、既必需又有力的工具。它也是在有关集团的手里、为了促进社会的一致性有力工具。常常听到有人要求有较认真负责的电台广播和电视节目,或者要求较认真负责的报章杂志。这种要求首先是针对那些容易加以谴责的某种消极现象而发的。但是,这些要求很快就变成要求运用这许多对群众进行说服的有力工具,以便教导群众以合意的爱好和合意的见解——合意与否的标准在社会上已被人接受的爱好和见解中便可以找到。这种运动,在那些促进这一运动的人们的手里,是朝一个希望达到的方向进行的、通过塑造社会里的单个的成员以塑造社会本身的、既自觉又合理的进程。关于这些危险的其它露骨的例证,便是由商业广告员和政治宣传员所提供的。这两个角色的确常常是由一个人来扮演的;各党派

和候选人,在美国是公开地,在英国则比较羞羞答答地雇用职业广告员来帮他们取胜。这两道程序,就算在形式上有区分,实在是极为类似的。职业广告员和那些大政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把一切理智的富源都拿出来倾注于自己的工作。然而象在我们考察过的其它例证中那样,理智并不只是用来进行探索的,而是应该富于建设性地加以运用,不是呆板地而是机动地加以运用。职业广告员和运动的组织者并不是主要地只跟现有的事实打交道。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消费者或者选举者目前相信或需要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会成为目的产品的一部分,所谓目的产品便是使用巧妙的办法,诱惑一个消费者或选举人去相信或需要的东西。此外,他们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告诉他们,使人接受他们的观点的最快方法便是求助于顾客和选举者性格之中那种不合理的因素,因而展示在我们眼前的这幅画面便是,职业工业家或者政党领袖中的一些优秀分子,通过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更加高度发展了的合理方式,用了解和利用群众的不合理的方面,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所求助的主要并不是理智:这种求助大体上是按奥斯卡·王尔德管它叫“打中智力的下面”的方法进行的。我把这幅画面描写得有点过分,要不然人家会指责我对危险估计不足的。<sup>①</sup>但总的看来这是正确的,而且也很容易运用到其它领域之中去。在每一社会里,统治集团都采用了多少带强制性的办法来组织和控制群众舆论。这种办法似乎比其它一些办法要坏些,因为它构成对理智的滥用。

<sup>①</sup> 如需较充实的讨论,请参阅本人所著《新社会》(The New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1)一书。第4章中散见各处。



对这个严重的但又很有根据的指控，我只有两方面的论证来予以答复。首先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论证，这就是，每一发明、每一改革、在历史过程中发现的每一新技术不仅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有它消极的一面。代价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我不知道在发明印刷术多久之后，批评的人才开始指出它有助于散布错误的意见。今天，对由于汽车的出现而带来的公路上的死伤感到哀悼，这是很寻常的事情；甚至有些科学家对自己发现了解放原子能的种种办法，感到遗憾，因为它可能而且已经作为造成巨大灾难的用途。反对遏制新的发明创造的打算在过去没有用处，看来在将来也不会有用处。我们从技术以及从群众宣传的潜在能力那里学得的东西不能随便地加以抹煞。回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已经部分实现了的、小规模个人民主的洛克的理论或自由的理论，并不比回到驾二轮马车的时代或早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可能性。不过，真实的答案是，这些坏事情随身也带来了它们自己的纠正的办法。这种补救办法并不在于对不合理的崇拜，也不在于否定近代社会中已经扩大的理智的作用，而在于一种日益增长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不仅来自理智所能起的作用的下面，也来自它的上面。当工艺和科学革命把社会各阶层日益广泛地运用理智强加在我们身上时，这就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幻想了。象历史上其它每一伟大的进展一样，这一进展也有它的代价和损失，这必须承担，也有它的危险，不得不正视。然而，不管那些怀疑论者、冷眼旁观者、以及灾难的预言者，特别是在有些国家里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以前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害，我把这当作历史进步中的例证，并不感到羞

愧。这也许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最革命的现象。

在我们正经历着的进步的革命的第二个方面便是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的面貌。在伟大的十五、十六世纪里，中世纪世界最后瓦解崩溃，现代世界的基础得以奠定，这一时期的特征便是几个新大陆的发现，以及世界重心由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的转移。甚至法国革命较小的骚乱在把新世界招引来恢复旧世界的平衡时，也有了它地理上的后继者。但是，二十世纪革命所造成的变化比十六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势不可挡。过了大约四百年来，世界重心肯定是已经从西欧移开了。西欧以及英语世界的外围地区，已经成为北美大陆的一块属地，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比喻的话，它们好比凝聚，而美国则在其中既是发电厂又是控制塔。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有意义的变化。世界重心现在是否还停留在、或者还有多久继续停留在英语世界及其西欧附带物上面，这是非常不清楚的。今天在世界事务中定基调的，似乎是东欧、亚洲以及延伸至非洲的那一大片土地。“不变的东方”今天只是一种早已过时的陈辞滥调了。

让我们很快地看一眼在本世纪里亚洲发生的事情。这段故事从1902年的英日联盟开始——这是欧洲列强那个有魔力的圈子里第一次接纳一个亚洲国家。这也许可以看作偶合，日本向俄国挑战并且把它打败作为自己兴起的信号，而且这么一来，煽起了伟大的二十世纪革命的第一颗星星火花。1789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在欧洲有它们的仿效者。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在欧洲没有激起共鸣，在亚洲却找到了

它的仿效者：随后的几年里，波斯、土耳其和中国都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不是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具有世界范围的后果的一次欧洲内战——假定象欧洲这样的一个实体是存在的话——这些后果包括：激起了许多亚洲国家工业的发展，激起了中国的排外情绪以及印度的民族主义，还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诞生。1917年的俄国革命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有决定性的动力。这里很有意义的一点便是，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坚定不移地想在欧洲找到自己的仿效者却没有找到，而最后是在亚洲找到了的。“没有改变”的是欧洲，亚洲却是在行动。我毋需把这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一直谈到目前。历史学家还很难对亚洲和非洲革命的范围和意义作出评价。但是，在亚洲和非洲成百万的人口中，传播着近代工艺和工业方法，传播着教育和政治觉悟的端绪，这就正在改变着这些大陆的面貌。由于我无法预见将来，因而我不知道有任何判断的标准会让我把这看作世界历史的前景中一个进步性的发展。由这些事件所引起的世界形势的变化，肯定是使我们英国，也许还使整个英语国家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分量相对地削弱了。但是相对的削弱并不是绝对的削弱；使我烦恼、使我惊奇的并不是亚洲和非洲的向前迈进，而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也许在别的地方也一样——一些占优势的集团有一种趋向，他们对这些发展视而无睹，对它们采取一种徘徊于怀疑的鄙视和殷勤的低声下气之间的态度，以及陷入令人麻痹的对过去的怀念之中。

我所谓的我们二十世纪革命中理智的扩展，对历史学家说来有特殊的影响；因为理智的扩展在本质上是意味着，直到

今天为止处于历史之外的那些集团、阶级、各族人民和各个大陆在历史上的出现。在我的第一讲里，我指出中世纪历史学家带上宗教的眼镜来观察中世纪社会，是由于他们的资料的排除其它一切在外的那种性质所致。我想把这种解释谈得稍微深入一层。基督教教会是“中世纪唯一合理的制度。”<sup>①</sup>我认为这种话尽管毫无疑问地有些夸张，却是很正确的。由于它是唯一合理的制度，因而它就是唯一的历史制度；唯有它是从属于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合理的发展途径的。世俗社会是由教会塑造和组织的，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合理生活。广大群众，就象史前时期的人一样，是属于自然而不是属于历史的。近代史是以越来越多的人表现了社会和政治自觉性，开始懂得他们各自的集团作为历史实体也有过去和将来，而且充分地进入了历史而开始的。只是在过去的最多只有两百年里，甚至只是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中，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自觉性才开始在说得上是人口中的大多数里散播开来。也只是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

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在十八世纪，历史还只是一些优秀人物的历史。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踌躇不定、时冷时热地朝历史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前进。格林<sup>②</sup>，这位相当平凡的历史学家，以写第一部《英

---

① 马丁：《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学》(Von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 第 18 页。

② 原文为 J. R. Green。——译者

国人民史》而成名。二十世纪的每一个历史学家对这种观点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尽管行动落在言辞的后面，我却并不想详谈这些缺点，因为我所更为关心的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却没有能够考虑在英国以外、在西欧以外的、历史的日益扩大的天地。阿克顿在1896年的报告里谈到全世界史时，说它是“跟把所有国家的历史凑在一起的那样的历史有区别的。”他继续写道：

它按次第向前推前，各民族则是附属于这种次第的。各民族的史实也得叙述，不过不是为了各民族本身而加以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对人类的共同幸福所作贡献的时间和程度，关系到并且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系统而加以叙述的。<sup>①</sup>对于阿克顿说来，毫无问题他所设想的全世界史是任何历史学家都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目前在作些什么来促进我们接近这一意义下的全世界史呢？

我原来不打算在这些讲演里触及本大学里研究历史的问题：可是这一方面就我要说的话提供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例子，如果我逃避棘手的问题，便显得有些怯懦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在自己的课程里为美国史建立了一个牢靠的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是，随之俱来的便有加强英国史的偏狭观念的危险，而英国史带着关于英语世界的同样危险，但更为阴险的偏狭观念，早已象只死人的手似地压在我们的课程上了。过去四百年中的英语世界的历史，无疑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但是，把它当作全世界史的中心，把其它一切当作它外围的东西，这是一种不适当的歪曲的看法。一所大学就

<sup>①</sup> 《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第14页。

有责任纠正这种颇为普遍的歪曲观点。在我看来，本大学的近代史研究所似乎没有尽到这种职责。在一所主要的大学里，让考生在历史方面应考优等的学位，而不要求他除英文以外具有任何现代语言的足够知识，这肯定是错误的。让我们把在牛津大学古老而又受人尊敬的哲学方面的训练所发生的事情引以为诫吧，接受这方面训练的有经验的人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只要有简明的日常的英语就很过得去了。对学习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的近代史的考生，不提供比教科书的水平要高一筹的便利条件，这肯定是错误的。一个具有一点点关于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事务的知识的考生，今天在一篇带着冠冕堂皇的二十世纪的浮夸气习，叫做“欧洲的扩张”的论文里，只有非常有限的机会来显示这种知识。不幸得很，这种论文的题目正好符合它的内容：除开在欧洲人打算控制这些国家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外，并不要求一个考生了解甚至象中国和波斯这样一些有极重要的、有详细纪载的历史的国家的情况。我听说，本大学也有关于俄国史、波斯史和中国史的讲授——但是都不是由历史学院的成员担任的。五年前中文教授在他的就职讲演中说过，“中国不能被看成是在人类历史的主流之外的。”<sup>①</sup> 这样一种信念在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之中，完全没有人理睬。在将来很可能被人看作过去十年中在剑桥产生的一部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却是完全在历史学系以外，在没有历史学系的任何帮助之下写成的：我指的就

---

① 普利布兰克：《中国史和世界史》（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第36页。

是李约瑟博士所写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这是一种叫人头脑清醒的想法。如果不是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二十世纪中叶英国大多数其它大学的普遍现象，也是一般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我是不会揭开这些疮疤给外人看的。那种陈旧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偏狭观念的说法，说什么“英吉利海峡起风暴——大陆遭孤立”，在今天仍然有令人不愉快的、符合当前情况的反响。在英国以外的那一大片天地里再一次起了风暴，而我们在这些英语国家里却挤在一起，用简明的日常的英语告诉自己，说什么其它国家和其它大陆由于它们离奇的行动，以致跟我们的文明所赐给它们的恩惠和幸福隔绝了，这时候，看起来倒象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或者不愿意去理解，把自己跟世界上真正在发生的事物隔绝开来了。

我在第一讲里的开头几句话就提请大家注意把二十世纪中叶跟十九世纪末年隔离开的、那种极为不同的观点。在结束语里，我想把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再阐明一下。如果在这样的上下文里，我用了“自由的”和“保守的”这种词汇，大家毫不犹豫地该有这样的理解，我并不是把它们当作英国的几个政党的名目那种意义之下来用它们的。阿克顿谈到进步的时候，他并不是根据在英国很普遍的那种“渐进主义”的概念来考虑的。“革命，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这是1887年一封信里一句很突出的话。他在十年以后一次讨论近代史的讲演里还说，“近代进步的方法就是革命”；在另一次讲演里，他又提到“我们管它叫革命的那些一般性的思想的出现”。这在他没有发表的手稿的一个注释中是这样解释的：“辉格派通过妥

协治理国家，而自由党则开创了一个有思想的统治时期”。<sup>①</sup>阿克顿相信“有思想的统治时期”，意思就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革命。在阿克顿的一生之中，自由主义作为改变社会的动力还没有达到衰竭的地步。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主义所存留下来的东西，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已成为一种保守的因素。在今日还宣扬回到阿克顿就会是毫无意义的事了。但是，历史学家应该首先确定阿克顿所处的地位，其次，把他的地位跟当代思想家的地位加以对比，第三，探索在他的地位之中还有哪些因素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阿克顿那一代人无疑是受了满以为了不起的那种自信和乐观主义的损害，而没有足够地认识到他们的信心所凭借的那个结构是很不牢靠的。不过，它所具有的两样东西却全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作为历史之中的进步因素的那种变化感觉；另外便是相信理智是理解历史中的复杂情况的指南。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声音。我在早些时候的讲演里，曾经引用刘易士·纳米尔爵士表示满意的话，他说当人们为“具体问题”寻求“实际解决办法”时，“计

---

<sup>①</sup> 关于上述各节引文，参看阿克顿：《通信选集》(Selections from Corresponden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7)第278页；《近代史讲演集》(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第4页，第32页；手稿补遗第4949号（存剑桥大学图书馆）。在上面引述的1887年的信里，阿克顿把“良心的发现”作为“旧”辉格党人朝“新”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过渡的标志：这里所指的“良心”显然跟“意识”的发展有关联（参看上面第225—227页），而且跟“有思想的统治时期”是相符合的。斯塔布斯也以法国大革命为界限把近代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强国、暴力和朝代的历史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以思想代替了权力以及形式这两者的历史时期”。斯塔布斯：《关于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研究的十七篇讲演》，1900年第三版，第239页（W. Stubbs: 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



划和理想就被这两方面置之脑后了”，我也引用了关于这一点的描写，他把这描写成“民族成熟”的征候。<sup>①</sup> 我不喜欢以这些个人的一生跟民族生命之间的类比；如果作出了这种类比，这就引起人们提出疑问，我们经过了“成熟”的阶段以后，下面跟着来的是什么呢？但是，使我感兴趣的，是在受到赞扬的实际的和具体的这两者跟受到谴责的“计划和理想”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尖锐对比。这种把实际行动提高到驾凌乎思想理论之上的做法，自然是保守主义的标记。在纳米尔的思想里，这就代表着十八世纪的声音，代表着乔治三世即位时的英国的声音，对阿克顿所提的革命和思想统治时期即将到来的进攻提出了抗议。但是与此相同为大家所熟悉的、以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表现，在今天是非常普遍的。这在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这句话里可以找到它的最普遍的形式：“当激进派的人士大嚷胜利无疑是他们的时候，那些讲求实际的保守派人士却对准他们的鼻子打了一拳。”<sup>②</sup> 奥克肖特教授把这种时髦的经验主义的一个更为圆通世故的版本给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政治事务里，我们“是在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海上航行”，在这里“既没有起站，也没有预定的终点”，我们唯一的目的只能是“平平稳稳地浮着不沉而已”<sup>③</sup>。我不需要把当代否定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和“救世主义”的那些作家，开出一个详细的清单来。这些已成为咒骂那种有深远影响的、有关社会的未来的激进思想

① 见前第 38 页。

② 《邂逅》(Encounter), 第 7 卷, 第 6 期(1957 年 6 月), 第 17 页。

③ 奥克肖特:《政治教育》(Oakeshott: Political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第 22 页。

的流行术语了。我也不打算探讨美国的当前的趋向。在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跟他们在英国的同行比起来,在公开宣称服膺于保守主义这方面,抑制的心情较少。我只引用美国保守派历史学家中最有名也最稳健的一位、哈佛大学的塞缪尔·莫里森教授的一句话来加以说明。他在1950年12月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认为反对他所谓的“杰斐逊-杰克逊-罗斯福路线”的时刻已经到了,并且呼吁“从理智的保守观点出发,写出”<sup>①</sup>一部美国史来。

可是,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再一次以最清楚最不妥协的方式,表明这种慎重的保守观点的,是波珀教授。他对纳米尔反对“计划和理想”起了共鸣,对被说成是目的在于“根据明确的计划,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政策进行攻击,推荐他所谓的“点点滴滴的社会管理”,而且显然并不因为背上“点点滴滴的修补”以及“胡乱对付”<sup>②</sup>的骂名而畏缩不前。在一点上,我实在很赞赏波珀教授。他一直是那个坚定不移地保卫着理智的人,他坚决不跟过去的以及现在的涉猎到非理智主义的思想发生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那张“点点滴滴的社会管理”的处方,我们便可以看出他给理智所指派的任务是多么有限。虽然他对“点点滴滴的管理”所下的定义很不确切,但他特别告诉我们对于“目的”的批评是不包括在内的。他所举出的关于合法活动的一些很谨慎的例子——如“宪法上的改革”和“使收入做到更大的均等的趋势”——这些都明显地表示他

---

<sup>①</sup>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56卷,第2期(1951年1月),第272—273页。

<sup>②</sup> 波珀:《历史主义的贫困》,第67页,第74页。

的社会管理是打算在现存社会的一些假定之下来进行的。<sup>①</sup>在波珀教授所安排的事物的结构中，理智的身份事实上就象一个英国公务人员的身份那样，这位公务员在执行政府政策时很能胜任，甚至还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办法使这些政策发生更大的效力，但是他对这些政策的根本前提或最终目的却不提出疑问。这是有用的工作：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公务员。但这种把理智从属于现存秩序的假定的办法，在我看来最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阿克顿提出革命——自由——有思想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公式时，他对于理智并不是这么想的。人类事务的进步，不管是在科学、历史或者社会方面的进步，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点来获得的，即人类大胆而毫不犹豫地，不肯把自己局限于追求点滴的改良，就象许多事情是这么做成的那样，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对目前做事的办法提出带根本性的挑战，对做事的办法所凭借的公开承认的或者隐蔽的假定提出挑战。我期望有那么一天，英语世界里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将重新获得担当这种任务的勇气。

然而，使我最为不安的，并不是英语世界中在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里面对理智的信仰的衰退，而是失去了对一个永远运动着的世界的普遍感觉。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象有些似非而是；因为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关于我们四周有许多变化的这么多肤浅的议论。然而，有意思的是，变化不再被认为是成就、机会和进步，而是被认为惧怕的对象。当我们那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学究们给我们处方时，他们没有别的东西给我们，只有警告我们别相信那些激进的和有深远影响的思想，

<sup>①</sup> 波珀：《历史主义的贫困》，第64页，第68页。

叫我们避开任何带革命气味的东西,如果必须前进的话,便叫我们尽可能慢地、尽可能小心地前进。这个世界比过去四百年中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快地和更激烈地改变着它的模样,在这个时候,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有理由令人不安的一种特别的愚昧,这种令人不安的理由并不是这个具有世界范围的运动将被遏止,而是我们这个国家——也许还有其它英语国家——会在总的进程中落在后面,而且会毫无办法也毫无怨言地重新陷入某种满腹乡愁的停滞状态之中。就我说来,我依然是个乐观的人;刘易士·纳米尔爵士警告我,叫我远远避开计划和理想,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我们不是朝一个特定的目标进发,最重要的就是小心别让人把船弄得摇晃不定,波珀教授想依靠小小的点滴管理,在路上保留下那个原有的亲爱的 T 字形拐角,特雷弗·罗珀教授对准大嚷大叫的激进派人士的鼻子打了一拳,而莫里森教授则呼吁以理智的保守精神写出历史,在这时候,我将展望这个在动乱中的世界,在阵阵剧痛中的世界,而且将借用一位伟大科学家<sup>①</sup>的大家用得有些陈旧了的词句回答说:“可是地球还是运行呀!”

---

<sup>①</sup> 指创地球绕日而行学说,触怒教皇而下狱的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年)。——译者

# 索引

**Accident in history** 46, 105—116  
历史中的偶尔事件

**Acton, Lord** 1—4, 11, 37, 41, 43—44, 48, 64, 80—81, 121, 125, 135, 144, 148, 164, 167(注①), 170, 221, 226, 251, 256—257 阿克顿勋爵 (1834—1902), 英国历史学家。

**Adams, Henry** 97 亨利·亚当斯 (1838—1918), 美国历史学家。

**Arnold, Thomas** 124 托马斯·阿诺德 (1795—1842), 英国罗格比城著名的罗格比公学校长、教士。

**Bacon, Francis** 84, 120 弗朗西斯·培根 (1561—1626), 英国散文家、哲学家和政治家。

**Barraclough, Geoffrey** 10, 6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Barth, Karl** 79 卡尔·巴尔特 (1886—), 瑞士神学家。

**Becker, Carl** 18 卡尔·贝克尔 (1873—1945), 美国历史学家。

**Berdyaev, Nikolai** 79, 118 尼古拉·别尔迪耶夫 (1874—1948), 苏联哲学家。

**Berenson, Bernhard** (或 Bernard) 107 伯纳德·贝伦森 (1865—1959), 美国艺术批评家, 历史学家。

**Berlin, Sir Isaiah** 44, 47, 53(注②), 81, 99—102, 107, 112, 128, 139—141 艾赛亚·伯林爵士 (1909—), 英国哲学家。

**Bernhardt, H.** 12—15 伯恩哈特

**Biography** 45, 48—49 传记

**Bradley, Francis H.** 59(注②), 126 弗朗西斯·布雷德利 (1846—1924), 英国哲学家。

**Burchhardt, Jakob** 16, 21, 23, 31, 57, 67, 68, 85(注①), 147 雅各·布尔克哈特 (1891—), 瑞士历史学家, 外交家。

**Buckle, Henry** 60 亨利·巴克 (1821—1862), 英国历史学家。

**Burke, Edmund** 60 爱德蒙·贝 (1729—1797), 英国政治家、作家。

**Bury, John B.** 8, 36, 59—60, 106—107(注①), 121, 130, 134 约翰·伯里 (1861—1927), 英国历史学家。

**Butterfield, Herbert** 16, 41—42, 52, 79, 132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900—), 英国历史学家。

**Carlyle, Thomas** 50, 139 托马斯·卡莱尔 (1795—1881), 英国历史学家。

**Chicherin, Grigori** 15 格里哥里·契切林 (1872—1936)

**Churchill, Winston** 16, 106 温斯顿·丘吉尔 (1874—1965)

**Clarendon, Lord** 51 克拉伦登爵士 (1609—1674), 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Clark, Sir George** 1—2, 4, 21, 24 乔治·克拉克爵士 (1890—), 英国历史学家。

**Clark, G. Kitson** 7—8 基特森·克

- 拉克(1900—), 英国历史学家。
- Collingwood, R. G. 18—20, 24—25, 53, 59, 65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1889—1943), 英国历史学家。
- Comte, Auguste 72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 法国哲学家, 实证论创始人。
- Croce, Benedetto 17—18, 82 班内德多·克罗齐(1866—1952), 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 Dampier, William (W. C. Dampier Wetham) 121 威廉·丹皮尔(1867—), 英国科学史家。
- D'Arcy, M. C. 78 马丁·达西(1988—), 英国天主教教士, 哲学家。
- Darwin, Charles 59 查理斯·达尔文(1809—1882)
- Descartes, René 148 勒内·笛卡尔(1506—1650), 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
- Determinism 75, 100—102, 106—107 决定论
- Deutscher, Isaac 49 艾萨克·多伊澈(1907—), 英国作家, 记者。
- Dilthey, Wilhelm 17 威赫姆·狄尔泰(1833—1911), 德国哲学家。
- Döllinger, Johann von 11 约翰·德林格尔(1799—1890), 德国天主教史学家。
- Donne, John 29 约翰·多恩(1573—1631), 英国诗人和传教士。
- Eliot, T. S. 37(注①), 45, 51 托马斯·斯特恩斯·埃利奥特(1888—1965), 英国诗人, 散文家, 批评家。
- Elton, Godfrey 68 戈弗雷·埃尔顿(1892—), 英国作家, 政治家。
- Engels, Friedrich 86 恩格斯(1820—1895)
- Evolution 123—125 进化
- Facts 3—28, 44, 61, 112, 137, 142—144 事实
- Fisher, H. A. L. 37, 43, 108 赫伯特·费希尔(1865—1940), 英国历史学家。
- Freud, Sigmund 151—153 弗洛伊德(1856—1939),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 Froude, James 24—25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1818—1894), 英国历史学家。
- Generalization 66—70 概括
- Geyl, Pieter 43 彼埃特·盖尔(1887—1966), 荷兰历史学家。
- Gibbon, Edward 55, 66, 96, 106—107, 120, 137—138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英国历史学家。
- Goethe, J. W. 136 歌德(1740—1832)
- Great Men theory 54—55 伟大人物论
- Green, John R. 163 约翰·理查·格林(1837—1883), 英国历史学家。
- Grote, George 35, 39, 71 乔治·格罗特(1794—1871), 英国历史学家。
- Hegel, Georg W. F. 52, 56, 79, 98—100, 102, 115, 123—124, 126, 133, 149—150 黑格尔(1770—1831)
- Herodotus 93, 119 希罗多德(484?—425? B. C.), 希腊历史学家。
- Herzen, Aleksandr 149 亚力山大·赫尔岑(1812—1870), 俄国哲学家。

Historicism 98, 116 (注①) 历史主义  
Hobbes, Thomas 65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Housman, A. E. 5 阿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1859—1936), 英国诗人。  
Humanities and science 90 人文科学与科学  
Huizinga, John 117 约翰·胡伊津加(1872—1945), 荷兰历史学家。  
Impersonal forces 45, 51 与人无关的力量  
Indeterminacy in physics 75 物理学中的不确定原则  
Individualism 32—34 个人主义  
Individulization 30, 156—158 个人化  
Inevitability 103—107 必然性  
Johnson, Samuel 85—86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 英国作家。  
Kafka, Franz 101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 波希米亚小说家。  
Kingsley, Charles, 100 查理斯·金斯利(1819—1875), 英国教士、小说家、诗人。  
Knowledge, theories of 5, 25, 75—78 有关知识的理论  
Knowles, David 81—82 大卫·诺尔斯(1896—), 英国教士, 历史学家。  
Lassalle, Ferdinand 60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德国社会主义者、作家。  
Laws, concept of 60—62, 69, 149—151, 153—156 规律的概念  
Leathes, Stanley 155 斯坦利·利斯

Leavis, Frank R. 56 弗兰克·利维斯(1895—), 英国作家, 文艺批评家。  
Lefebvre, G. 83 乔治·勒费弗尔(1874—), 法国历史学家。  
Lenin, Nikolai 51, 151 列宁(1870—1924)  
Lessons of history 70—71 历史的教训  
Lincoln, Abraham 148 阿布拉罕·林肯(1809—1865)  
Locke, John 3—4 约翰·洛克(1632—1704), 英国哲学家。  
Lodge, Henry Cabot 53 亨利·洛奇(1850—1924), 美国政治家。  
Lyell, Charles 59 查尔斯·莱尔(1797—1875), 英国科学家。  
Lynd, Robert S. 127(注①) 罗伯特·林德(1892—), 美国社会学家。  
Macaulay, Thomas B. 20 托马斯·麦考利(1800—1859), 英国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  
Malthus, Thomas 60, 155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 英国经济学家。  
Mandeville, Bernard 52 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 英国作家、医生。  
Mannheim, Karl 69, 74 卡尔·曼海姆(1873—1937), 德国社会学家。  
Maritain, Jacques 79 雅克·马里坦(1882—), 法国哲学家。  
Marshall, Alfred 95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英国经济学家。  
Marx, Karl 47, 50, 52, 55, 60—63, 68, 87, 99—102, 109, 125, 126, 128, 141, 150, 151, 153, 155 马克思

- Meinecke, Friedrich 39—40, 109 (注①), 116 弗里德里希·梅涅克(1862—1954), 德国历史学家。
- Mill, John Stuart 29 约翰·穆勒(1806—1873),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
- Mommsen, Theodor 35—36, 39 西奥多·蒙森(1817—1903), 德国历史学家、古典学家。
- Montesquieu, Charles 94, 109 查理·孟德斯鸠(1689—1755),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 Moore, George E. 66 乔治·爱德华·穆尔(1873—1958), 英国哲学家。
- Morality in history 78—89 历史中的道德(同时参看价值判断)。
- Morison, Samuel 169, 171 塞缪尔·莫里森(1887—), 美国历史学家。
- Namier, Lewis 36—39, 134, 167—171 刘易士·纳米尔
- Neale, Sir James 46 詹姆士·尼尔爵士
- Needham, Joseph 166 约瑟夫·尼达姆即李约瑟(1900—), 英国生物化学家, 科学史家, 东方学家。
- Newton, Isaac 60, 61 艾萨克·牛顿(1642—1727)
- Niebuhr, Rienhold 79, 118 兰荷德·尼布尔(1892—), 美国神学家。
- Nietzsche, Friedrich 25, 55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德国哲学家。
- Numbers in history 50—51 历史中的数目
- Objectivity 2, 5, 24—25, 76—77, 130—135, 142 客观性
- Oakeshott, Michael 19, 168, 171 迈克尔·奥克肖特(1901—), 英国政治学家。
- Parsons, Talcott 6, 7, 48(注②), 114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 美国社会学家。
- Periodization 63 分期
- Pirandello, Luigi 6 罗依·彼兰德罗(1867—1936), 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诗人。
- Plato 98—99 柏拉图(427?—347 B. C.)
- Poincaré, Henri 61, 97 亨利·普安卡雷(1854—1912), 法国数理天文学家。
- Polybius 75(注①), 107 波利比亚斯(205—123 B. C.), 希腊历史学家。
- Popper, Karl 68(注③), 69(注①), 98(注②), 99, 100(注③), 112, 116(注①), 169—171 卡尔·波珀(1902—), 英国哲学家。
- Powicke, Frederick 118 弗里德里希·波威克
- Prediction 71, 75 预言。
- Proudhon, Pierre J. 141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 法国社会主义者、作家。
- Psychology 48 心理学(参看弗洛伊德部分)
- Pulleyblank, Edwin 165(注①) 埃德温·普利布兰克
- Ranke, Leopold von 3, 16, 43, 108 利奥波德·朗克(1795—1886), 德国历史学家。
- Reason 88, 114—115, 147—150, 156—159, 162, 170 理智



Rebels in history 54—55 历史中的  
叛逆  
Relativity 23—25, 130—133 相对性  
Religion and history 78—79, 118  
宗教与历史  
Rosebery, Lord 80 罗斯伯利爵士  
(1847—1929), 英国作家, 政治家。  
Rousseau, Jean Jacques 148 卢梭  
(1712—1778)  
Rowse, Alfred L. 16, 46 阿弗雷  
德·罗斯(1903—), 英国作家。  
Russell, Bertrand 3—4, 58, 59, 97,  
121—122 伯特兰·罗素(1872—)  
Rutherford, Lord 62, 117 艾内斯  
特·拉瑟福德爵士(1871—1937), 英  
国物理学家。  
Scott, Charles P. 4, 6 查理斯·斯  
科特(1846—1932), 英国记者。  
Smith, Adam 52, 150, 156 亚当·斯  
密(1723—1790), 苏格兰经济学家。  
Snow, Sir Charles 91—92, 117 查  
理斯·斯诺爵士(1905—), 英国小  
说家。  
Sociology 45—48, 69—70, 77 社会  
学。  
Sombart, Werner 63 维尔纳·佐姆  
巴特(前译桑巴特)(1863—1941),  
德国经济学家。  
Sorel, Georges 63—64(注①) 乔治·  
索雷尔(1847—1922), 法国记者、社  
会学家。  
Spencer, Herbert 48(注⑤), 58 赫  
伯特·斯宾塞(1820—1903), 英国  
哲学家。  
Stephen, James F. 81(注③) 詹姆  
士·史蒂芬(1829—1894), 英国律  
师, 政论家。

Strachey, Lytton 10, 49 利顿·斯  
特雷奇(1880—1932), 英国传记作  
家, 批评家。  
Stresemann, Gustav 12—15 高斯  
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  
德国政治家。  
Stubbs, William 82, 167(注①) 威  
廉·斯塔布斯(1825—1901), 英国教  
士, 历史学家。  
Subject and object 73—77 主体与  
客体(参看客观性)  
Suffering in history 84—87 历史  
之中的痛苦  
Sutton, Fric 14—15 埃里克·萨顿  
Tacitus 107 塔西佗(55—120), 罗马  
历史学家。  
Tawney, Richard 138 理查·托尼  
(1880—1962) 英国历史学家, 经济  
学家。  
Taylor, A. J. P. 15, 122 艾伦·泰  
勒(1906—), 英国历史学家。  
Teleology 117, 119 目的论  
Thucydides 94, 119 修昔底德(460—  
400 B. C.), 希腊历史学家。  
Tocqueville, Alexis de 133, 148 阿  
列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  
法国作家, 政治家。  
Tolstoy, Leo 52, 55, 110(注①②③)  
托尔斯泰(1828—1910)  
Toynbee, Arnold J. 37, 43, 81, 108  
(注②), 118, 126 阿诺德·汤因比  
(1889—), 英国历史学家。  
Trevelyan, George M. 19, 39 乔  
治·马考莱·特里维廉(1876—),  
英国历史学家。  
Trevelyan, George O. 20 乔治·奥  
托·特里维廉(1838—1928), 英国

- 历史学家。
- Trevor-Roper, Hugh** 23, 49, 168, 171 特雷弗·罗珀(1914—), 英国历史学家。
- Trotsky, Leon** 16, 106, 110 托洛茨基(1879—1940)
- Truth in history** 130—131, 143—144 历史中的真理
- Value judgments** 83—84, 87—90, 136—137, 142—145 价值判断
- Voltaire** 15, 94 伏尔泰(1694—1778), 法国哲学家, 历史学家, 剧作家, 散文家。
- Weber, Max** 48(注②), 62, 83—84 马克斯·韦贝尔(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 政治经济学家。
- Webster, Sir Charles** 70 查里斯·韦伯斯特爵士
- Wedgwood, Cicely Veronica** 46—47, 49 西塞莉·维罗里卡·韦奇伍德(1910—), 英国历史学家, 作家。
- Whig interpretation** 20, 41, 96 辉格派观点
- Wilson Woodrow** 53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 美国总统(1913—1921)。
- Young, G. M.** 48 扬
- Ziman, J.** 64(注②) 齐曼,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